



偉人華業
LIBRARY OF THE
FARMERS BANK OF CHINA.

MIG
K837.125.3
5



3 1764 7684 8

佛蘭克·金敦作

★
★
★
★
★
★
★
★
★

偉人華萊士

★
★
★
★
★
★
★
★
★

小
魚
譯

中國農民銀行
總行
LIBRARY OF THE
FARMERS BANK OF CHINA

前言

華萊士是當代的偉人之一，他的傳記在中國還以本書為第一本。

本書的原作者佛蘭克·金敦 (Frank Kingdom) 是華萊士密切合作的同志，美國進步的政治領袖，新成立的美國第三黨——「進步公民黨」——的主席。(小傳見一四一頁)

本書原名「一個奇人」(An Uncommon Man)，它對於華萊士的為人與思想作了週詳的分析。作者根據明確而豐富的事實解答了下列幾個問題：

華萊士進步思想的特點是什麼？根源在那裏？

他的爲人有什麼優點與缺點？

爲什麼能與羅斯福合作，能得人民愛戴？

他當農業部長有什麼政績？

他任商務部長時受到什麼折磨？

當年爲什麼與羅斯福另一閣員瓊斯大爭吵？

他的科學修養如何？

他怎樣估計美國的經濟危機？提出了什麼經濟方案？

他對蘇聯與共產主義怎樣看法？

他要求怎樣的一種世界？

那些人支持他？那些人反對他？

偉人華萊士

目次

前 言.....一

第一章 一個奇人.....一

生平簡述

三代華萊士

第二章 華萊士與羅斯福.....九

一支美國隊伍

個性相反的結合

第三章 首次與瓊斯衝突.....一八

思想的對比

爲了南美工人

痛斥瓊斯

爭吵的根源

第四章 「請讓位給亨利」……………三五

白宮來鴻

舊派與舊派握手

新舊派的遭遇

新思想的磨難

新舊積不相容

戰瓊斯的最後回合

第五章 國家的農人……………三五

農業部長的工作

人比豬重要

三A法案的被殺與再生

農事也是大企業

華萊士的農業計劃

第六章 不平凡的思想……………六六

我們的美國

我們需要什麼？

我們能有些什麼？	
我們怎樣獲得它？	
第七章 華萊士與科學	八〇
第八章 華萊士與宗教	八六
第九章 反種族偏見	九一
導師卡佛爾	
「種族」的詩口	
充分就業就是公平就業	
免於恐懼的自由	
第十章 反經濟孤立主義	一〇一
公平交易不是搶掠	
七個步驟	
山姆大叔呢，夏洛克大叔呢？	
怎樣制服卡迭爾？	
第十一章 充分就業的象徵	一一三
俾佛里琪分析英國	

充分就業的用費

第十二章 華萊士與政治……………二九

反對華萊士的政策

人民的支持

第十三章 自由與安全……………二七

「請你幫我想一想」

我們怕自己嗎？

第十四章 兩個世界……………三五

人第一還是金元第一？

自由主義者與保守派

作者小傳……………二四

譯後記……………一五

第一章 一個奇人

生平簡述

亨利·華萊士是誰？自由主義者們把他當作他們的發言人與象徵，這事又怎麼發生的？

他曾經在羅斯福手下任過副總統，可是加納 (John N. Garner) 也在羅斯福手下當過副總統，他在影響上就和華萊士不能比擬，而且他的生平也不足以對我們有什麼更多的啓示。

亨利·華萊士於一八八八年生於衣阿華州的阿達爾郡。他在十七歲時已經開始作雜種玉蜀黍的試

驗；二十一歲時畢業於衣阿華州立學院，接辦他祖父所創辦的家營報紙「華萊士農人」(Wallace Farmer)；

一九三三年時被羅斯福總統委任爲農業部長，這職務他的父親也會一度担任。一九四二年他主持

「經濟作戰局」，並被任爲「供應優先與分配委員會」的主席。一九四三年，他仍任「經濟作戰局」主

官，會對商務部長瓊斯經營「建設銀公司」的做法大施抨擊；爭吵的結果，羅斯福斥責了他並把他調

離了「經戰局」。按當時情勢看來，他的政治命運似乎漸趨沒落了。以後一九四四年總統大選，民主黨

全國委員會，拒絕再度提名他爲副總統候選人，但是他仍爲羅斯福——杜魯門竭力競選，一九四五年一

月，羅斯福就任四屆總統後不久，就保薦他爲商務部長。參議院會一度延期核准案的投票，一直到三月

一日才正式通過。（譯者按：同年四月十二日羅斯福去世，杜魯門繼任總統，羅斯福內閣各部長如摩根韜，伊克斯，斯退丁紐斯等次第辭職，最後僅華萊士一位老閣員留任，這期間他曾倡導六千萬個工作的運動，終因杜魯門的外交內政種種政策都令他不滿，他於一九四六年九月間公開發表演說，反對對蘇強硬，反對美國單獨保管原子祕密等方針；結果外交當局拒不接受，在美國朝野引起軒然大波，華氏便毅然引退，改任著名自由主義刊物「新共和」的主編，依然為爭取和平民主繁榮而奔走呼號不已。）

這是華萊士生平的概要，可是這裏還漏去了他最驚人的一點。自從富蘭克林·羅斯福去世以後，他在政治上擁有着較任何人為多的擁護者。同時，羅斯福既已去世，華萊士成了當代全國性局面內最引起爭論的人物。

他是怎樣的一個人呢？

他在公衆場合侷促害羞，服裝不講究，頭髮蓬亂，完全不能閒聊。什麼人在人羣中初次看到他，一定以為他是漫畫家筆下美國中西部的農民，決不會相信他是個政治家。事實上他與其說是一個政治操縱者，無寧說是一個農民還像些。他露天講話每每比在禮堂裏說得漂亮。

政客們不會了解他。他並不按他們那種規律玩他們的把戲。如果他們認定他不過是一個不合時宜的簡單人物，他却以卓越的行政工作遏制了他們這種想法，由於他有這種行政成績，倒使他們自己覺得像清客一流的人物了。當他們一旦覺得有辦法對付他了，可是他卻表現一種他們不能阻折的決心，使他們終於什麼辦法都落了空；而且他們對於他的究竟是堅決還是固執，也莫名其妙。他們在背後往往取笑他

的口齒不靈，可是在他們用早餐時，却往往在他們桌子上發現了他寫的一本書或一篇文章，它是那麼明確與雄辯，甚至使他們感到使用陳腔爛調已不如遠甚。他們決定要革去他的官職，會勾心鬥角地設計把他趕出政治舞台，可是同時發現他列身於一大羣熱心的追隨者之前，大步前進，因而使他們不敢漠視。他們最後決定稱他爲一個「神祕人物」或夢想家，而同時又想起了他編過一種報紙，創辦並經營過「創始玉蜀黍公司」，出售他的雜種玉蜀黍種子，一九四四年營業總額達四百萬元；他主持的農業部行政空前完善，大戰時美國所以能有足多的存糧，以應付本國以至於盟國的需要就得歸功於他。

事實上他外表雖然簡單，的確是個非常複雜的人。

那些了解他的人也經常爲他的見聞廣博感到吃驚。他對什麼都抱好奇心，每着手一件事情一定考究它的歷史與背景。當他對投擲武器感到興趣時，他就博覽他所能找到有關投擲武器的書籍，並進一步研究氣體動力學發展了一些理論，並特別製造一種投擲武器，以測驗他的推斷。

他研究和他一起工作的人們，像對任何他關心的事情一樣周詳，而他們也都能以對他完全效忠來答復他。

他珍愛康健，再加他原是長老會基督徒，因而他成了一個戒煙者與戒酒者，而且是各種體育的實行者。他能走時決不騎馬。他不玩牌，不賭，也從不吹牛或誇誇其談。他曾探討各種宗教文學，以期爲經驗的神秘找個答案，他曾背離他祖傳的長老會教籍成爲聖公會以及聖公會高派教會的參與聖餐者。他精通「聖經」，演說時每每能引證聖經，羅馬教皇的通諭與其他種種宗教文獻。同時他又熟悉科學，自己

是農業方面的一個能幹的實驗科學家。

當他準備訪問南美時，他溫習西班牙文，以便直接和南美人士與公眾談話，而無須通譯。當他準備訪問中蘇時，他又研習兩國文字，以便他說話時能為兩國聽衆了解。此外有一點也是他具有代表性的行為，他帶了些種子到中國去，那正是中國土地所需要的。

把所有這些具體情形加在一起，我們不難發現一個奇人——華萊士，他是個非常的政治人物。在我們政界裏沒有一個別人像他一樣。他打破了所有政治規律。按聲譽來說，他是每天在成長發展。

三代華萊士

他的出身正好是我們所謂典型美國人的出身。他的曾祖是一個原籍蘇格蘭——愛爾蘭的移民，他在賓夕文尼亞州一處田地上居住下來。他生了一個兒子，取名為亨利。亨利以後當過一個時期牧師之後，就移住衣阿華州從事耕作，最後並購買了一張農場報紙，他主持出版時，改名為「華萊士農人」。亨利生了個兒子，依舊取名為亨利，這個亨利長大後會協助報紙的編輯，後來榮任哈定與柯立芝兩任總統的農業部長。他是本書主人公亨利·華萊士的父親。三代華萊士的事業互相交織極密，因而我們要是探究一下華萊士一二兩代對華萊士三世的影響，實在就無從了解今天的華萊士。

老祖父華萊士是個勤懇的人，不斷從事農事科學化的實驗。他精通純種牲畜的智識。他種植避風樹林。他是衣阿華州第一個在從沒有種過三葉草的地方播種三葉草的人。他爲了傳播改良農事的智識向他

報紙的讀者宣傳，樂此不疲。

他是一個羣衆活動的先鋒。他攻擊「牛肉托辣斯」，痛斥鐵路業，又當衆指罵過洛克斐勒，摩根以及華爾街的金融業，因為他們歧視中西部的農人。他抱持國際主義的觀點，曾爲了國會不通過互惠關稅的辦法打開世界市場，對它大施抨擊。

他的聲望日高，一度曾被邀充當美國參議員的候選人，可是他拒不接受；但是他是西奧陀·羅斯福的朋友，因而接任爲「鄉村生活委員會」委員，並担任全國水土保持大會主席。他也有一種深切的宗教關係，他的報紙上刊有主日學的課文，這種課文會爲一部分正常的信教家庭——爲數成千——在星期日高聲朗誦。他具有爲人尊敬的特性，因而整個衣阿華州都稱他爲「亨利大叔」。

在一九一六年老華萊士去世之後，亨利二世繼任報紙的編輯，五年後，他當到了農業部長。他上華府接任時，正當大戰景氣之後農業方面開始了憂慮困難，他大部分精力化在對當時的商務部長胡佛鬥爭；首先，他設法通過「麥克那里——霍琴 (McNary-Haugen) 計劃」，提高田地價格，其次是防止市場司與外交司這兩個機構改隸於商務部。他在任期內去世，而他傳給華萊士第三的部分遺產就是對胡佛的痛恨與對商務部的密切關懷。

亨利一世對三世也發着一種持久的影響。亨利華萊士三世曾說過：「我以爲你可以說，我對於神學，哲學以及古典文學的興趣都得自我的祖父。」他另外說過：「祖父一向努力於使基督教義應用於變動的情勢。他主張變。他知道變是不可避免的。」他曾講起他祖父對於前一次大戰的看法，他說：「祖

父對戰後的憂懼比對戰爭尤甚。他曾經歷過一次重建，領受過這種滋味。你如果去翻查一下我們的舊報，你一定會看到早在一九一九年一月我已經論到過以後勢將發生不可避免的危機。這些都是我祖父的教誨。以後危機終於發生了，這次大戰戰後的苦難也勢所不免。」

他們從祖到父，從父到亨利·阿伽特·華萊士，這三代一脈相傳的路綫已竭盡堅決推行的能事。他們三代信念中創造性的推動已為當代世界的社會計劃收得了效果。華萊士的信念是一個因襲的信念，即幾代的才智集成了他的才智。他像他的祖父一樣，設法把這種信念演變成當代的術語。正像一九四二年有位作家說過，亨利·華萊士是抱著一種假定的前途，即人定勝天，「一天國」是在我們的掌握之中。他那種被稱為新流行的思想聽來是奇怪的。可是他的祖父一定能立刻完全了解。他所鼓吹的一種思想深植於美國傳統，而他的那種感念也正是美國歷史與土地所產生的影響的成果。

這是他所以獲得廣泛支持的因素之一。他缺少威爾遜所運用的那種口才與修辭本領，但是他的發言出於類似的背景，使用相同的語彙，使用着為相同的理想主義所孕育的相同的實際才智。說起來真奇怪，他已是當今政界用這種習語來闡述意見的碩果僅存的一人。羅斯福總統沒有這種韻律與和音；華萊士的談吐是實際的，已脫出了古老文學的窠臼。他的格調是一種優秀記者的格調，簡單明白，沒有邱吉爾那種演說的光彩，或威爾遜那種古典聖經上的和音。我們對於政治人物具有傳教士的氣氛已經習慣，林肯的發言幾乎完全像欽定聖經的那種韻律；西奧陀·羅斯福與布拉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在他們的演辭中都有說教者那種滔滔辯才，威爾遜是有意地模倣那些先賢。華萊士發言在言詞之間具有相同

的傳統。我們果真了解他的認識，那末他不說話也已經一半信服了。我並不打算強調這一點，但是我想，我們可以把它的一部份呼聲認為是他家庭之聲的重振，因為這種聲音在我們的家史上也往往有它的一部份。

這裏更深一層的真理是：他所說的不僅是演詞的一部份，而且根本是他爲人的一部份。他的剛直係建立於他所創導的那種道德原則，而他的剛直也正是他具有說服力的確實來源。他這人能照顧到人民，而人民敬愛着他。

曲解的人決不能了解這一點。有些還頗以這一點爲憾，但是這該是經驗中的一項事實。有一位年青朋友告訴我：「我的妻子曾在經濟作戰局他的辦公處內工作，她甚至對於他走過的地方都崇拜起來了。」在前次總統大選時，華萊士曾在麥迪遜廣場的會議中演說，去聽過的人回來時連眼睛裏都放出光彩來。這種情形我生平也只見過一兩次。

我還可以舉許多例，而且當事人也不懂是年青人。我知道全世界即使與他那種幾乎是清教徒一般生活方式相距甚遠的人，在談起他時也頗具莊重的口氣。

華萊士在那種容易出風頭的淺薄的人們中間所以顯得特出是有原因的，當代凡要求勇敢精神的人也都和這一點正相呼應。我們每感政治人物缺少誠實。我們不注意他的缺少講台技術，而相反以他的政治上的忠厚爲傲，因爲我們在這種情形裏發現一點，就是他忠厚就不會油滑。我們相信這種誠實是美國的，我們同時在他身上發現了我們可引以爲榮的一種美國主義的體現。我們樂於有他充作證明。

亨利·華萊士是個複雜的人，但是他在人格上具有一種特性，能贏得了解他的人們的信心，並能獲得平民們出於明智的稱譽。

第二章 華萊士與羅斯福

一支美國隊伍

一九二三年春，摩根韜來到衣阿華州得梅因市華萊士的辦公室。摩氏這次係周遊全國，拜訪各處要人，以便聯合支持紐約州州長羅斯福充當民主黨總統候選人。他的想法是實際的，他的理論是：「這位羅斯福是個政治上的幸運兒。他的發展無可限量，他具有的遠景正合乎你那種進步的見解。爲什麼不加入這個定有成效的運動呢？」摩根韜在華萊士處一直耽到吃過晚飯。然後由華萊士駕車導遊得梅因全市，陪他參觀一番。這位來客在當晚搭夜車離開。

摩根韜的所以知道華萊士是因爲他自己也有興趣於農業。他曾一度擺脫紐約市的業務，在紐約的北部，致力於飼養種牛，並編輯一種農業報紙。他有一個朋友也參與羅斯福的競選，此人名叫杜格威爾（Rexford Tugwell），曾經與華萊士相識，並一同商量過農業問題與立法。也就是他們兩人希望把華萊士拉進羅斯福的陣營；摩根韜的訪問得梅因正是這種活動的開始。

一九三二年七月，華萊士收到康納爾大學的一份請帖，請於暑期班中作一次關於農業問題的演講，並附送車馬費一百五十元。他回信說因正忙於雜種玉蜀黍的工作，無暇遠行。可是幾星期後，摩根韜打

電話給他說，羅斯福希望在八月間某一天請他過訪海德公園一次。這時候華萊士並沒有多少可供特別旅行的儲款，因此他又告訴康納爾大學，如果他們能在八月間排個日期，他可以出席演講。以後康大接受他的建議，並以一百五十元支付他東行的旅費。康大將來的歷史家也許會在它的編年史上註一句話說，該校支付了羅斯福與華萊士第一次會晤的用費。

華萊士在康大演說之後，當夜就在奧爾巴奈度過。第二天他特別早起，在摩根韜約定用車子接他去海德公園的時間以前，參觀了一下州議會。他在那裏與州博物館的一個公務員隨便攀談。這是他打聽羅斯福手下工作人員對羅氏印象的方法。這人的報告並無過譽之處，但是華萊士對於下列這件事實感觸頗深，即一個州公務員對於批判州長毫無忌諱，一無對密探與報復的恐懼。更有趣的一點是這位紐約州公務員所作對於羅斯福對待下屬的方法的批評和他以後羅氏任總統時人們的觀感相同，而且有些態度在對華萊士時也一樣使用。

華萊士回旅舍後，就遇到了摩根韜，於是他們驅車巡往海德公園。其時羅斯福正忙於準備他來秋競選，而他的心思也不停在各個問題上打轉，因此他們倆的談話涉及了許多問題。關於農業方面羅斯福剛讀過堪薩斯州州長伍特林的報告，計劃在大片土地上植以樹木，他確信計劃有實現可能。華萊士因為剛作過關於雜種玉蜀黍的演說，又熱衷於土壤保持這一項工作，因此他大談土壤與穀物。這次是他們倆第一次交換意見。

以後總統競選展開時，華萊士作了幾次擁護羅斯福的演說，其情形一如前幾年他擁護奧爾·史密斯

(Al Smith)，不過這番演講的次數比較多些。這時期他只看到羅斯福一次，那時他去俄瑪哈聽羅斯福演說農業問題，可是他並沒有和羅氏接談。

大選之後，十一月下半月的時候，羅斯福業已獲選為總統，當時雷門·莫萊(Raymond Moley)造訪華氏，請他去溫泉與新選的總統晤面。當他到達時，羅斯福正在修面，他堅邀華氏入內室，與他談話。他發現這位新的全國領袖正在緬懷過去，因為羅斯福以興高采烈而迅速的語調暢談他年青時期如何在堪普皮洛附近找尋藏匿的財寶。他詳談了許多燃起他兒童時期想象的海盜以及他們傳統的陸上目標的故事，還談到他朋友與他自己挖掘沙土，尋覓不可捉摸的黃金等遠征的經歷。華萊士對於他的這種懷念頗感興趣，以後有些記者問他，對新總統印象如何，他答道，「他是個冒險家」。這是見諸史頁的一件事。

不過他這次訪問比較嚴正些的結果是羅斯福要求他在華盛頓留下來，與國會領袖們磋商，如何將他的農業思想擬成立法計劃，同時溫泉這次嚴肅的會談中也提到什麼思想應成爲中心，華盛頓那些主要人物應去拜訪。

以後幾個星期華萊士就在華府建立與國會的關係，並擬具方案以便提出於來屆國會。一九三三年二月，羅斯福拍電報給他，邀他在羅氏新閣內擔任農業部長。華萊士接受後，就從此成爲羅斯福政治生涯中最熱心的一個夥伴。

個性相反的結合

華萊士與羅斯福兩人個性差異恰成對照，他們倆類型的不同，使人難於想到別人可與比擬。羅斯福活潑，華萊士莊重。羅斯福愛見新人像喝陳酒一樣感興趣。他喜愛四周站滿了人，由他鼓勵他們神采飛揚。他們愈興高采烈，他也就愈覺得他們富於激勵心，而他自己的即席言辭也愈加精彩漂亮。他極喜才智，愛與人鬥智。華萊士對這種事情就趨趨不前。他寧願與一小羣熟人，最好少到一兩個人會談，這些人能熟悉某一種思想，把它提綱攜領，鞭撻入裏，將真理一一闡述明白。他也珍愛才智，而且每能欣然接納，但是他對於儘力鬥智，正像要他在參議院會場裏倒立一般不願意。

羅斯福係從廣泛接觸中獲得思想。他對細節沒有耐心。他要求所有報告要短，最好少到一頁，去掉所有空話，要求一目了然。有建議，他歡迎口頭的。他希望迅速了解別人的心意，當他認為他已經明瞭別人要說的話時，他就說，「我懂得你的意思了」，並頻頻點頭。不幸的是，有些人以為總統點頭是表示「我贊同你的意思」，離去時就認為總統已允准他的想法。其實他並沒有，他不過簡單聽取了他們的觀點，並注意着它對於他今後的考慮會起什麼影響。

華萊士樂於探討細節，他習於衡量計算。他要求他能澈底明瞭的報告，如果有人和他談話，他一定細察他的意旨，探究意見的事實根據，並申述他自己的疑問與異議，力求對他所沒有解答的問題不存一點誤會。

舉例說，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他演講「全國充分就業政策擬訂時統計的功用」。演詞中有一節會謂：「我最初對統計感興趣早在一九一五年計算玉蜀黍與豬的價格比率時。」以後他又說：「我會探討使用多種的相關係數，一方面去決定夏雨與溫度的關係，另一方面決定玉蜀黍的收成。」我們即使縱情於想像，也斷乎不會認為羅斯福會探討過某一事物的「多種相關係數」(Multipl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羅斯福與華萊士兩人的這種對照可以一九四四年競選時他們往來的電文作奇妙的證明。羅斯福在芝加哥的一次演說中提出六千萬個工作的目標，事後華萊士拍電給他說：「你所懸六千萬個工作的目標也許稍嫌過高，但我頗以閣下的胆大為榮，而且閣下會說過，美國能做到看來似乎不可能的事情。我們敢預言閣下將贏得卅六州的擁戴，並獲得超過敵手三百萬票的多數。」羅斯福回答說，華萊士喜歡他在芝加哥的表示，他極感欣慰，同時華萊士果能設法使他的卅六州與三百萬票多數的預言實現，他決預諾為六千萬個工作的實現而努力。

華萊士知道六千萬個工作對於一種正確的統計數字實在是一種挑戰，而羅斯福却視電報的來往是一種預諾的競賽。以後令人高興的是結果證明兩個人的數字都沒有錯。羅斯福大選獲勝，得票超過對手在三百萬以上。大選以後，華萊士為可能發展的工作數目作了幾個月的研究，一九四五年三月四日他終於告訴我六千萬是近乎正確的數字。

這兩種志趣就像這樣在一起工作。華萊士對於總統迅速而近乎直覺的精密判斷極感迷惑。羅斯福對

華萊士思想的周密無限贊佩，對於他才華的完美具有不可言喻的信任。他同時具有採納華萊士意見的氣度，並常使用它們以充實自己的思想。他們倆一個敏捷，一個刻苦，兩人的結合正好成了一個隊伍，他們相互補充，收效極宏。

他們所以能結合的有力因素是他們兩人抱負着同一種思想。華萊士完全相信羅斯福在這時期已爲他的國家與人民完成了以他這種秉賦所能完成的工作。他的所以接近羅斯福就由於羅氏雄才的吸引。事實上性質相反的人也比較容易接近，但是華萊士對羅斯福的效忠並非僅僅出於個人感情。他看到羅斯福是在當時這種危機中最能實現他所抱高於一切個人雄心的理想的一個人。我會聽到有人說，華萊士對羅斯福的忠誠使他忍受羅氏所予任何待遇，這是華氏軟弱的象徵。這一點我不能相信。我以為他所以效勞羅斯福，是因為他確信羅斯福效勞着他所抱負的一種目的，而他爲了追蹤一種目標甘願隱沒自己個人的尊榮正是真正偉大所出的一種力量。

羅斯福具有爲人活潑這種從政的有利條件。他善於挑動。他走進一間屋子，一定要使滿屋子的人都知道他的到臨。他不願被忽視。沒有人能不照顧到他。在他作風上具有一種在他四周創造一種磁性的能力，因而每一個人當和他在一起即非主動也必被動地激動起來。他能够而且也會實在做到，把這種特性在廣播中放射出去。他不論到那裏，每次都不知不覺地發生這種影響。他本人會是一場表現或一個表現者，而且頗以他所發生的影響爲快。如果他不成其爲政治家的話，也勢必成爲另一種名人。他具有一種不爲人們忽視的不可言喻的識別力。因此他可真是自從他堂兄西奧陀·羅斯福以來美國歷史上最多爭論

的人物，而且他擁有一種在他同時代無人可與比擬的深切而廣泛的感情。可是另一方面說，他至少是林肯以來政治人物中最受人痛恨的一個。和他接觸就像觸電，刺激突然而巨大。按深奧的意義說，他本質上就是一個政治家。

華萊士就沒有這種活潑性。他會悄悄走進一間屋子，不受任何人注意，而他他的確甯願如此。有些和他一起的人們時常與長時期受不到他一點意志的感染。他激動得非常遲緩，而且只有在對一種正確的刺激起反響時才真正興奮。他熱烈得遲緩，但這種熱最後能滲透一切，而且若干時後總有許多人受到了它的影響。他是像自然力一般強大的，但是並不震動得人們注意到他的存在。他像一條向海緩緩流動的河流，穿越懸崖，並悄悄地發出力量，看來是通行無阻的，他擴展的不僅是他的權威而且是他的影響。他在美國已成爲一個巨大的個人力量，擁有大批完全對他效忠的追隨者。他的敵人們對他本人並不仇恨，仇恨的是他的思想。他也是一個政治人物，但政治思想家的性質大於政治活動者。他贏得他的追隨者全靠他的人格與堅毅的力量。

我們說華萊士在政治活動方面不如羅斯福並無多少新鮮意義，因爲羅斯福的確是傑斐遜以後，美國最能幹的政治操縱者。如果我們說華萊士是決非常人所了解的政治活動者，這還比較接近真理。他的生活與作爲完全以他的信念爲依據，絲毫沒有考慮到他的行動對於他自己幸運的影響。羅斯福往往按他個人的聲譽的考慮去平衡他的信念，因此我們可以說，他同時受着雄心與目標的推動。他像個老船戶，懂得如何去趁風轉篷，把競爭者的風都借過來供自己使用。在他走向目標的途中，他並不反對轉灣抹角走

曲折路綫。他懂得政治的權術，而且使用它也無所猶豫。

華萊士就不是個船家，而是個賽跑者。他依仗出人頭地的固有能力直奔終點。他不施詭計，不玩技巧，認定一種光明正大的政策與袒白無私的作法是他需要的全部方針。

這種情形使華萊士比羅斯福少見成效，使他更容易輕易受騙。羅斯福旨在使用每一個合乎他意圖的人，因而他假定任何別人都旨在使用他，他必須小心。華萊士旨在誠懇地為一種思想服務，因而他假定每一個別人也同具誠意。由於無所顧忌的人悠然利用他這種善意，他終於有了一種驚人的忍耐力。由於他希望與人為善，因而判斷錯了人。舉例說，當他任商務部長的提名案正在鬥爭中時，他聲稱不相信有那一位參議員真正不喜歡他，而事實上若干參議員不惜使用一切手段驅除他。不幸他這種缺乏判斷不僅使他低估了敵人，而且高估了他若干知己，結果是他有些接近的人所提建議既無意義又不高明。華萊士是正被比較渺小的人所支配，而羅斯福就知道怎麼去支配他們。

不過，最後分析起來，羅斯福與華萊士兩人都清楚於他們的意旨，並按他們自己的判斷行動。羅斯福吸收他所遇每一個人的智慧，並以特別尊重的心情聽取他少數顧問的意見，可是除非他係憑衝動行動，否則他一定按他自己立定的主意，作成自己的結論。他那活躍的腦筋吸收千百個印象，然後引起一種堅定而比任何一個印象尤為周詳的概念。一旦概念形成而為他所把握，那末一百個顧問的詭辯也休想改變它。這個過程是幾乎憑直覺而行的。

華萊士的獲取結論係靠單獨苦思。他對事物作周到的思想，從各個角度去加以觀察，經過一種試

驗，否定與接受的歷練，才艱辛地確定其最終的結果，這過程正同科學家在實驗室內採用的技術。但是試驗一旦完成，他對於結果正同科學家一般確信無疑，除非有新的因素提出，沒有人能說服他重作考慮。當他獲得結論之後，他一定全力推行，磨頂放踵，在所不計。

這又是羅斯福與華萊士不同的一點，而這一點對華萊士是有利的。羅斯福總統用人，每每不能從容捨棄。他當一個行政官的大弱點就在於他這一種柔順之感。他對於妥協，老馬識途，一向認為不論什麼糾紛，包括他自己的糾紛在內，解決之道不在於驟然破裂，而在於提出折衷辦法。如果兩個機關發生衝突，他創立一個包括兩者的新機關。如果任何個人失敗了，他就把他放置在一個新的職位上。

可是，當華萊士認為某一機關或個人業已完成任務，他就捨棄了它或他。在感情上說他並不願意革除任何人，但是他的理智告訴他應該這樣做，他一定澈底實行，不避怨懟。這就是羅斯福一向沒有的訓練的緣故。

總而言之，這兩個人的所以合在一起就由於他們天賦個性的恰成強烈對照，而當他們一致盡力時，他們所効勞的運動的收益就無可計量。十二年間，他們的互相效忠，這一點就是關鍵。

第三章 首次與瓊斯衝突

思想的對比

羅斯福於充任八年總統之後，正在物色一名競選副總統的搭檔。加納與反對新政的一派人愈越接近，而且在羅斯福宣布就任第三屆總統候選人以前，加納在黨內鬥爭中與詹姆士·法萊以及反羅斯福系站在一起。加納與羅斯福之間的私人關係已緊張得幾近破裂。以後在代表大會上他們終於公開決裂。不過雖有如此反叛，羅斯福依然掌握着多數代表，於是霍浦金斯奉命前往芝加哥，提名華萊士為副總統的候選人。

羅斯福所以堅持提名華萊士有他私人與政治兩方面的原由。私人方面是指華萊士此人的抱負與個性為他所敬佩，政治方面是指他已揭櫫「新政」，他打算有一個在新政上贊助他的人作他的左右手。

代表大會反對這個提名。華萊士的名字被提出時，一度引起嘲罵。霍浦金斯對於這事情的推動束手無策。但羅斯福坦然宣稱，除非華萊士也當候選人，否則他決不接受提名。代表們都知道他們如果沒有羅斯福，大選贏不了，因而他們快快地提名華萊士為候選人。

華萊士是一種新的副總統。副總統的作為通常限於充當參議院議長，除此以外就一無作為，可是他

一反這種做法，他利用副總統的地位，發表他關於社會與經濟問題的主張。他周遊美國各地，對美國各界演說，發表他所抱社會變革的意見，並對所有各種引起激烈爭論的問題，大膽發言，毫無忌諱。他終於被認為進步與社會正義的先驅代言人。

那些原先打算不要華萊士當選副總統的人對華萊士担任了一個傳統地不甚顯要的職位，也仍引以自慰，按他們想來，華萊士從此將冷擱四年了。

可是一九四一年八月間某一天的早晨，他們這種安慰粉碎了，他們在報紙第一版上讀到總統委華萊士兼任「物資優先與分配委員會」主席的消息。他又充當重大的行政工作了，而且位置高出於如此可畏的工業家如克努森與納爾遜等之上。他被賦以處理生產上的混亂，並推動全國切實準備的重責。

他力圖完成這個任務，但是他那機構的組成以及權力的衝突使他苦無良機。不到六個月的工夫，這個「物資優先與分配委員會」撤消了，總統另設「戰時生產局」，對全部生產集中控制，並以納爾遜為局長。

華萊士被另外給以「經濟作戰局」局長之職。他的責任經規定為「提供，發展並協調所有為防護及加強與國防有關的美國經濟關係之政策，計劃與方案」。他延聘了米洛·潘金斯(Milo Perkins)任他的行政顧問。

他以巨大的努力進行工作，終於使該局的作用發揮得既宏大而且廣泛。他鑒定美國所有各種作戰需要，並進而探討玻璃維亞的錫，巴西的橡皮，智利的銅，以及所有中南美各處美國作戰所必需的物資。

爲了南美工人

他爲美國需要所作貨品清單曾經科學的規劃。他知道美國將需要些什麼。他預見將來鬥爭的艱巨，於是規劃過巨大的購置方案。

但是他要進口他希望中的物資，必須得到「建設銀公司」主官瓊斯核准。因爲瓊斯負責付款，他有權決定什麼他可以付款。他對於華萊士的數字不表同意。他對於打贏這場大戰所需物資的估計異常保守。因此他對於所有合約都有反對意見，不少並遭拒絕認可。以後，一九四二年春，「杜魯門委員會」（譯者按：參院調查委員會，其時以杜魯門爲主席，故名。）調查全案，曾猛力抨擊瓊斯，責他對橡皮的缺乏應負責任。此外還有不少事件證明華萊士是對的，而瓊斯犯了錯誤。

我們的故事講得遠了。當華萊士開始在南美購貨時，他特別對於生產物資的工人處境注意起來。他發現有些工人十分可憐。他不滿於用美國金錢僅僅僱用這輩流汗的（以至於較流汗更慘的）工人，因此他撥定一筆經費，設法推行一個改善工人境况的方案。他並不致力於使任何一國的工業發生革命，不過他相信一項美國的理論，即工人生活與工作境况愈好，他們工作愈有效率；因此他投資於從事使工人區域改善的試驗。這工作除了人道主義這一點以外，由於開支於生產量的增加中可以得到更多報償，的確是樁好事情。

可是華盛頓因此引起了軒然大波。有人叫罵華萊士企圖推行新政於南美，他居然設法提高爲美國効

力的鄰國的生活水準，實在犯了不可寬赦的罪孽。

瓊斯對於這種開支冷然而視，只說他決不為派送一批社會工作者到南美去從事他所譏諷的「提高活動」簽發支票。

華萊士被這種愈趨緊張的關係所阻撓與騷擾，終於把紛爭在白宮提出。總統得悉以後，就下了一個行政命令，迫令瓊斯為所有華萊士核准的發票簽發支票。同一行政命令並將當時屬於國務院的某些職務移交「經濟作戰局」辦理。

當時的國務卿赫爾對華萊士的觀感不甚良好，他用一種比較粗率的文字，把原案轟回了白宮，於是總統廢止了關於國務院的部分，但仍堅持對於瓊斯的限制。

以後幾個月中，瓊斯與華萊士之間不斷發生爭執，也許是羅斯福執政期間，部與部之間最激烈而持久的爭執了。瓊斯留難每一個合同與每一張發票，一再聲明他決不參與什麼社會十字軍。

痛斥瓊斯

一九四三年七月，華萊士出席參院撥款委員會，把瓊斯痛斥一頓，其酷烈為美國歷史上對一位部長的攻擊所僅見。他的公開談話既不送「戰時情報局」，也不呈白宮，他指責瓊斯施行「破壞主義者的戰術」，「害人官僚政治」，「有害的誤說」，並稱瓊斯為「胆小而刻板的」工作者。

他企圖說服參院委員會准許「經濟作戰局」直接支付它所需要進口的戰略物資，不令它坐待瓊斯以

建設銀公司主管的身份簽發支票。他抨擊說，由於瓊斯沒有認可經濟作戰局所要輸入的貨品的帳單，已經「卑怯地使政府積聚物資一事失敗」。

瓊斯答道經濟作戰局是「歇斯的里」的，它主要不在獲取貨品，而在倡導更豐裕的生活。他攻擊華萊士的談話裏充滿了「惡意與邪說」，並謂「任何重要方案，我們都不會遷延，以致發生嚴重影響。」當他與華萊士當面對質時，他拒絕和解，而堅持國會應調查他所稱的「卑怯的攻擊」。

總統遭遇到這種官場裏的激烈內爭，終於採行了斷然的方針，即政府各官員的爭吵必須停止，同時他把華萊士調離了「經濟作戰局」。

華萊士這番猛烈的攻擊也許直接對總統發表比較妥當，而且可以附帶警告，如果不想辦法，決訴之於參議院。但是這番批評即使不說指責，也就像任何一個熱血份子所發表的一樣；當時他確信瓊斯等人無遠見阻撓着戰爭的準備，而且配合以人身攻擊，已淪為最下流政治劣行。

杜魯門委員會的報告會代陳了華萊士各項政策所需要的理由。華萊士的確公正而有遠見。就因為瓊斯的意見得逞，而華萊士的主張失勢，一旦作戰的要求增高，橡皮以及其他物資就發生缺乏了。

爭吵的根源

不過，除了儲存主要物資這一點以外，這個爭吵事件也顯露了兩人社會與政治思想的恰成對照。華萊士關懷工人。瓊斯並不。他坦然申言他根本不管他們的事情。華萊士會說，不論那一個人的工作，凡

他支付美國金錢的，都是他的事情。高貴的讀者，如果你認爲這樣的話是感情用事或者無意識的話，那末請你即刻把這本書丟掉，捐充廢紙爲妙，因爲你壓根兒也不會了解亨利·華萊士。

他根據着健全的理論站定立場，認清照顧工人是樁好事情，而且它也是好的道德。它是不致於有何抵觸的。它的意義是：由於我們高度組織的工業社會使我們關係愈趨密切，我們正發現着一個新的原理，即只有全體生活好才能保證我們每一個人生活好。

在以前，除了專爲宣傳這種特別目的的說教者以外，任何人在商業場合談商業上的道德，他一定被譏爲理想主義者而不予重視。如果他有錢，他會被待得像個可愛的怪人。如果他沒有錢，就一定被視若無覩。一個舊時的僱主往往是他朋友心目中的好脚色，「十誠」的服膺者，他工人的監護人，慈善事業的贊助人。按僱主們自己那種道德的眼光看，他是個好人，但是他永遠不會同意，這種道德也該貫徹於他的商業關係，特別是勞資關係。他一定認爲這些是只問定貨單與現錢的嚴正買賣。

最近，商業上也吸進了一種新的趨向。它叫科學管理，把生產上心理的因素也考慮在內。它的要旨是待工人像人。那些試驗過的人，都收到了好處，因此他們現在也甘心接受了。現在大家一致接受的一點是道德好買賣也好。

少數比較開明的工業家對於下述一點已經醒悟，即我們新式機器所增收的利益應由僱工與僱主公平分享，這也是一樁好的事情。他們看到工人擁有良好生活條件與足以够用的工資的保證，就成爲更有効的生產單位，同時是具有潛力的消費者。他們開始看到了福利與財富之間的關聯。他們的工人就是他們

的商業，也是其他僱主的工人。華萊士所闡明的也就是這種見識。

他在進行這項工作時，特別給予工業一種有力的貢獻，廣言之，自然也給了整個國家一種有力的貢獻。

瓊斯對於大戰的眼光放得太低。他與他一類的人對於和平的需要眼光也放得太低。他們這樣做將使我們在預計的艱苦時期到來時無能為力。

華萊士早已預料，歐洲戰事結束後，我們將有四五百萬人失業，太平洋戰事結束後我們將有一千到一千五百萬人失業。消費品雖有一時繁榮，但除非就業能夠充分，繁榮者也佔少數，戰時的積蓄可能在十八至二十四個月間用罄。

平民們自然担心中這一點，他們所以響應華萊士也就由於這個原因。

第四章 「請讓位給亨利」

白宮來鴻

羅斯福在四度就任總統之日，曾致函商務部長瓊斯。這信注定了要引起一場政治風波，而且其洶湧程度也為風波特多的羅斯福執政期間歷次風波所不及。這事情也告訴我們羅斯福的確是一個有經驗的政治家，他決不致於不知道他的行動會引起什麼事故。這信要求瓊斯辭職，並宣布由華萊士繼任。

信內最突出的幾節如左：

「亨利·華萊士對任何他有自信的工作都能勝任愉快，競選告終時我已告訴他關於委任新職一事。他於競選時會對我們的運動，表示極度熱誠，曾周遊國內不少地方，為選票而不斷奔走呼籲。雖然他本人並不列名於選票，但是仍爭取選舉勝利，不遺餘力。」

「他已告訴過我，他認為商務部長一職他最適合，他可作最大貢獻。因此我認為副總統在這一新的政府內應充任此項職位。」

「本人所以要求閣下以目前職位禪讓與亨利，也只為了這個原因，同時本人必須告訴閣下，此事並非表示對閣下的作為不予珍視，本人希望閣下仍能繼續擔負政府一部份權責。」

於是各方竭力猜度這信隱藏的意義。最顯著的一種是說，瓊斯對羅斯福的連選一向表示冷淡，甚至被懷疑他也參與得克薩斯州在「選舉人團」內擊敗羅斯福的計劃，而華萊士對他的長官非常忠誠，雖然羅斯福這次並沒有支持他任副總統候選人的提名。支持總統的人們說，總統要求周圍不能還有不可信賴的人，這次就是他對部下的一個表示。譴責羅斯福的人則說，這正是像歷來實行政治分贓制的宣告一般勢利的做法。

有些人認為這信還有微妙的動機。他們說攆走瓊斯而同時把華萊士置於他無法獲得核准的職位上，也就是攆走華萊士。因此，他們說，羅斯福一面去掉他所感到不忠的現任部長，同時爲了感恩而委由華萊士担任，而另一方面因爲參議院一定不會核准他，也就是去掉華萊士留在他輩底裏的尷尬局面。按這種理論說，羅斯福一定還會把商務部長與建設銀公司主席這兩個職位給與另外一兩位應得的民主黨人。不論人們對這封信的解釋如何莫衷一是，可是說它充滿了政治炸藥，那幾乎是人人同意的。

這炸藥不久就開始爆炸了。代表瓊斯故鄉得克薩斯州的參議員康納利（也即參與擊敗羅斯福計劃的領袖之一）就出而支持他的同鄉，指總統的行動爲「不幸」；而總統的一些宿仇採取了更兇狠的態度，於是戰鬥展開了。

參院財政委員會主席喬治（Walter F. George）提出了一個由商務部撤出所有借貸機構，使它們恢復爲聯邦獨立機構的法案。以後這一項法案與華萊士的任命案都提交參院商務委員會審查，該委會的主席貝萊（Josiah W. Bailey）立刻宣佈他贊成喬治法案。這事情發生在羅斯福出國參加與邱吉爾，史達

林在雅爾達開會時。

商務委員會以後進行審查，瓊斯與華萊士都列席陳述。他們分別參加的兩次會議的恰成對照，正為英國作家史維夫特 (Jonathan Swift 一六六七——一七四五) 或蕭伯納寫諷嘲劇提供了極恰當的材料。它也使國家對於未來方針的選擇一事戲劇化起來。

舊派與舊派握手

瓊斯於一月二十四日，星期三，列席審查會。

他的陳述帶有「協和聯盟社」(Union League Club) 會員討論新政時的突然昏迷似的神氣。他說到這樣的話：「本人堅決認為政府在各工廠，設備，各種原料的投資幾十萬萬元，就是納稅人的錢，這種錢就不應該供作漫不經心的試驗。」以後他又補充說，「自然，建設銀公司決不能歸由任何企圖以未經試驗的思想與理想主義的計劃奉國家前途供作冒險的人節制。」再以後他提出了一個易受歡迎的限制辦法：各個借貸機關一定不能「被用來毀損我們國家在一百七十年間所辛苦締造的業績。」

當時審查會並沒有對華萊士建議作理智的分析，也沒有保證今後就業的計劃提出。當時只有一個舊腦筋的銀行家發表保護金元與指斥新思想的意見。他發揮了那些視財富可供私有的人們的思想，並沒有談到某些事物可供社會用以完成希望中的社會性的目標。

在以後質詢時，瓊斯說出了一句可供將來歷史家提出與特別注意的語句。當時參議員貝柏問瓊斯：

「我的問題是按你的看法，是否一個才智合格的人，可能單獨經營聯邦貸款執行人與商務部長的職務？」瓊斯說：「我想，如果你工作時間延長，有可能。不過我認爲當今世界上除了我以外沒有別人願意擔當這個責任。」

大部分參議員贊同瓊斯的意見。他看來像個大商賈。他一再重申那些他們在反對崛起的新政派時說過的語句。他說的話正是他們過去在大學時所唸經濟學初步原封不動的理論。因而他們對他很了解。他經常提醒他們的是昨天而決不是明天。

這裏有一些瓊斯與參議員貝萊之間的對話：

主席（參議員貝萊）：「你是否曾經將貸款執行人與建設銀公司主席的職權用以決定美國社會性質？」部長瓊斯：「我自然沒有，有時只做到有所幫助的程度而已。至於貸款與投資我們自然做了不少。」

主席：「那末你是否致力於保存美國經濟？」

瓊斯：「是的，我們從沒有使用我們所有全部借貸職權，或全部權限，或我們可能運用的金錢。我們每小時的每一分鐘，每天的每一小時，都關念着我們所有的責任，即使我們在祈禱的時候，也祈禱上帝給我們以勇氣，讓我們做到我們認爲對的事情。」

以後又有下面這一番對話：

主席：「有什麼限制呢？你當貸款執行人有什麼財政上的限制，你貸款的來源又是什麼？」

瓊斯：「什麼限制？」

主席：「有沒有一種限度？你究竟能做到什麼程度？」

瓊斯：「我們可以出借任何應該出借的東西。」（大笑）

主席：「是否像天一樣漫無邊際？」

瓊斯：「任何數量，任何長的時期，任何高低的利率。」

主席：「借給任何人？」

瓊斯：「任何一個我們認為合於借款的人。」

委員會內唯一不受這位財政霸王威壓的是參議員貝柏，他關於某一點的詢問引起了瓊斯那一輩商人一個有趣的自供。在瓊斯向貝柏所作冗長的答覆中有下面這麼一段典型的談話：

「我是一個小商人，一個典型的商人，認識那些大角色，也知道有多大手面，同時我知道到建設銀公司來取款的人們都是够格的，他們雖然借款，可是手面非常漂亮。也許來請教我們的人年薪就有十萬元，他們來和我們這些年薪六七千的僚屬們來往，他們也決不會虧欠逃跑。

「你知道我們是糖，也自然是蒼蠅飛來飛去的地方。錢在那裏，小偷也就到那裏，他們也就從沒有到過「戰時物價統制局」。他們是做買賣的。有些人來向我們借款，雖然並不合格，可是他們有一段動聽的言論，所以除非辦事的人有商業經驗，否則他就很容易出錯。」

瓊斯既然把商人形容為「蒼蠅」與「小偷」，也無怪他自承是世界上唯一可能担承他過去進行過那種任務的人了。可是貝柏並沒有由於瓊斯這一場一等了不起的自吹羞慚，相反而繼續成爲委員會內唯一

懷疑瓊斯確實無誤的孤獨角色。他以後的幾個問題又使瓊斯道出：由於他早已說過做生意人是貪婪的，他認為華萊士是不會稱職的。

貝柏：「他（瓊斯）在質詢期間一再宣稱華萊士是不合格的，我們要知道一下瓊斯先生這說法的根據何在。我們應該明白，他究竟是確實有事實根據，抑或是一種偏見。」

瓊斯：「缺乏經驗，這裏無所謂偏見。」

貝柏：「這是我們所要知道的。」

瓊斯：「好，那末我已經說過了。」

貝柏：「那末，按你說，他不能經營這個部缺的是什麼經驗？」

瓊斯：「我說是缺乏經驗。」

貝柏：「很好。你可否告訴我們你所謂經驗究竟是什麼，我們可以讓華萊士有一個回答的機會？」

瓊斯：「我不打算和你在這一點上發生爭論；也不會和你爭論，這是沒有必要的。」

以後貝柏又追究這問題，他最後問道：「你有什麼引證，或華萊士的任何正式行動，你要向委員會提出，作為你那些意見的根據嗎？」於是貝萊為瓊斯解圍，說華萊士的核准非本委員會的事情，因而這些質問是不切本題的。貝柏堅持這種質詢是切合本題的，但是貝萊指他為越出規定。因此瓊斯所稱華萊士缺乏經驗之說從未見諸於記錄。

這一次質詢除了貝柏有探究的好奇心以外，具有一種如同部落祀禮樣的性質——情景之清淨有如一

些政治貴族正襟危坐，諦聽一個主管投資與利率的頑強牧師背誦儀式中的陳腔爛調，並具有正式議會詢問的那種唱和與死氣沉沉的稱揚。他們宣佈散會，重申了他們一切的信仰，並以對他們從無疑問的思想堅決忠誠，暗自慶賀。上帝依舊在天堂，而貝萊也依然充任着主席。當他們閉會時，過去與過去握了握手。那些長老們在分道揚鑣，各歸府第時，互相會心地點了點頭。

新舊派的遭遇

一月廿五日，星期四，也就是質詢瓊斯的第二天，華萊士參與了委員會的會議。

他一開始就現出坦直個性，撇開所有矯飾而說，他與委員會都知道，由商務部去掉各借貸機構的法案所以提出是因為他被提名爲部長的緣故。同時他以同樣的坦率指出了真正的問題所在：「你們和我都知道這不是我『缺乏經驗』的問題。而是不中意我那種經驗的問題。」

他接着陳述他當農業部長八年期間他處理貸款的史實。當時在他掌握之下有「日用品信用公司」，「農業安全管理處」，「農業信用管理處」，「鄉村電化管理處」等。八年間這些機關貸款的數目爲六十萬萬元。日用品信用貸款的數目是一千一百五十萬元，鄉村善後貸款是一百二十萬八千元。除此以外佃戶購置自己的田地得到協助的達二萬〇一百八十四人。

以後他說他願意詳答委員會所要問他的問題，但是他不相信他担任商務部長是否合格是真正的問題。「真正的問題是建設銀公司的權力及其巨額補助金究竟用來幫助大商業呢，還是也用來協助小商

業，協助實現羅斯福總統所允諾的六千萬個工作。」

他指出這不是一個人的問題，而是一個基本政策的問題——「是今後美國何去何從的問題。」「我們是否以對付戰爭問題的同等胆識，勇毅與決心去應付和平的問題？」

他列舉事實使問題愈加明顯。現在我們有五千二百萬工人與一千二百萬兵，全年生產與服役價值二千萬萬元。「簡言之，就是美國今天的生產已比戰前大一倍。……我們既能生產大批船隻，大砲，飛機與坦克，我們自然也能够生產豐足的房屋，汽車與衣着，供給所有美國人以教育，娛樂以及生活上其他好的事物。」

他顯示了他對將來的理想：「戰後，美國具有以出乎想像的規模生產房屋，汽車，衣着，教育，娛樂以及所有其他生活上的好事物的能力。如果我們有利用這種機會的勇氣與理想的話，美國將來就能够做到這些。」

他的眼光就落在這一個水平上，他以「經濟權利法案」為名提出了他方案的其餘部分。（按「經濟權利法案」最初係一九四四年一月羅斯福在他給國會的咨文中提出。）我們要研究華萊士的思想最好莫如注意一下他的八點方案並綜合一下他對於實施方案的各項意見。

一、「在本國各礦業，各商店，各農場或礦場獲得一個有用而有報酬的工作的權利。」

華萊士指出要做到這一點需有新的設備，新的工廠與新的裝配。這也就是說要大筆金錢的開支，政府並應準備協助任何普通民營或銀行信用貸款所不敢冒險的有關事業。他估計這樣性質的一個包羅萬象

的投資方案每年當使新的私人投資可達二百萬萬元。這方案提供出工作來，工作一方面意味工資，一方面就意味着購買力，足使我們的生產機構為繼續獲利的市場生產貨品。除了國內市場以外我們還需要輸出農業與其他生產品。因此把他為本國的方案與為穩定國際貨幣的頓巴敦建議聯系起來，提供最健全的可能基礎，以便別國從美國購買，美國從別國購買。

此外，我們雖然有了這些足以鼓勵商業的條件，仍舊應該戒備今後就業可能發生波動，因此他進一步建議當本國有收獲的就業者人數低於五千七百萬時，政府應迅速採行步驟，提供足夠的工作，以圖補救——五千七百萬個就業應視作最低限度，不容跌落。因此，我們必須經常有公共工程的計劃，以作準備。

二、「收入足供衣食娛樂的權利。」

華萊士曾解釋這一項說：「美國每一個工作必須足供維持適當的生活。」大戰期間，由於民用消耗物資無法增產，工資會予抑低，因為工資增加而貨物不增，也就是通貨膨脹。不過，戰後，我們已可以增產人民需買的貨品，因此使人民有足够的金錢去購買貨品，正是理所當然的事情。當我們的商業擴展時，我們必須增加我們的基本購買力，與物品量的增加相扶而行，而所謂我們的基本購買力係掌握在我們人民大眾手裏。至於美國人口中百分之十收入高的，不論他們怎樣富法，所能買的貨品，數量極為有限。美國的繁榮寄託於購買力愈大愈好的基礎。因此工人得足他們應得的工資正是商業有利的一點。正確的了解是：工資並非利潤的威脅，相反而是利潤繼續的保障。如果我們能供給工人以穩定的收入，我

們正是在創造商業穩定的基礎。

華萊士根據這種思想，他建議美國應該儘快為全體工人建立一種年薪制度。

三、「每一農民應有種植並按收入足以維持適度生活之比率販賣其生產品的權利。」

農民的問題與製造業者的問題相同；他怎樣才能有按公道價格賣出他產品的穩定的市場。任何地方就業如能充分，農民的問題也就解決了大半，因為工人們第一項開支就是糧食。不過，華萊士建議，為了應付緊急情勢，農民們應獲得農產物價格的恰當標準的進一步保障，一個全面的聯邦穀物保險方案，推行農舍改良與農村電氣化以提高農民生活水準。

四、「大小商人在免於不公平競爭與國內外獨佔控制的空氣中進行貿易的權利。」

這是企業真正自由的保證。今天這種自由最大的威脅是獨佔者與卡迭爾集中力量，控制物價與市場。公平競爭使大量商業按每單位的低成本進行，足以產生最大的社會福利。而每單位高的價格的限制生產勢必殺害公平競爭。華萊士倡議，為了制止獨佔勢力，應切實施行反托辣斯法律，並確立防止新興工業如空運，電視，纖維，普拉斯蒂克等獨佔生長的政策。

五、「每一家庭有一適當家屋的權利。」

華萊士對於這一點曾於一個房屋方案的特別建議中提出，每年供給二百萬個居住單位。目前我們如果果要消除那些陋巷與水準以下的房舍，至少需要一千五百萬個居住單位。他進一步建議，應竭力鼓勵使美國成為人人有家屋的地方。同時他特別提出的一點是按他所提房屋方案每年可多出四百萬個工作，或

即等於戰前從事於這項工作的人數的兩倍。

六、「獲得適當醫護及享受健康的權利。」

華萊士會說，他的信念是「你們的聯邦與州政府對於人民的健康，實負有與供給教育，警衛與消防一樣的責任。」他建議，為達到這個標準，全民應獲得醫藥的照顧，健康保險應為社會安全方案的一部分，每一鄉鎮有一醫院，政府並應撥款協助推行醫藥的擴大研究。

七、「獲得免於老年無贍養，意外與失業等恐懼的保護的權利。」

為了達到這種目的，華萊士告訴參議員們說，他贊成一種更廣泛的社會安全方案，施行適當的老年保險。他估計這樣一個方案足以增加人民購買力，從而增加二百萬個工作一年。

八、「享受良好教育的權利。」

為了使我們訓練將來的公民的教育辦好，我們至少需要五十萬個教師，有些為了使若干人烟稠密處的班級人數減少，有些當派往現在教育辦得十分簡陋的地方。華萊士建議聯邦給予若干較窮鄉鎮以補助，並規定不論男女青年經濟情況如何，增加其技術與高級教育。他認為聯邦這種援助足以增進生產工作的數量，因而在財政與社會方面得到報償。

華萊士在提出這個意見時，曾同時說到反映他思想背景的主張一二點。

他坦然宣稱，「經濟權利法案」允為自由企業起增強作用的纖維，而決不致於妨害自由企業。他的說法是這樣的：「你們在考慮這個方案時一定會注意到下列這種驚人的事實，即私人企業的力量增加，

則經濟權利法案的現實性也隨之增加——同時經濟權利法案的現實性增加，美國私人企業的力量也隨之增加。因此，本方案所提所有實行經濟權利法案的措施，同時也旨在使美國的資本主義與私人企業在平時仍以同戰時一般巨大的姿態運用。」

他同時有力地宣示他的信念說，他是在代表大多數的美國人民發言。他的話是這麼說的：「我相信，美國人民大部分相信我在這裏說過的那種美國的大信念與美國做法的。我們知道我們的前途是坦直而寬闊的，雖然還有幾座小山必須爬過。我所試擬的方法只是第一塊里程碑，因為今後若干年美國生活的能力如何，超出於我們想像之外。美國的自由企業制度是世界已知的最好的一個，我們依仗這個制度，可望獲得世界所能賜與的最好的事物。」

新思想的磨難

亨利·華萊士並不善作政治上慣用的「勾心鬥角」。他害羞的本性不時流露，他對於按黨性觀點的問答並無特別興趣，他把它們看成爲政治與經濟的根本思想的怪瘤，他本人只對根本思想感到興趣。當一件嚴格地黨性的公文送到他面前時，他每每因此感到侷促不安，他會以一聲大笑表示他的受窘，而他的政敵們就把他這種笑法稱爲癡笑。如果有人問起他的私生活與運氣如何，他也會這樣受窘，而他的回答也簡直比大受打擊的人的答話還要軟弱。因此當他在參院商務委員會陳述時，有時態度就顯然毫不從容，而反對他的參議員們就充分利用他這一點弱點。他們旨在煎逼他，幾乎無所不至地打擊他。不過，

當他們擺完了政治的插戲之後談到經濟與社會政策時，他就頭頭是道，掌握了質詢的場面。參議員們所長的是政治手段，而華萊士所長的是政治識見。

質詢開始時，華萊士回答參議員的一個問題說：「自從一九三三年起」，小商人就感到得到平等的財政的困難，他說：「讓我這樣說吧，……如果這一世紀的最初十年目前這種財政與賦稅已經實行，那末像現在這樣的汽車，電業，化學工業就根本不會出現，因而如果我們希望一九七〇年仍有一九四五至五〇年間的福特與愛迪生產生，那就一定需要推行一種今天沒有的爲小商人的財政才行。」

他說到這裏，代表緬因州的共和黨參議員布魯斯特插進了一個顯然具有黨派性的問題：「這不是對目前這個持續十二年的政府作了一個嚴厲的控訴嗎？」

有一位記者會詳記質詢經過，據他寫道這時候華萊士就開始大笑，而且繼續發笑達三十秒鐘之久。自然他這種笑法會使參議員與記者都感到惱燥，但是在華萊士這種人，這又是非常自然的一種反響。他的心意原來一貫地在打算說明一下我們經濟機構的基本需要，可是這時他突然發覺他對過去卅年情勢的分析被倒用成了一種針對目前政府的尖銳的政治武器。他事前沒有防到，同時對它也沒有興趣，把它當作多少帶些滑稽的一種插戲，希望它愉快演過愈好，以便再重新回到將來的政策的思考上去。在一個口才比較伶俐的政客一定會這樣回答：「參議員先生，這裏不是說過去的十二年，也不是說再以前十二年共和黨貽誤國政的時期，後者會留下如許問題，竟使這個政府的努力還不能把它們完全解決，不過我們正在爲此而打算。」可是這樣的回答與華萊士的脾氣與思考方法是完全不合的。他是一個政治思想

家，可不算爲一個政治辯論家。參議員布魯斯特既然使他受窘，自然也暫時使他陷於不利的境地。華萊士的正直就有這樣的弱點。

參議員貝柏則力圖協助華萊士的努力，可是也發生同樣的情形，貝柏問他是否能利用機會談一談處理私事一向儉約的情形。華萊士說：「我不準備談什麼私事。」但是貝柏急於使華萊士舉辦雜種玉蜀黍公司的成就見諸於記錄，因此他追問華萊士，可是華萊士的受窘像問起了黨性問題一樣，結果他的答語異常拙劣，從此被人們引證說，華萊士連談他的私事都庸弱無能。但是筆者以爲，作這樣批評的人完全不了解大多數美國人所諒解的事實，即華萊士這樣的人對於在公衆場合談私事是不習慣的。這是我們許多人所共有的一種出於謙虛的沉默。

可是，爲了對華氏表示公正，筆者願引述華氏答覆的全文，因爲它的回答也的確回答了人家問起他與他家營報紙的關係，而且全文比諸光是摘要有力量得多。他的全部答語如左：

「我所唯一担負過責任的私營機關是「玉蜀黍種子公司」，這一點也許足以使委員會安心。我從沒有在任何出版公司內擁有一點股票，也沒有担負過任何出版公司的經理事宜。

「當我們家營的出版公司與另一公司合併一事決定時，我正在歐洲參加一次國際經濟會議，並在巴爾幹研究某些科學事項，我一直到它已完成合併才知道這件事情。

「但是我已經說過，我沒有負過經理責任，並沒有担負該公司的經理。我是報紙的編輯。而且我也從未顧問經理事宜。

「至於與我唯一有關而我肩負經理責任的玉蜀黍公司，全部出於我的思想。它以我的玉蜀黍栽培工作為基礎。我在一九〇六年開始試驗，一九一三年開始取種的試驗，一九一九年工作大有開展，於是一九二六年開辦了商業。由於農業不景氣，我自己金錢極少，我自己想法籌款。當時所有農場經理，以及今天在公司裏成為要員的夥計，都是我自己選聘的。公司發展期間，它的組織都由我策劃。開創時，它的確是一樁小企業。」

「我因為和小商人們會一起生活，因此知道他們的問題。我會經積欠超過我所能償還的錢。我的做法依靠着我們的玉蜀黍能否賣掉。我具有那種經驗。我會經應付過許多自稱硬心腸與現實的商人而說我並不是這樣的人的人們。我懂得這些事情因為我也會應付過它們。」

「去年，這玉蜀黍公司賣出價值四百萬元的種子。在我來華盛頓時，我辭去了公司總經理的職務，請我的兄弟繼任。昨晚他打電話給我希望我今天在質詢時一切很順利，我當時出於好奇，問了問公司目前究竟欠了銀行多少款子，他告訴我說八十萬元。」

「自然，如果從現在到五月間玉蜀黍賣得很好的話，所有這些錢都可以償清。我相信，他們去年差不多借了一百萬元。他們始終能把欠銀行的款子一一償清。」

這種話顯然不會是許多商人願意說的。他們作報告時，一定提到他們最初的投資，報告全年的貿易額與利潤，陳述它們目前的財產目錄與存放銀行資金。但華萊士的心意並不在自己的商業，它提出報告，也用來作為他所倡方案的說明。他完全用他所想到的小商業來解釋，同時也提到他明瞭與應付企業

需要的能力。威爾遜曾經說過他有一種單軌的思想；華萊士也有這種單軌思想。它以一個題目為主，以後它在主導期間，什麼都一定與它關聯了。他出席參議院委員會時，心裏存有一個思想，因此什麼無關的事情，他都撇開不談；什麼事情可能和他關聯的，他一定拉進他發言的體制之內。

他的思想是審慎而周密的。但是這裏也有它的弱點。它是既不流利，又缺乏巧答。這一點和羅斯福的情形確成對照。羅斯福的思想很像是乘風的海鷗，它能隨風飄揚，或驟然下撲，攫取任何有趣或有用的東西。如果說世界上有一種典型的農民思想，——它異常耐心，「首先看到種子，然後是土面上的幼芽，以至於最後穗上完整的穀物，」從春耕到秋收，意志始終如一，——那華萊士所有的就是這一種。這種思想毫無精彩，但是有收穫。

它這種思想的運用與參議員們的思想不同，但是這裏用不着去批判它們。一個美國參議員是美國政黨政治的最後產物。他既是黨裏的「正規軍」，又須具有贏取選票的那種收攬民心的特別才華。他須有天賦或學得的流利口才，並與選他的人們切取聯系，以便獲得重選。政治活動就是他的工作，他成名的希望。他須養成一種幾乎神出鬼沒的機動性，以便隨時調整，適應所有各種人羣與各種的變化。即使他有意用職位去實現他的理想，他的作爲也須受職位決定。他是一個出類拔羣的政客，他最有用的時候就是國家非常寶貴的資產。

可是在他活動的過程中間，他自然形成一種懷疑新思想，不信任創造新思想者的那種過分的小心。政客們每每儘可能拖延決定。非等他確知他的選民們同意他，他決不遽爾行動。他採擇一種意見不一定

因爲它不錯，而決定在它是否有助於獲得選票。因此一個有意見的人到參議員們的面前，他代表着兩種威脅；他們已面對着一種決定，同時他們自己也就必須按意見的是非曲直而不按取悅人心的一「實際」見地來作決定。這時候他們滔滔不絕的流利口才遲鈍了，他們受挫了。他們不明白無可退讓與不妥協的一種思想，而妥協正是他們最熟練與有利的技術。

這種人在政治有他們真正的地位。華萊士這樣的人也有他的地位。可是他和他們係由不同的前提發端，按不同的思想的軌道行動，結果是他們雙方的思想不能輕易謀合。有一位新聞記者會充分描述這次質詢，他用這麼些話來綜述參議員們的反響：「不論是那一面的參議員，都沒有一個真正了解華萊士，或真正了解他心裏想的是什麼。……這種感覺是如此深切，以致他們中間有幾個私下裏說，即使他們完全採用華萊士的經濟與政治觀點，也還是因爲一種不能形容的不安的感覺，他們對於讓華萊士去進行這種方案一點遲疑萬分。」

關於華萊士與這些參議員之間的對照另外有一點是值得提一提的。參議員自然代表某一些事物，而這些事物又代表着過去那種思想與行動的結果。大部分今天在參院裏的議員都是卅年前政治勢力的產物。他們所以能佔有現在的地位，那是因爲他們各該州強有力的經濟與社會勢力支持着他們，而這些勢力都是在過去成長的。一般說，對公衆最有說服力的呼籲是那些玩弄人民所熟悉的口號與理論的言詞，而這一點又是參議員們與過去的一種關係。一個參議員如果是一個「安分」者，最容易享受令譽，再如果他不要棄他年青時的訓練，也就能維持人們希望於他的重要角色。他一定堅持認爲統治國家唯一

「美國與實際的」的方法就是儘可能維持一如往昔的制度。因此，要我們固守傳統也就成了參議員任務之一。因此當參院成了國家惰性的保衛者，這種退化的情形更容易感染。

華萊士對於將來較對過去尤為注意。他精通我們的歷史，但是他對於我們那些偉人的看法是：他們是根據當時他們的情勢，解決他們問題的人。他以他們為範例，發現了靈感，即對付當前的問題，抱持與他們同樣的勇氣。他喜歡他們，可是並不熱心於引用他們的思想。

那些先賢們是革新者，而他也是革新者。因此，他與參議員們所樂用的部落儀式與型式完全不合。他們把他看成一位危險人物，其情形正同各部落內那些傳統的保守者看那些敢於對古俗表示懷疑的人們一樣。從原始部落以至於現代國家，這一種考慮存在於少數人與羣體間關係上，從無例外。

在新赫布里特羣島的古奧島上，土人們以前有一種教儀上的舞蹈，跳舞時部族裏的老年人在旁邊監視，手持弓箭，凡跳舞者被發現跳錯，就拉弓射擊。所有各種社會都有類似的情形，它們的老人對任何人越出了一向進行的步驟的人就施以譏罵與懲罰。

在美國全部歷史上也有這種情形。洛格·威廉斯 (Roger Williams 1603——1682，領導非國教徒運動的領袖) 是被流放的。約瑟夫·史密斯 (Joseph Smith 1805——1844，摩門教創始者) 是被殺的。不過此後革新者已有一個逃避體罰的辦法，他可以逃往一處新的邊疆，建立他自己的州，譬如說，威廉斯是去羅特島的，史密斯的信徒是去猶他州的。現在我們已沒有這種出路可走，那些過去的保衛者們依然結成聯盟，使抱新思想的人們不能掌權。

瓊斯告訴參議員們的全是他們一向聽慣的話，因而他們感到親切而喜形於色。亨利·華萊士按新的方法告訴他們新的事物，因而他們拉起了弓箭。他們已決定如果不能完全消滅他的權力，就損毀它。

參議員們都會有過一個時期各說各的話，但是以後的質詢超出了政黨政治與華萊士本人的財政觀，終於揭露了兩種經濟與社會思想的基本差異。這種對話是如此明顯，此後足供所有美國智識分子當作必讀的文件。

新舊積不相容

在這方面第一個問題係參議員貝萊所提，問起什麼是華萊士所謂「公平的財政」。這問題引起了一種小商人如何獲得舉辦非常事業的資金的討論。華萊士認為錢的來路只有兩處——華爾街（這就是說，以私人資本通過大資本所控制的「證券交易所」購買股票）與政府。他引證前戰時生產局副局長與放款銀行家艾伯斯達的話證明小商人向華爾街去借用資本往往支付高額利息，而且甚至交出了自己商業的管轄權。這是不妥的。至於另一個辦法，按華萊士的建議是政府可舉辦一個金庫，其機構如同「聯邦房屋管理處」的資金供給者，它作非常的冒險，預付資金，並依賴其他大部分的收入來抵補它若干貸款的損失。因此全部基金可充作全面計劃的總的保險，其損失當不致損害或危及中央基金。其次，這種規劃足以成爲一種刺激，使所有金錢全部運用不息，使資金不致成爲呆滯的餘款，而成爲積極運用的款項的理由。

參議員貝萊提出兩點反對——一，如果政府持有了一般的股票，或大部分股票，它將因此掌握了對商業的控制；二，小商人如不去華爾街，勢必前往地方銀行借款。第一點反對顯示他沒有了解華萊士的意見，因此華萊士說他準備在委員會下次會議中提出詳細說明。華萊士回答第二點時提醒貝萊說，自從一九一三年實施加嚴的銀行法以後，小銀行作非常的冒險貸款已不可能。他建議的是凡銀行家被合法禁止以所得儲蓄從事冒險的場合，由政府授權專家，與以借款。

我們必須為新的企業置備款項。這錢從那裏來呢？由於政府不准普通銀行在非常機會中賭博，普通銀行並不能為新企業供給多少資金。華爾街願意供給，可是它有它自己的條件，即利息要高，並旨在對於若干可能獲利的商業施行控制——這也就是使全部商業的集中控制都落入少數得利者的手裏。由政府供給借款，那末除了鼓勵新商業並從而增進就業與國富以外，並無其他動機。華萊士的簡單提議是政府在適當的保障之下，應該採擇這個方針。他認為政府應以金錢為工具，增進大眾福利，不致於完全成為由巨富操縱的個人資產。

當華萊士在這部分質詢中鼓吹金元可以小心使用，使成有利於共同財富的工具時，參議員們心中依然只有金元僅為私人財富的念頭。雙方的罅隙永遠無法填平。這一點顯示老派保守正統經濟思想與實驗經濟學者新而有魄力的思想之間巨大的分歧。華萊士的思想所以不為參議員們所了解，其要因也就是這點分歧。他們對於金錢用途的看法不能一致。

委員會在以後聽取報告中，涉及美國在戰時獲得的生產是否能在平時施行的問題。當時貝萊的發言

一無價值，它完全談論債務與稅捐，根本沒有提到經濟上其他的因素。他說：

「閣下在我們目前的繁榮與戰後繁榮之間的關係作了一個推論。要知道目前的繁榮是以戰時消費與戰時借貸為基礎。如果經濟要依賴於捐稅，也就無法繁榮。去年我們為戰爭支付九百萬萬元，今年希望只化七百五十或八百萬萬元。現在還可以造成一種繁榮。這種繁榮是建立在借貸上的。」

「閣下說我們在戰後世界獲得相同的情勢。那末閣下以為我們借貸可有多少，捐稅籌充這種用途又有多少？」

華萊士立刻為美國全國性的經濟局勢中有關的大體制提出了一些數字。他指出一九四四年末私人的剩餘存款達一千萬萬元。再說一九二一至一九二九年間，我們正設法減少國債，當時我們的公私債款已增至五百萬萬元，——平均五十萬萬元一年。在一九二九至三九這十年之間，當時我們曾被認為揮霍無度，國債大增，可是我們的公私債款減到九十萬萬元，平均每年減少十萬萬元。

在這點上，參議員們是用因素之一——國債去衡量繁榮，而華萊士堅持真正的衡量是我們全部經驗。

公債——也就是政府的信用——按參議員們的看法，它本身就有的估價；我們償債就是說我們做得不壞；我們的公債增加，那就是說我們做得不够好。華萊士的見解是政府的信用是一種可以用以增加整個國富的資產，我們該用我們全部公私債額來估計我們的成敗。這一種看法的分歧又是非常基本而極難和洽的。華萊士與參議員們關於國家信用的功用的見解又不能一致。

此外由於類似分歧的看法又產生另一種基本的差異。

參議員貝萊預料國債將達三千萬萬元，認為我們担负它十分困難。可是華萊士却超過那些急迫而有幾分令人猶豫的數字看到一種更寬廣的遠景。他說，「我們能担负二千五百或三千萬萬元公債按低利率的利息。假定我們的人民真有充分就業與充分生產，我們可以負担全部公私債款的利息。」這裏的對照是參議員貝萊把三千萬萬元孤立起來看，自然因為它的巨大而感到困難。華萊士也並非不清楚這數目之巨大，但是他指出任何數字的看大看小都有它的背景。如果我們國家總收入回復到八百五十萬萬元，那末國債三千萬萬元將等於我們收入的三倍半，但是此刻我們如果能維持國家收入於二千萬萬元，那末三千萬萬的債也只等於收入的一倍半。因此，一筆大的債不應該使我們驚惶失措，相反應該當作一種刺激，使我們的國家收入維持於較高的水平。

可是，參議員貝萊還是不容易把國債的幽靈驅散，因此他以後又回到這一點，問華萊士對於減債的展望如何。華萊士回答說，「如果我們能够做到充分就業而貨品生產與業務的總額能超過一千七百萬萬元，那末担负國債的情況比諸實行另一種辦法因而造成失業，或生產與業務不到一千七百萬萬元要好。」

他把討論又推展到了充分就業的社會意義，他慎重說，「當軍火的生產既已停頓，那末我們的人員，機器物資與技術必須另找出路，」而這一點正是他所提建議的目的。

參院商務委員會這次審查的全部時間揭露了兩種政治與經濟思想的衝突。華萊士面對現代工業社會

的複雜與密切關聯，又顧念到廣泛失業與因此而發生的總蕭條的特別危險，他相信民有的政府可以成爲一種社會工具，用它的信用與立法的權力，可以平衡各個經濟因素並預防危機。過去各國的政府都是在各種衝突的利益中的一個仲裁者。他建議政府今後應放棄這種高貴的角色，而於需要產生時，積極地參加進去。

華萊士就根據這種見解，接受總統所提「經濟權利法案」，並稱爲政府應該揭櫫的目標，而根據他的想法，政府在任何一個目標中遭受威脅時，就應該參與各種有關事務。因此按這種了解，國家已不再是公民們爲達到主要政治目標的一種結合，它任務擴大，已成爲社會福利的一個有力的工具。它成爲保證安全，發展的機會，康健，教育與全體生活水準提高的一種互利的結合。

政府使用金錢與信用，其成敗不以過去那種私人財富的標準來衡量，而按公衆福利的新標準來衡量。它不把金錢當作絕對物，而僅以求得金洋爲滿足。它按國家全部經驗的背景去衡量金錢。並令金錢爲它們所使用的目的而發揮功用。華萊士把金錢看成達到大眾福利的一種工具，而不把它當作目的。按這種思想，私人財富將受它的社會用途的考驗。私人企業當享受一切鼓勵，僅以不致形成對別人企業的威脅爲限，——即不令使用金融與經濟力量以限制貿易，形成我們通常所謂獨佔與卡迭爾。當某一私人企業形成這種威脅時，政府即應挺身而出，加以阻止，以資保護自由企業。在另一方面政府堅持工廠應供給僱工以適當的工資與滿意的工作條件，以便保護工人。

簡言之，這些就是華萊士對於將來民主國家的思想。那些專爲過去與特權發言的人將稱他這種思想

爲幻想，稱他的方法爲一意孤行。可是它的確是關於將來政府的預言，在這種政府之下，經濟民主推動自由人的社會組織向下一階段前進，並從而增強政治民主。

參議院這次聽取報告是一次有歷史意義的事情，因爲當華萊士提出戰後美國走向安穩與安定的途徑的原則時，顯然舊時代與新時代在這裏遭遇了。

戰瓊斯的最後回合

參議院商務委員會於聽取瓊斯與華萊士的報告之後，採行了兩個行動。它審查通過了參議員喬治所提法案，即將「建設銀公司」以及其他貸款機關與商務部分開。然後一直到三月一日才通過保華萊士任商務部長的提名。日期所以遲到三月一日目的在使喬治的法案先在參衆兩院通過，也因爲總統已出國，參加雅爾達會議，可望在三月初返國，因此讓他一到就簽署喬治法案，俾令成爲法律。

當參院舉行激烈辯論時，參議員巴克萊宣讀羅斯福經羅森曼法官轉來的一個消息，說喬治法案如獲通過，總統當予簽署核准。可是辯論之後，喬治法案是通過了，關於商長提名的表決延期了。

衆院對喬治法案曾一度引起風波，提出種種修正案。有一個時期形勢極爲嚴重，以致若干參議員大發雷霆，參議員喬治甚至揚言，如果衆院拒絕通過，他決定投票贊成予華萊士以所有借貸機構，以資恐嚇。結果，風浪平息，衆院照參院的原案通過。

羅斯福總統由雅爾達回國之後馬上簽署了喬治法案。參議員塔虎特費兩小時的功夫，向參院解釋爲

什麼華萊士在任何情形之下都不宜担任商務部長，但是三月一日到來時，參院終於以五十六對卅一票通過華萊士的任命案，兩黨議員投票大體均按黨的方針。

以後，華萊士在商務部大廈宣誓就職，由法官布拉克監督，有內閣各閣員與參議員蒞場觀禮，空氣歡愉而自由，事後布拉克拍拍華萊士的背說道：「你上台了。」

在這段故事裏還應該作一個註解。一月廿一日，瓊斯堅要羅斯福召見一次，羅斯福知道情形一定不妙，但仍勉強答應。會面時，瓊斯慎重說：「我只知道一種事情——銀行與金融。你的政府裏應該有個懂銀行的人，而我就是。我所懂的就是這一行，我代表它正合身份。」

據可靠的消息，羅斯福在說到這場談話時，他只有一點感想，「瓊斯從沒有談到大眾福利一詞。」

第五章 國家的農人

農業部長的工作

自從亨利·華萊士接任農業部長到現在已經十多年了。他接任時坦承的究竟是怎樣的一種任務！

在這時以前，一九二〇年是農民們所逢最後一次好年頭。從一九二〇到一九三三，這長長的十二年間，農情每况愈下。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三年間全國平均每四家有一家因債務與賦稅，把田地變賣。從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九年，農田淨收入由一百七十萬萬元減至一百二十萬萬元，從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三，它減剩為每年五十萬萬元——只抵一九二〇年三分之一，抵一九二九年二分之一。這數目比諸第一次世界大戰前一年的一九一四年還少十萬萬元。

強迫收購田地一事非常普通，以至全國形成有組織的反抗，某些地區爆發了類似游擊戰的情形。我記得我有一次到過一處鄉間的一家店舖，它在幾天以前曾被佃農與零工破扉而入，一搶而空，因為他們都已囊空如洗，於是決定挺而走險了。大路上到處可見拍賣的情形，有許多由農民隊伍監守，任何人敢對貨品出價，農民隊伍就以暴力相威脅。一九三二至一九三三年間，美國的農村是破產而絕望已極，很可能發生革命。

一九三三年三月十日，華萊士接任農業部長為時還不到一星期，就在華府召集全國農業團體領袖舉行了一次會議。他們分別提出了各種各樣的意見。

有些人要求把過剩物傾銷於國外，有些人籲請政府保證生產的成本，有些人提倡輸出公債，又有些人建議一個國內分配計劃。華萊士告訴他們，他準備與他們密切談商，一直到他們全體人能獲致一個農業法案為止。

他們最後同意一個包羅萬象的法案事屬需要，該法案當授權進行各種業已提出的補救，並予新農業部長於採行時以區別的無限權力。法案的起草需要相當時間。同時美國這一年麥的存糧較常年大三倍，棉花的存貨也較常年大三倍。肉價跌到只合平常三分之一。國內的購買力正跌落在一種蕭條的低水平。國外的市場也已消失。由於農產的過剩，農民倒反窮困了。

「農業調整法案」(Agricultural Adjustment Act 以下簡稱爲「川A法案」)於一九三三年五月十二日通過。華萊士對他打算中的工作有這麼一段描繪：「我們第一項努力將調整低落的生產，同時保持安全的剩餘，以資供給全國足够的糧食。這項努力將繼續至因存貨減少而物價提高到農民購買力恢復到與戰前一九〇九——一九一四年時一般高為止。我們所以選擇這個時期是因爲那時農民農產的賣價與他們購買工業製成品與都市服務大致接近一種平等的關係。因此當時我們幾個大的生產者羣具有一種平衡，農村與都市購買力間並無驚人的差異。而現在兩者之間的差異正在窒息美國各業的生命。」

他慎重申言，農產物不得已的減制不是永久性的，但目前是爲保持我們的均勢，從而再度獲致充分

就業必須進行的第一步。

當計劃開始進行而農人得到抵付爲調整穀物所需的支票時，他們最初的反響是一再派遣代表到華府，要求政府永久接受充分統制。棉業代表要求政府強迫所有種植者一致向政府呈報。西北五州的州長都來訪問華萊士要求「生產成本」保證，要華府委全權以支持他們。

說到這種要求政府施行充分統制的巨大壓力使人不禁想到最近對羅斯福的一些攻擊，即贊成由聯邦政府施行專權行動的就是現在的政府。事實上，華萊士拒絕這些呼籲，並按自動原則施行分配制度。在麥這種產物方面，呈報的農民在百萬以上，代表種麥田地總數百分之七十，他們已一致同意，減少他們秋季的種植百分之十五。華萊士獲得這種結果全仗他親訪農民，並向他們解釋三A法案的意義與做法。這種努力最中心與健全的特點是他用地方委員會來推動計劃，把責任按地方的實情放於當地團體的身上。他設法分權，把工作分別通過州，郡與地方委員會推行。

他不僅不願接受強迫統制的要求，相反向他們解釋它的原因。一九三三年秋，他訪問故鄉得梅因市，向他的鄰人談起西北五州州長的訪問。他報告說，這五人會要求限價；他曾回答他們說，如果沒有強硬的生產統制，他們決不能做到限價。五州長表示同意，可是又提出了一個建議，主張「推行一種強迫販賣統制制度，予美國每一農民每月販賣的限額，此外推行國內田地執照制度。」

華萊士說：「我這次到衣阿華的理由之一就在考察是否玉蜀黍帶的農民對施行生產與販賣兩種強迫性統制業已有恃無恐。」他向他們指出這種統制將成爲新的法律。「從此農業被宣佈爲公用事業，並

開始一種真正緩慢的工作，即決定那一個農民應具有公共便利與必需的證明書，告訴美國農民他們是否一概被准予耕田，他們該種什麼物產，種多少；產物又如何，於何時何地販賣。」

把問題向人民開誠佈公已成爲他的特點，而我們如果還記得他發言的地方正是農村騷動的中心，當不難覺得他這種做法難能可貴。當時有位法官會被轟出法庭，受到絞殺的威脅。有一家保險公司會要取消衣阿華農民的抵押品的取價權，結果這公司的律師被污辱一番。爲債務所困的負債者都決心死守其家園，不管合法與否。

當一九三三轉換爲一九三四年時，他的教導方案與全國性的機構開始收到功效了，情況已顯得一九三四年將有一個好收成了。可是接着是一場大旱，其嚴重爲史所罕有。華萊士是一個用功的氣候統計的研究者，據他說：「美國歷史上從未有過如此大災。」極西部的灰塵籠罩着東部海濱的若干城市，甚至於落在距岸一百英里的船上。這一場大旱吞滅了所有的剩餘。於是「三A法案」所預計於三年內完成的事情在一個夏季內完成。華萊士終於必須改變他的全盤農業方案。

人比豬重要

在我們詳述他主持農業部的行政以前，我們正好看一看當時人們對於他的批評——就是對他所發動的一種減產經濟的批評——通常人們每每提到一九三三年殺掉六百萬頭小豬一事。事實真相究竟如何？

在一九三三年前十八個月，農民賣豬每百斤只得三元四角二分，這種低價給與農民的困苦，遠甚於

過去任何貴肉價給與消耗者的困苦。以後由於豬產增加，以及由於關稅與限額關係國外市場大部消失（國外市場一度銷過一千二百萬頭豬），肉價繼續下跌。

因此一九三三年九月六百萬頭小豬被殺，得肉一萬萬磅都撥充救濟，給飢餓者充食。如果這些小豬都長大起來，肉價將跌為二元半一担。小豬殺了以後，美國人民要吃的豬肉並不少，但農民已可收到三元六角一百斤，這收入使他們還可以購買城市產品，從而使城裏人有工可做。此外，這些豬殺了以後，也就省了七千五百萬蒲式耳豬吃的玉蜀黍，一九三四年由於旱，玉蜀黍收成減少十萬萬蒲式耳之巨，這節省正好合時。

小豬的殺戮，對農民與消費者都有好處。能以對小豬的傷感去為人作現實的打算，自然是妥善的。華萊士曾於談論豬與銹鐵一文中曾提到這件事情：「一九三三年大鋼鐵公司銹鐵減產的控制原則上當較同年豬隻減少運動該罵一千倍。一九三二年的銹鐵生產約合一九二九年百分之二十。一九三三年豬的生產磅數等於一九二九年百分之九十七。一九三四年銹鐵生產等於一九二九年百分之四十五。」一九三四年大旱年，豬產等於一九二九年百分八十。換句話說，農民減少豬產百分之三的時候，鋼鐵公司減少銹鐵產量百分之八十。這種工業減產辦法使幾百萬工人流浪街頭，也就是由於這種工業減產辦法，我們必須支付幾十萬萬元以救濟被排斥的工人，免於凍餒。我希望實行減工的工廠以後能發覺這種使幾百萬工人喪失工作的辦法不妥。因為人比豬更為重要。」

在這時期，另外有一點值得注意。農業部並沒有下令毀棄任何糧食。農民發現把玉蜀黍當柴燒比

以十分錢一蒲式耳的代價賣出而另外買煤燒要合算得多。這種事情發生在一九三二年華萊士出任農長與「三A法案」施行以前。華萊士的做法是使農民感到出賣穀物比毀掉好，因而制止了糧食的毀壞。

華萊士第一次農業部長任期內的背景是史無前例的農業蕭條與大旱荒，這種情形迫他逐一解決危機。要他倡導暫時減產，事情顯然不是他所樂意的。可是第一個「三A法案」在一九三六年一月被最高法院判為違憲以前農產豐饒終使蕭條情勢轉變，使他大為歡悅。以後他把第一個「三A法案」稱為「其粗糙猶同福特的第一輛汽車」。

「三A法案」的被殺與再生

華萊士根據「三A法案」成立了「農業調整管理處」，致力於將美國農民的購買力恢復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五年的水平，按當時價值一元的麥或玉蜀黍或棉可以買到價值一元的工業品。此刻方案由生產統制與市場專家實施，但推行順利的主要關鍵，就是全國性的計劃係由各郡負責，因此每一個農民都由當地機構向他解釋，而本地人係由本地人負責應付。華萊士使這計劃有關的聯邦當局與各地方自治機關協力合作，其成績為推行類似計劃的其他行政官員所不及。

當法案推行時，它本身實在就是農民們的計劃，地方會議上討論與修正它，知道每一個農民與每一塊田地的郡代理人推行它，它隨時要求着鄰人互相勸告與解釋。

當最高法院宣告第一個「三A法案」違憲時，第二個法案隨之通過，它已吸收了由法院方面提起的

考慮以及老法案推行時所得的經驗。但是基本的機構仍照舊存留。它在戰時協助農民應付增大的需要與在平時防止生產過度，限制田畝與販賣限額等一般有效。

這方案在執行上是合作的，分權的與完全民主的。它的基幹就是「郡農業保持協會」。當時擔任工作的這種會為數達三千之多。參加合作的農民在一九四三年有六百五十萬人，他們每年開會，選舉他們自己的郡與鎮的委員，以推行當地的方案。每州有三個至五個農民被農業部長委任為「三A法案州委員會」委員。州委會委任若干經過遴選的農人當州委會與郡委會之間的聯絡員。每州分五區，各區主任與「三A法案」的全國負責當局切取聯系，在華府以外推行工作。

一九三四年大旱荒的一個大好處是它引起全國關心了土壤保持的需要。「三A法案」使這事情與生產與販賣管制兩事齊頭並進，因此過去十年間，令用虧土地休息，輪種以保持土壤，積極並廢積防止土壤崩潰，這種工作的進行開始了一個新紀元；美國由於保持了土壤這種最基本的資產，它永久的收穫價值達幾十萬萬金元。如果這一點有辦法可以計算的話，光是土壤保持這一點就超過建設銀公司歷來全部的開支。土壤這事業之大至少與金元一樣。

足以表示「三A法案」的價值的整套具體數字是關於地價與購買力的統計。由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九年期間（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在內），土地負債額增高百分之六十；由一九三九至一九四二年，它增加百分之一。一九四二年的現款收入比一九一九年增百分之十，而一九一九年是農民在兩次大戰期間最好過的一年。再講過去農民的購買力，一九四二年他們的現金收入比一九一九年大百分之三十，他們

的淨收入較一九一九年大百分之四十三。

華萊士所設計與由華氏所建機構所推行的兩個「三A法案」使美國農民脫離了一九三二年不景氣的苦海，重享繁榮之福，而這種繁榮還可以由他們的決定來推動與持續下去。華萊士整個成就表示着社會與公民教育，自動合作與專家經營的勝利。美國的全國經濟獲得了新生與滋長。

農事也是大企業

農業部在華萊士當政期間，使全國得利的第二個機構是「農業安全管理處」。它在一九三七年九月一日成立，為收入低微的農民得到借款，給他們以田地與房屋管理上的指導，從而普遍改善他們的生活條件。

由一九三五至一九四四年六月這期間，農安處及其前身給一百萬收入低微農家以八四三、〇〇〇、〇〇〇元。到一九四四年六月卅日為止，基金財務處應收款項達五四三、〇〇〇、〇〇〇元。其中四八四、〇〇〇、〇〇〇元以上被先後償還，這數目等於全部應收款項的百分之八十九。同時基金財務處收得利息六千七百萬元。

自從一九三七年起，農安處給三六、四二六佃農，合耕者與短工以借款，使他們力能購買自己的家屋。到一九四四年六月卅日，二萬萬元業已出借，利息三厘，為期四十年。到一九四五年中，應收款中呆帳僅百分之二·九，而額外的付款，未到期的分期付款的預付，以及其他匯款倒也收到一一、〇〇

〇、〇〇〇元。

這些借款情形都非常複雜，因為它們係為應付農業意外而運用。還款全看收成如何。借貸者約定於豐年多還，荒年少還。如果有那個銀行家不懂信用借款的危險，那末他可以看看根據氣候統計，收成預料與市場變化等作成的借款的決算。

任何人不能想望比「農安處」方案更美國化的方案了。它使人民力能購置自己的房屋，擁有自己的田地，為自己勞役。同時它也是馬上獲利的。方案在心理上與財政上都是健全的，而且推行也頗見功效。

農業部另一個協助穩定農業經營的是「聯邦產物保險公司」，它在一九三八年成立，致力於為麥與棉花保險。由一九三九至一九四三年間，約有一百五十萬農民都舉辦了這種保險，以後七十八屆國會一度因為它對政府有所耗費而廢止，但一九四四年十一月由於人民普遍要求恢復，迫得眾議院再通過，恢復舊案。參議院將眾院的法案作了若干修正，送回眾院再度討論。參院的修正是值得注意的。其中有一點是實行激勵性的付款，以鼓勵生產亞麻，因為亞麻是一種有利於土壤保持的產物。另一點是對玉蜀黍、烟草，甘蔗，燕麥，大麥，米與玉蜀黍等應舉辦「試驗」保險。換句話說，國會再度檢討華萊士所興辦的機構只有增加了它的權力，而並未減少它的權力。

還有一個華萊士所創的機關是「農業信用管理處」，它依據一九三三年五月間的行政命令設立，旨在舉辦抵押，生產與合作販賣貸款，為農業供給一個完全協調的信用貸款制度。它把全國分為十二個「

聯邦土地銀行區」。在每一個區設立一個「聯邦土地銀行」，一個聯邦居間信用銀行，一個生產信用公司，與一個辦理合作社業務的銀行。四行設於同一城市，由一人兼任四行行長，但各有其全部職員。這一點又是華萊士以分權作為行政方法十分有效的說明。

「農業信用管理處」這機構現在特別有益，因為它處理普通銀行認為太冒險的貸款，駕輕就熟，冒險的成績頗稱美滿，至於農民由此而得到的安全可有下列事實為證：貸款不但令農民們渡過了難關，而且他們在償還欠款之後，已成為美國擁有價值一百萬萬元的現金，銀行存款與政府債券等的農村社會的成員。

此外華萊士為應付蕭條時期的緊急需要又成立了一個「聯邦剩餘日用品公司」，收購人民的剩餘糧食，並把它儲存後，於需要時拋售。最初，它進行得並不順利。那些需要的人們抱怨說，他們有一個星期得到的完全是馬鈴薯，有一個星期得到的完全是橘子。那些存貨的人們又抱怨政府競爭。結果是發展了一個糧券計劃，其目的在通過正常的商業關係散布餘糧。需要者從此不直接得到實物的配額而得到糧券。他們領到五角錢的綠色券，其代價等於價值一元的橘色券。綠色券可在雜貨舖購買任何貨品，橘色券購買雜貨商所備剩餘必需品。這兩種券就造成了平衡的糧食。

一九三九年五月這計劃推行於紐約州的馬契斯特市。開始竟被斥為「新政」巧技；但是三天之後，它就被正式採行，通行無阻。計劃隨即擴展到其他各市，以後並包括棉產品的購買在內。到一九四〇年十二月，計劃已通行於六十個城市，參院並一致通過，為這個計劃撥款八千五百萬元，較農業部所請求

的尤多五百萬元。這計劃刺激了田地生產，供糧於全國三分之一的缺糧區域，並協助穩定了物價。它在全國緊急事態中收到了宏大的功效。

一九三三年十月，擁有三百萬資金的「日用品信用公司」(Commodity Credit Corporation)正式成立，負責買賣，儲存與出借為總統所指定的日用品。它有權在任何時期一次發行總額不超過卅萬萬元的債券，票據與證券。華萊士為公司合夥員之一，並負責其經理工作。到一九四四年六月三十日，公司所有日用品帳面價值為八六八、〇〇〇、〇〇〇元，而未償的日用品貸款總數達四三六、〇〇〇、〇〇〇元。一九四五年初，國會通過該公司發行債券總額由三十萬萬元增為五十萬萬元，從而正式核准了這一個事業，此外並通過延長公司的壽命到一九四七年六月為止。

我們為了說明這公司對於國家的功用，可以舉一個例：牛乳業一年所得補助為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如果沒有這種補助的話，每夸特牛奶零售的價錢勢將增加二分錢。

華萊士這種為農產，為土壤保持的長期計劃的妥善可由三大農業協會的支持證明。這三大農會就是「農民聯盟」(Farmers Union)、「美國農業機構聯合會」(American Farm Bureau Federation)與「農家秘密協進會」(National Grange)。它們對於社會前途的看法並不相同，但是都一致要求販賣協定與土壤保持繳款辦法，物價貸款，同等公式(parity formula)的現代化，逐漸撤回國內補助，調整市場物價的限價，撥款推動過剩物資銷行於國外市場等辦法廢續施行。而這些組織的領袖中間，有好些是以前猛烈反對華萊士的。他的所以能贏取這般人的擁戴，全仗他那實現理論的行政。

我們如把華萊士在這方面的政績總結起來，可以發現在他農業部長的任期之內，即一九三三至一九四〇年之內，他貸給了二百萬農民以六十萬萬借款。而且這期間，償還的借款達十五萬萬，同時雖然有一小部分呆帳，可是因爲利息的收入足以抵補資本的損失，並無一點實在的損失。除此以外，當他於一九四〇年卸任時，我們還存有五萬萬蒲式耳的玉蜀黍，一萬三千萬蒲式耳的麥，這數量約等於我們常年收成的四倍。珍珠港事變以後使我們不致飢餓而且用以接濟盟國的也就是這筆存糧。除此以外，他按那組織全國的辦法對於戰時動員也是一個無可估量的貢獻。

有些人說華萊士缺乏行政經驗，其實這樣說只足以證明他們對於華氏政績的無知。他主持農業部行政八年的史實已使他成爲美國歷史上最偉大的農業部長。他對於信用貸款的處理，其成就足以媲美古今任何一位政府官員。他的業績已經證明他是一個能將思想切實而有效地施行的人才。

華萊士的農業計劃

華萊士的思想已對國家卓具貢獻，一九三七年他爲「大西洋月刊」(Atlantic Monthly)撰述一文，擬具了他的農業計劃，他把他的目的分五題綜述。

一、「土壤保持」

他寫道土壤保持可由下列方法達到目的：首先是輪種。玉蜀黍與麥等按行種植，足以引起土壤侵蝕，必須輪種其他穀物以制止之；其次是使土地休息，長草與翻耕；再其次是栽培力能抗阻風力侵蝕的

穀物。

在他寫作本文以前，「三A法案」曾爲土壤保持化費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並得到了全國百分之六十八的耕地贊助，工作逐漸擴展。一九四三年經營全國土地百分之八十八的農民六百五十萬人參加了「農業調整法案」土壤保持方案的工作。

二、「按年使農產的供應與價格更加穩定，以補救氣候的變幻無定。」

這就是所謂「同等」公式。辦法是給農民以獎勵金，使他的購買力像非農民維持一樣的水平。它按一九〇九至一九一〇年間的水準施行，當時一元的麥可以買到價值一元的機器，工具或廚房用具。

這一個目的始終沒有真正達到，因爲工業品的價格一直穩定，而農產頗受水旱的影響，但是由一九三三至一九三七年農產持續增漲，從此維持着一個始終如一的水平。華萊士從沒有達到充分「同等」，但是他在出名多變的行業裏，使收入造成了一種顯著的穩定。

三、「增大土地所有權的穩定，使農家能在同一村鎮長年居住，因此建立較好的教堂，較好的學校與較好的合作社。」

當地主與佃戶常起變化時，最吃虧的是土地，因爲土地既沒有持續的輪種，那末土地被忽視與虧耗，只有使土地繼續變壞。一個村鎮如果沒有持續的殖民，社會生活的結構也只有每况愈下；村鎮建設也只是一種逢常作戲，誰也不能引以爲永久的尊榮。

舉例說，一九三七年卡洛琳·亨特森由她在奧克拉荷馬州的伊瓦地方寫出通訊，對於村民大多離

去，極少人留下來從事防止土壤侵蝕的工作一事極表遺憾。她描述她駕車巡視她三十哩外的郡址，在一哩半的公路兩旁觀覽的結果，十室九空，發現只有十六家人家還住有居民。這些空屋的舊主人並非移居的工人，而是擁有土地而三代久居於斯的農人。

這種情形對於家庭，對於流動中的兒童，對於行將荒廢的土地，對於荒涼的村落，對於整個美國都是不利的。我們已經談過華萊士的方案如何使千萬農民購買他們自己的土地，從而使農村生活安定下來。

四、「使農民的收入十足安定，以便他們力能由城市購買若干生活上的享受，而不致引起一種投機性的土地繁榮。」

在大旱與餘糧耗盡以後，華萊士於一九三四年建議了「常平倉」的辦法。他提議按這個辦法引起物價增漲。這計劃可使供應與物價穩定，農民兼受其利。穀物投機者抱怨說這計劃是不切實際的。另一方面，那些農產的加工者與分配者由於想到農產突然漲價引起財產目錄上的損失，對這主張是贊成的。消費者的支持它已不待細說了。

這計劃一直進行得很順利。它的工作的一部分就是「過剩日用品公司」，該公司在一九三四至一九三七年間會將價值二萬萬元的幾百萬磅產品分配給城市與鄉鎮救濟機關。這些過剩產物如流入無管制的市場，勢將迫使農產價格跌到致人貧困的水平，並將因而引起另一次蕭條的重來。

華萊士曾撰稱：「政府對於農民收入是具有責任的，因為政府的關稅政策，貨幣政策以及國際政策

都爲了我們的可供輸出的農產而影響着市場。」華萊士說這樣的話是由於他自己早年在衣阿華州的經驗與他祖父的教訓。華氏認爲，如果政府的政策損害了農產物價的結構，它應該以津貼或其他方法給農民以補助。

五、「予兒童較好的食物與較好的訓練。須認清一半鄉村兒童以後將移居於城市，而今後一百年，美國三分之二的人民將是現在務農爲生者的子孫。」

農業部業已證實常人的印象，即大多數農家，特別是東南各州的農家，食物最壞，受教育的機會也最少。兒童們吃不到足夠的牛奶，橘子，番茄與蔬菜。他們從沒有上滿全學期的課。教師月薪只有四五十元，於是教師非年青就是資歷不足，沒有受過適當訓練。在有些鄉區，每人入學的費用不及若干城市與繁榮地區的四分之一。這也就是說，住在鄉間的兒童缺乏有效的耕種之類的合適訓練，而一半到城市去的，對於城市生活也完全外行。

時至今日，我們對華萊士在八年以前爲鄉區兒童所懸目標還沒有清楚認識。

華萊士於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另外在『斯克里勃納斯雜誌』(Scribner's Magazine)寫過一篇文章，題目是「我們不僅是經濟人」，他在這裏着重闡述他思想的另一面。

他說明「三A法案」是把政治自主的做法擴展至經濟與政治兩範圍的一個打算，但是他警告說，政府的行動只是全部事業的一面。他認爲光是通過法律並不能自動產生經濟繁榮。人必須建立並運用新社會機構，而且除非他們是有經驗與善意的人，決不能獲致最大的結果。

「經濟與社會工程師的智慧的確是一個必需條件，人心切實追求社會正義的動力又是另一個必需條件。我們須兼而有之，也許兩者的比例也應該相等。」

爲「三A法案」而設的郡生產協會，曾以民主方法引起了地方責任心，並發展了地方領導力，這一點是華萊士所特別滿意的。他把這種規劃稱爲「經濟民主的幼芽」。他還展望到將來工農業在取給中也施行這種類似的民主時，物價與生產將因而穩定，並將由此而協助創立「爲現代世界所沒有的更公正與安穩的一種經濟制度與一個政府。」

他提倡使用政府權力以調整生活與工作的條件旨在發揮個人的能力與天才。他的目的—向是去除經驗中的恐懼而代之以尊重。他是以政府爲工具，人生爲目的。

第六章 不平凡的思想

我們的美國

沒有人會對於那樣事物都抱同樣興趣。我們每一個人對於自己的經驗有我們個別的處理法。宇宙在每一家人家的門邊對每一個人報告，使用着一套特別的隱語。安迪生聚精會神，利用一切可用的時間，尋求他自己所提問題的解答，終於在實驗室內發現了他自己與一個世界。希爾(Hill)却因為建築，籌款與經營一條橫越大陸的鐵路，終於在這個大企業中發現了他的刺激與自我表現。馬奎特(Marquette)是在為印第安人的服務與探險的事業中實踐他自己的使命。普伊(Poe)則在可怖的陰影中最有自知之明。每個人的期望每每比他那表現特性的活動尤為寬廣，這是他的出發點，他對於其他方面的一個中心關鍵。我們每個人都一定有一種作為生活嚮導的思想。這些思想就像個電燈座。我們一定在接觸它們時才大放光輝。它們是我們與力的源泉之間主要的關聯。令任何人談他「喜愛的題目」，那末只要不去打斷他，他一定滔滔不絕地談下去。也許任何個人最顯露自己的智識就是他的根本知識。

根本說來，華萊士的思想有兩點。

在他看來，二十世紀最偉大的事實是科學與技術已空前地能制服缺乏，愚昧與污穢，——使世界各

處每一個人足衣足食，有安適的住處，有教育的機會，並有餘暇享受他自己的樂趣。

第二個事實是這種技術使所有個人與所有國家密切關聯，互相依存，因此我們要將現有的善於利用，最好的方法莫如爲了共同的最大福利一致合作。

自從一九三三年以來，華萊士的言論的主題也就是這兩點。他最初在一九三三年寫道：

「簡言之，我們希望工程與科學能有更寬廣與更好的有節制的運用，以便使人的能力能有更大一部分用以享受非物質與非經濟的事物，這裏面我認爲不僅應包括音樂，繪畫，文學與爲體育的體育，還應該包括科學家自己的那種閒散的好奇之心。即使是最熱心的科學家與工程師也應該欣然希冀將他們的才能用之於這些更高級的人生目的。如果社會不承認這種目的，那末在這個歷史上特別的時期，嚴重的危險勢必發生，即史班格勒（Spengler，美國經濟學者，一九〇二——）將被公認爲正確，而且從今千年之後，待這個文化陷於中世紀的狀態中，才會有一個新的文化發芽茁長起來。」

在一九四二年，他曾宣稱：

「聯合國像一百五十五年前的美國一樣，正在摸索一種公式，以便建立不致產生專制的儘大的自由，同時不令每一個會員國獲有損毀全體安全的若干權利。……其目的在求聯合國家的自由、平等、安全與團結，——即政治自由，國際貿易機會的平等，免於戰爭與因國際原因發生的產業蕭條的安全，促進全世界福利的意志的團結。……戰爭停止後幾年之內，剩餘之多將爲空前未有。我們如果能把我們戰後的過剩品求行善，求和平，求所謂落後民族生活水準的改進，那末我們不但人道，而且是真正

精明了。……光爲了自己的利益也應該使美國深切關懷世界上其他民族的滿足與豐裕。」

他在同一篇演詞中指出，「每一個國家最大的關懷應該是它自己人民的福利，」而這一點在美國就是必須不令失業時期捲土重來。

由於他具有在華府從政十二年的經驗，他認識了要爭取這些思想實現，鬥爭首先該在國會展開。國會議員們既非聖賢也非魔鬼。他們都是人，抱有像其他人一樣維持職位以求麵包牛奶的動機。因此，議員們最初一項考慮就是如何應付可能重選他的區域的各種勢力。如果人民大眾對政治始終漠視的話，國會議員一定屈服於特殊勢力的運動。一旦人民組織起來而互有聯絡的話，那末他們的議員們也就追隨不懈。因此華萊士認爲當前首要的是喚起民衆的注意與行動，因而使控制國會的特別勢力的力量粉碎。每一個人民的希望都可能被不開明的國會絞殺。達到經濟豐裕與世界組織的路該由投票箱開始，如果人民堅持警惕，這道路是始終開放的。

在一九四四年，華萊士又寫道：

「必須不讓大企業控制國會與政府的行政部門，否則讓它任意寫下戰後的規程，一定令所有戰時對美國生產力作有巨大貢獻的人們悉數排斥在外。我們要國會與政府爲工農而推行其工作。」

「三巨頭——大企業，大勞工與大農業——必須一致承認平民普遍福利爲最高要求，否則爲了獨佔的目的而力圖攫取聯邦的權力，那就一定發生嚴重衝突。三巨頭這種對於大眾福利的承認必須出於真誠，必須不是口惠而實不至的花言巧語。現在三者都具有着前所未有的力量，而三者都遭逢着嚴重的戰

後煩惱。當戰後的繁榮破滅時，每一個都將企圖犧牲其餘兩個以自存，可是每一個的自救之道無他，只有在大眾福利的前提之下設法與其他兩個以及政府通力合作。戰後民主的中心問題就是如何令三者合作而不走向美國法西斯。一

在華萊士的眼中，政治是一種追求福祉的工具；政府是一種手段；人生才是目的。

他是在覓取一種可行的政治方案，希望藉此而發揚我們潛在的豐裕，並在互利的情況之下，策劃我們國內與國際的互助。他告訴我們：我們的資產是什麼，同時他要求我們與他商討，如何利用這種資產來改進我們的生活。沒有理想的人將把這種資產當作犧牲別人而肥己的機會。華萊士可把它們當作在增進大眾福利之下保證我們個人利益的機會。

他把我們在戰爭結束時具有的資產列述如左：

數以百萬計的人力：軍需工業方面的熟練工人，軍隊裏的人力以及將達工作年齡的青年。

世界最大工廠生產力。

生產平時產品的最大的自然與人為資源，還有幾千種新發明可供平時應用。

世界上最大科學化農場。

房屋，運輸，交通與生活享受上巨大無比的需要。

個人積蓄之大，為任何其他國家所不及。

我們將如何利用這些資產？華萊士把問題分為三個：我們需要什麼？我們能有些什麼？我們如何獲

得它？

我們需要什麼？

我們的工人為數在五千萬以上，他們至高無上的一項需要是一種工作持久的保證。「他們需要一種年薪的保證，或者一年工作二千小時的保障。」如果我們以為華萊士這想法是提倡一種永久的全國性的布施，那我們就沒法了解華萊士。他從來不提倡不勞而獲。他相信人類的福利就依存於工作的機會。

他本人就是一個辛勤萬分的工作者。他在工作中發覺了他巨大體力的發揮，他責任感的滿足，一種成就的感覺，以及他創造力的發揮。他在華府日理萬幾的時候，依然不斷發表演說與著作，同時他還自己開闢，自己照料着一個菜園。冬天，他使植物在溫室內成長，而一挨春來，立刻就外出播種新的種子了。最近每一個星期一，他在兩排六十碼的土地裏種下了豌豆，另外種了幾短排其他的蔬菜，然後在八九點鐘去辦公室工作。我會經聽到紐約一些會客室內飽食後的清客辱罵華萊士，說他破壞了個人勤勞的那種高貴的理想，每每使我啼笑皆非。華萊士一星期內所作純體力的勞動比他們在一年內想像的還多，而且除此以外，他在行政工作之外，還有足抵一個大學教授的研究與寫作的計劃。紐約有一對嬌生慣養的夫婦，他們對「這位不切實際的夢想家的破壞美國的工作理想，深以為憾，」他們最近坐火車到了佛洛利達州，就「因為冬天的日子過得太多了」在那裏太陽底下僵臥了一個月」。

華萊士頌揚工作。他認為一個工作的人是一個心滿意足的人。他相信工作創造財富，而且如果每一

個人都堅持建設性的工作，我們生產的財富就無可限量，足以消除貧窮，愚昧與污穢。他知道得很清楚，人民決非天生好懶，但求游閒，相反的，他們都是自尊的人，要求的在公平的條件之下，用他們的手腦工作，以換取該得的代價。他理想的不是領養老金的美國，而是一個工作的美國。工作所要求的第一項事物就是一個穩定的工作。

勞工如工作得到了保障，就要求効力以改善產品與工作條件的機會。華萊士說過：「有組織的勞工已有多年歷史。……：勞工要作爲一個負責的夥伴，要求的是一個爲工業有所貢獻，以便由此而產生裨益。大戰期間，成千成萬的工人都提供增進效率，增大產量，節省時間與成本，改進產品質料的意見。」這是我們自傲的美國創造力的當代表現。自由人要能獲得工作較完善的方法，一同工作，分担各種努力。這是激增無已的國富的恒久的源泉。工人們需要改進產品所得的榮耀。

華萊士說，農民需要較工人尤多，因爲他不僅是一個工人，「而且也是一個經理，資本家，商人與債務人。」他第一個希望是「祛除它業務上種種非常的危險。」他要求合適的市場，低的運費，低的利率，合理的銷售耗費，與一個以低價購買農業機械與肥料的机会。「農民愛土地，希望能經營它，傳給子孫，而且情形比他最初獲得時還要好。至於最重要的一點，農民需要收穫豐饒，看到他們辛勞的成果有利於人類生活水準的提高。」

最聰明的農業領袖們都知道只有工人充分就業，工資頗高，他們才能希望農產價格維持於一個高的水平。同樣聰明的勞工領袖也都清楚，要不是農民興隆，他們也無法維持充分就業。同時商人中精明者

也一定知道，要不是工農都能買貨，他們的產業也就無從擴展。

不錯，商界上有些冒險家，他們沒有別的心思，只想操縱法律與經濟，為他們自己建立獨佔與特權，可是他們雖然有權，究竟只佔少數。普通商人——小商人——所需要的是在沒有獨佔恐懼的自由市場裏從事競爭。

至於退伍軍人，他們現在的需要比任何別人為殷切，華萊士曾簡單明瞭等說過：「他們和工農具有一般的需要，而且有過之而無不及。」

事實上我們可以分成各種不同的集團，分別稱以不同的名稱，可是除了利益與全體利益衝突的少數人以外，大家都需要着同一事物，即華萊士所說，「勞工，資本與技術的充分就業；所有區域的平衡發展；保存真正的自由企業與競爭，以保證向提高生活水準之途邁進，避免商業上的波浪；勞工，資本與農業都不受剝削。」我們大家都需要工作，健康，安全，自由，商業機會，令兒童獲得教育機會，以及持久的和平。

希特勒曾經說過，「幸福」是民主思想的大妄想之一，自由人民的所以退化它是個大原因。」在另一方面，華萊士認為「幸福的追求」是好生活的一種鼓勵性的目標，而且自由人民能夠真正竭誠爭取，勢將為人生經驗質的改進提供以增大的機會。

這就是我們的需要。

我們能有些什麼？

我們能有良好與豐富的食物。這也就是說有了健康。有人說過「美國人民的健康能達到最好的程度，他們的效率至少會高出三倍。」華萊士把這意思用更明確的數字闡述一遍，他估計只要每人每年多化兩元，我們將掃清所有由於維他命缺乏所引起的疾病，延長每人平均工作時間十年，並增加我們至少一半人口的活力。

我們能有合適的醫院，因此每人在一年之內可有一次體格檢查，只要有資格的醫生認為需要，每人可有醫院的照料。醫院再加完善的公共衛生計劃，足以防止肺病，梅毒以至於瘧疾。

我們可以有好的住宅。華萊士定下了在戰後時期每年應添造一百萬座新屋。沒有人能指責他這個估計過高。其他有資格的權威的估計還要大。不過他不僅要求新的建築，而且要求運用有效率的新的設計，以便主婦以現在化費的三分之一的時間做完烹飪，打掃與採購等事項。

我們可令鄉村電氣化。除少數居民太稀而房屋之間距離太遠的地區以外，我們可以為美國每一座家屋供給電力。「電力的廣為傳佈，再加上好的公路，低廉的汽車以及可供小農場使用的特種農具，可望在今後十年或廿年之內使幾百萬戶人家搬遷到距工作所在的工廠與商業區幾十分鐘汽車行程的小地區居住了。」這種情形並可打開如下的遠景，即家庭的復興，我們若干人民的家庭將展開一種半鄉村的生

活，而這種現象又可能成為平衡我們國家經濟的有效法碼。

我們可以有一種爲有訓練的農民所經營的農業經濟。戰後完好的曳引機與耕土機一定可供農業使用了。新的肥料，新的穀物，新的飼養方法以及較好的土壤保持方法都將精益求精。……美國一個農家的能力除自給外，並可供養四個城區家庭，這在戰時與平時都一樣可以做到。除了陷於失業的困境以外，我們如不能得到空前最豐富的農業發展那是沒有理由的。

我們可以有較好的學校。現在我們的需要萬分迫切！雖然在我們社會裏沒有任何其他一種活動比我們的教育制度更爲令人滿意，但是它正是我們必須滿意的少數事物之一。在我們城市裏有集體生產的教育，在較窮苦的農村區域裏有初等教育。這是民主政治中最重要的一項工作——訓練人民使成智慧的公民——而我們從沒有嚴重地注意過。我們歡呼某些巨大學校的陳語，可是當提議如何改革它時，就握緊了錢袋。其結果是青年侵蝕，它對於社會的損害正比土壤侵蝕尤爲嚴重。如果我們能利用戰後的機會使我們的教育成爲驚人地創造性的過程，我們一定能真正對世界有所表現了。

我們可有一種經常擴大的貨品需要。華萊士曾這麼說：「有些人在私下裏談着若干畝的金剛鑽或金子的礦。其實在我們國內真正的金礦是那一千萬最窮苦的家庭，他們在戰前一年只買了五十萬萬元的貨品，但是戰後如果給他們以機會，他們很容易供給一個一百五十萬萬元的市場。」我們國家最大的浪費是失業的人力。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中，失業剝奪了我們可以享有二千萬萬元的貨品，這數目比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美國的耗費尤鉅。

「大戰時期，我們的意志形成一種偉大的目的，我們由此證明，我們可以努力增進國家的繁榮，達

到史無前例的水平。……如果我們大家能通力合作，我們能在一九五四年生產比一九四四年大戰時生產最高峰的一年更多的貨品。」

這就是華萊士所認為我們可能得到的事物的綜述。

我們怎樣獲得它？

我們必須現在就開始。我們不容等待，不能一直等到工作的舊習慣恢復，而令我們墮入又一次更不幸的蕭條之中，因而又需超人來把我們從困境中解救出來。

我們於戰爭終了時，擁有許多剩餘物資，如機件，進行巨大建築工作的機器等，這些正是世界其他部分要買的東西。今後我們的要事之一是如何使其他人得到它們，如何設法使他們償付代價。

要使外國能償付我們還有兩項需要。首先我們的人民於充分就業時，將需要輸入比平時使我們工廠工作的兩倍的物資；同時我們知道還有若干戰時必需的戰略物資，我們爲了保持安全，將儲存大批這種物資。這些需要說明我們將向外國購貨，從而使其他國家能向我們購買他們所需要的東西。

華萊士每每具體說明這個原則。他說：

「蘇聯要機器。好，那就讓蘇聯付它剩餘的錳與白金。中國要求一個灌溉系統。它的鎊砂自用還有多餘。就讓它付鎊砂。波斯要一個電力系統，它可以付我們石油，我們可把它們藏在地下的油池裏。智利要造幾個飛機塢。讓它給我們銅與硝石。由於我們巨大的作戰努力，至少有二十種戰略物資已感覺

缺乏。」

我們知道，世界各國的互相依存，情形爲空前未有。我們可以把這種互相依存的關係變成一種爭取世界繁榮的工具，如果我們利用這種互相依存的關係而作互相有利的貨品交換，那末世界繁榮也就包括我們的繁榮在內。

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我們所得的經驗都是危險的信號，足以警告我們切勿使用那較狹而所謂「精明」的做法。這種「精明的」做法的困難是本國人民將悉索敝賦支付帳款，而世界經濟將不可避免地趨於破產而召致戰爭。

我們可看一看一九一九年以後這種「精明的」做法的「成績」。有一羣商人在國外多賣出了貨品與服務。他們賺了錢。另一羣人借錢給外國，賣債券給美國投資人。他們也賺了錢。第二羣人以債券募來的錢正好支付了第一羣人賣出的貨。當外國不能償付這些債券時，投資者就一無所得。結果付錢的就是他們。歐洲得了貨與服務。美國人付了賬款。歐洲沒有付款，那是因爲我們沒有讓他們按以貨購貨的辦法償付。我們告訴其他國家他們不能與我們做買賣，並譴責它們沒有償債的錢。少數美國商人賺了錢，但是大多數人受了損失，而舉世陷入於經濟蕭條，從而在德國產生了希特勒與延及各洲各洋的一場大戰。

那種過去陷我們於困難的商人於戰事勝利後又力圖東山再起，他們會說，建議一種平衡的世界經濟的人都是「幻想者」。他們一定會椎胸泣血，主張自由企業。但是我們必須十分警惕，謹防他們把我們重新帶上又一次與更不幸的災禍的路。我們必須處理我們的關稅與貿易協定，確保我們能向國外買到

們所需要的東西，庶幾別國也可以向我們購取他們所需要的東西。

實現充分就業的另一個辦法是使我們的賦稅制度爲社會與經濟的目標而用。戰後對於個人所得要繼續課以重稅，爲勢所不免。但是我們也可以同樣方法課商號以捐稅，一迫使公司將存儲款項或作添造廠房與設備或分作紅利之用。一大公司的準備金儲而不用就是國家購買力的損失，也就是說減少了就業。捐稅應鼓勵新的企業與舊企業作新的擴張，不應鼓勵公司囤積。

實現充分就業的第三條路是我們國境以內去除各種貿易障礙，即各種獨佔的行爲。任何地方如有個人，公司，或一羣公司使用其權力以限制自由競爭，就有潛在的獨佔存在。任何地方有人因怕妨害自由的企業而壟斷新發明，或統制市價以排斥競爭者，或在某一行業內結成限價的協定，或壟斷某一必需品，獨佔的弊害勢必發生，新企業受挫折，而大眾福利因私人獲利而犧牲了。

這種獨佔的行爲，勢必減少生產而提高物價，並繼續召致貧困。一千萬戶人家所以食不飽，衣不暖，居鄙屋，其原因就因爲生產有了這些限制，致令陷於失業。今後金錢的投資，生產量的決定，物價的規定，工人工資工時的交涉，作決定時必須儘可能促進充分就業，充分生產與充分消費。有人說這種計劃是非美國的，實屬荒謬絕倫。每個個人都有計劃。每個商業上的經理都有計劃。問題不是用計劃來對付無計劃的，而是什麼計劃才能爲全國人民造最大之福。

我們過去給「自由企業」以無限的機會令它表現它能造成怎麼樣的美國。結果是一九二〇至一九三二年商業利益控制了我們的政府，爲它確立了政策。當時的局勢對這種發展也極爲有利，最初正好是第

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的一度繁榮。「自由企業」最適當的代言人胡佛會說，「自由企業」已領我們走向一個新的時代，保證每個人的餐盆裏有一隻雞，每家汽車間裏有兩輛汽車。但是胡佛一派愚蠢之至，完全不顧經濟專家對於嚴重趨勢的警告，結果令我們遭遇了史無前例的經濟蕭條。既陷於蕭條之後，它又不知如何解脫，只告訴我們繁榮轉眼就來。它驚惶失措為時十二年，而它在白宮裏的代表也已因預感美國制度勢將崩潰而嚇昏。商界為自己計劃，為國會計劃，又為當時華府的總統計劃，而它的計劃結果就產生了破產的經濟與一個窮困的國家。

華萊士所提倡的是另一種計劃。他建議我們要為大眾福利，深思熟慮，設法規劃我們的資源與生產力。他主張對個人創業不予阻礙。相反，他主張規劃與贊揚發明家，有經驗的經理，個別的經營者，商人與銀行家的社會功用。他從無減少他們機會或限制他們對社會貢獻的建議。他所要求的是我們要儘可能正確地估量這究竟是什麼貢獻，然後，如果我們認為它不足以為我們人民供給職業與安全，我們就應該準備一個為社會設計由社會經濟支持的輔助計劃，以補足它的缺點。

對於真正的自由企業極少人比華萊士說得更有力了。他說過：「復興與進步的代價就是誠心接受健全的競爭，——價錢，質與服務的競爭。」他認為這種不受獨佔與政府限制的公開競爭實為解放我們這種社會的創造力的首要事項。他只說，經驗告訴我們，商業不論大小，我們如果在公道的利潤之下予以它為所欲為的機會，結果還是有失業，這也就是說貨品的需要勢被削減；我們既不容這種情形，必須從社會整個出發，對商業有所計劃。我們消費的潛力一定要維持與我們生產潛力相等的水平才行。

華萊士所以有這種主張，發端於他的兩種思想——科學與宗教。我們要衡量一下他的科學觀與宗教觀，還不能對他有公平的讚揚。

第七章 華萊士與科學

科學賜給我們以新技術，新技術改變我們人生經驗與人間關係極爲深刻，它歷來的成就，實同社會形式上所發生的革命。

華萊士說「一百年來，所謂文明世界生產率的增加平均每年百分之三。由於人口增加的抵消，平均每人生產量的增加率爲每年百分之一。在美國的物質財富的增加率也許較這個數字尤爲迅速。」

按理我們應該因此而具有更多安全，更多時間享受生活的樂趣。可是我們所困惑的是：人民中大部分安全較少，而享受無憂慮生活與娛樂的時間也並不較多於他們父與祖。我們的生產力增大，而生活在更大的匱乏的恐懼中，而且工作愈單調，領受着經濟不安更廣泛的恐懼。

不錯，成就不是沒有。我們征服了疾病的恐懼，改善了藉以障蔽的居室，並具有了社會上其他的便利，因而消除了人大部分對原始自然的恐懼。我們創立了一種抗拒自然環境危險的社會環境。但是，在這個過程中間，我們又有了受制於社會環境的危險，我們以新的恐懼代替了舊的。我們雖然改善了人的體力條件，却並沒有減少他們精神的煩惱。我們在物質方面有了全面的擴張，但是我們並沒有將科學方法使用於社會制度，從而使社會產生的財富能有個迅速而平均的散佈。

於是我們的社會制度成熟，而我們確實獲得的財富受了限制。這乃是說，本國在最近幾年，力能獲得永久性的國民收入一千七百萬萬元，可是實際上只得到六百五十萬萬元。我們的社會機構只運用了它三分之一的能力。

我們有把握說，在我們科學家手裏已經擁有足多的新知識與有用的物質革新法，因此我們在一九七五年可望獲有比現在大兩倍的生產力。同時我們也有把握說，我們如果不改變我們對於社會機構的運用，那末卅年以後，真正產生的總財富將比諸現在還要少。在一方面，我們是有了進步，即人類增大了對自然的控制力。可是在另一方面，我們退步了，因為人類自己發動了社會力量，却不能控制它。

我們的弱點一向是我們沒有將科學方法使用於對人類的了解上，使用於人對社會關係改進或退化的過程的了解上。

華萊士的說法是：「今天事實已更明顯，他們必須注意社會的質與量的擴展。」

因此，他要求工程師與科學家勿孤立於與他們有關的經濟與社會圈之外，並使用他們的科學訓練以對付生產增加中生活貧困的矛盾現象。

華萊士說：「科學一貫地創立着另一個世界與另一種文化，如果這種文化要能持久，它必須具有一種自覺的社會目的作爲主旨才行。科學與工程要像工程師造橋一樣真能解決問題，這兩種東西必須具有這種宗旨，否則它們以及以它們爲一部分的文化都一定自行毀滅。」

我們能主宰自然，爲什麼我們不能以同一辦法主宰社會力量呢！

物理的科學家一向有瞧不起自稱爲「社會科學家」的人們的習慣，似乎認爲他們根本不配稱爲科學家。但是目前社會科學試探性的開始已提供了一種調查與發現的路線，這路線可能打開真正進步的下一個時代，而較老的科學最好能與它合作，抱同情而勿予嘲笑。

華萊士由於他自己工作的性質，他特別有興趣於處理生活組織的科學，因此他要求對事物生活這方面比對機械這方面更加注意。我們因爲致力於求得機械的進步最後可能陷於迷茫。我們甚至還可能竭盡了機械科學的一切可能。但是在人生改進方面還有無盡的領域可供開發。當那種改進成爲改革人類與人生的事業時，迷茫就決不會發生。當我們知道如何生產而又知道爲何生產時，城市與鄉鎮的生活水準可能一直提高。

我們每一個人知道數學分析的迷惑，但是人生數學的迷惑程度與微積分的差異，猶同微積分之與數學。華萊士說過，「過去百年內科學所作量的回答是不夠的。它只增加了生活的速度而並沒有增進生活的質。我們果能有人具有像牛頓一般的想像，去發展人生工程的高度微積分，那末這事情在我們的生產力爲全人類生活幸福而增進時，是萬分必要的。」

華萊士並沒有自比社會科學的牛頓，但是他的確企圖將某幾個必須解答的特殊問題作成公式。這是第一步。我們既有正當的問題提出，自應該覓得正當的解答！

他主張政府應撥款，以便某些人提出推考的問題。這在純科學方面是衆所周知的需要。它是極有意義的研究。過去農業部回答過關於蚤能跳多遠的問題，有人因此譏笑它。那些「精明的商人」們會一度

認為非常有趣，當作話柄。而事實上關於蚤的研究——包括它們能跳多遠在內——是一九〇六年的發現的一部分，黑死病是老鼠所帶的蚤所傳染的，而黑死病可決不是好玩的事情。

華萊士對於純科學具有親身的與良好的經驗。二十年前，卡內基館的史庫爾與伊斯特爾博士第一次從事玉蜀黍繁殖試驗，發表了他們的結果而並未想到實際的利用。以後華萊士生產雜種玉蜀黍就以他們的工作為基礎，這種雜種玉蜀黍在八千萬畝中的產量等於以前一萬萬畝的產量。純科學是實用科學之母，正像問題是回答之母一樣。

華萊士主張經濟上應用更多的科學，庶幾我們的經濟機構與我們的科學機械的調整在精密，力量以及靈敏方面都能正相符合。

我們知道生產力與消費力之間必須平衡——我們究竟怎樣處理它呢？我們知道，如果一個債權國堅持以大量輸出超過大量輸入，其結果將是一場災禍，——那末理想的平衡如何，我們又如何才能做到這一點呢？我們知道我們整個制度的穩定有賴於我們重工業的安定，——變動的原因是什麼，它們又該怎樣改正？我們知道，我們的貨幣制度該照顧債權人與債務人，生產者與消費者，——我們又怎麼能使它同樣公平，對雙方同具鼓勵？我們知道捐稅影響着金元的購買力——我們又怎麼能使它平衡，從而產生最大的社會利益？

這樣的問題其實也像「為什麼蘋果向地上掉」一樣可以解答。各種因素都可以衡量，可以與整個局勢聯系起來。

華萊士並不假稱他各個問題都有答案。他不過堅決認為，如果我們把思想放上去我們可以得到解答。同時他樂意以現有各種假定進行試驗。他的弱點是他求知心切，往往容易信任一種未經證實的假定。他這一型的思想往往對富於智力的明白陳述感到滿意，因此他很容易以陳述的頭頭是道當作它確鑿的證明。他的力量是在這胆小者的世界裏，他敢於覓求新的原理，我們不容擔心他會跑得太遠，因為因懶性而停滯的人極多，他如果形成什麼過度急速變革的趨勢，這些人就足以牽累他。

他自己關於社會方面的精密思想多半歸功於他作的統計。他曾作過關於本國國民收入，各業就業的分佈，政府機構，農業，工業等問題基本論據的分析。他所作六千萬個工作與推行經費的具體建議，就根據所分析的結果。我從沒有發現當年羅斯福總統在芝加哥發表六千萬個工作的意見出於誰的見解，我們已經說起過，當時華萊士會認為數字提得太高，不過，他後來的研究使他相信六千萬個工作的目標可以達到。所以後來他使用到這個數字，乃是仔細計算的結果。

同時他的社會思想也應用到了他原先用於樹枝繁殖的那種分析，他在玉蜀黍以及其他有機物上所作種原的研究使他明瞭，植物如種植於富於共鳴的環境裏，長得最好。他知道，要為人類遺傳與環境這一複雜的問題作個充分而有自信的回答實非易事，而他的這種知識是不夠的，但是他覺得一種分析並不就是理論，不過是走向完成理論的道路，同時我們現在擁有改善我們人種與能力的大好時機，只要我們能創造一種文化，使通常的人民都能享有快樂而正常生活的機會。「我們不能以法律制定好玉蜀黍或好的人種。我們一定要求之於自然，如果我們旨在建立不僅為人種改良學者而且是所有人類精神創始者夢想

中的較好世界，那末我們就必須運用我們人類心智的最好成果才行。」

他視教育為達到這個目的的途徑，他建議所有教育，包括特種科學教育在內，應該包括某些學生藉以明瞭自然與人類文化歷史的部分，因此每一個人的才智應在他所服務的社會的智識的背景上予以運用。

也許總結他對於科學處理人生問題的見解的文字最好莫如李連韜 (David Lilienthal) 所寫「TVA 民主的行進」(TVA, Democracy on the March) 中的一段：

「今天，任何事情不論如何近乎幻想，只要有合適的組織，即一羣工程師，科學家與管理人員，沒有做不到的了。……今天，我們一個個都將成為建築師與技師：我們已不是手執斧，來福鎗與刈刀的人，而是使用狄塞爾引擎，平土機，巨大的電力鎚，彎頸蒸溜機的人，而且我們中間大多數人具有出衆的技術，具有策劃與執行的新式方法。……而全世界的人將對這種技術與資源的果實要求愈多。人們都相信這些成果可以屬於他們，——它構成爲我們這時代真正的革命；它也是當代決定一切的政治事實。」

第八章 華萊士與宗教

華萊士的科學見解與他的宗教思想相交的一點在於他對於有生物以及生命的尊重。他的科學興趣在於改進生活條件，使人能作他們一切可能的成就。他的宗教運動又平添了他對於人類信心的熱力。他相信人類要增進其偉大，可謂具有幾無限制的能力。因此在他看來政治家的任務與真正的宗教在許多地方相同。

他說過：「政治家的問題是在起擬一種政策，嚮導人生向更高的境地發展，而且不要怕暫時性反對的壓迫，堅持該政策，並使人民視為合乎希望。按較寬廣而長期的眼光來看，那些專注意於最近將來，或一個小階級的福利的人是完全不切實際與不合理的。按筆者的看法，宗教是世界上最實際的東西。我這麼說，並不是指上禮拜堂，或辦慈善事業，或作一般人稱為宗教的那種表面的表現……我是指控制人內心對上帝及同胞的態度的那種力量。」

他推斷全部民主思想出於內在的信心，即人全部了解都由對上帝及對同胞的關係上產生：「我們於鍛鍊我們的青年時，一定得使他內心茁長真理，即民主的本質就是對上帝的父道，人類的兄弟之誼以及個人靈魂的尊重的信仰。」當華萊士說這樣的話時，他確實是表示着他自己深刻的信念 並向我們顯示

這是他內心之火所藉以燃燒的柴薪。

要「不理睬他這種意見很容易，你可以稱他為一個「神秘主義者」，不去聽信他就行。可是誰這麼做無異自示其淺薄。華萊士發言並不是為着他所謂「那些膽怯的傢伙」——「教會的那些冷血動物，淡薄的仁慈，幼稚的冷漠。」他的發言是出於他內心某一重要事物，其重要足使他為它而據理力爭。他的發言是出於他與歷史上巨大運動中抽象的，心理的與精神的根源相合的思想，它們會產生政府，科學，音樂，文學以及我們稱為文化的所有多種色彩的燦爛的藝術。

為了解華萊士的宗教見解，我們必須把握它的某幾點事實。

華萊士的接近宗教是由於他祖父的引導。他祖父對於聖經並不受傳統的解釋所拘束，因此華萊士的接觸聖經，心裏已經有了根本的主意，從聖經的詞句以至於它所報告的人生事實他都以主見去處理。華萊士時常閱讀經文，把它當作活人的活的故事，因而把握其中個人與社會問題，與處理我們現實問題的一般態度。聖經裏的人物並非勸人為善的例證，而確實是活的人們，活的故事，他們的經歷正好顯示我們所必須遭逢的事物。

舉例說，大衛最初集合了「不滿的負債者階級四百人」，但是他登皇座既穩，「他對於慘遭蹂躪的負債者階級就愈加忘情了。」亞伯沙隆「領導了一次叛變，可是因為大衛兵力較佔優勢，終被撲滅。」以後蘇羅門「得城市商界人士的支援，勝過了代表對都市化不滿者的阿唐尼約」。「担负捐稅的人民」對勒荷邦發動叛變，是因為他「既無減稅辦法，又無商業擴展計劃。」……

華萊士生於農民騷動中的衣阿華州。他的祖父就是農民們一個有力的領袖與發言人，他每以希伯萊預言說明他的運動，會因而得名；華萊士在這種情境中如何長大是不難相見的。希伯萊預言家們在華萊士毫不陌生。他們也許曾經是他的鄰人，而他還聽到過用他們的話說出的當地的抗議。當他反映了他們生活與發言所根據的同一內在的心情時，他們的社會正義的思想也就成了他的思想。按他的情形說，宗教並不神秘。它適用於抵押，債務與捐稅。他的信奉同胞愛並非因為它是一句敬神的話，而因為它是藉此聯結人間關係的一個原則。他認為當牧師與教師談到上帝之道與人的兄弟之誼時，他們一定懂得所說的意義，而他的所以接受它，是把它當作好生活的一種嚮導。

他至今篤信不懈。他的生活與思想都按諸人們稱爲「社會福音」的那一種經文。這就是說，他並不以爲宗教只是把他個人的靈魂救出地獄的一種方法，而是把天國帶到人間的力量。這種宗教的社會思想卅年來會由勞斯真布教授 (Professor Walter Rauschenbush) 加以明確的說明，而且它在清教教會裏具有廣泛影響。華萊士就是深受它影響的一人。

他從歷史上知道，每當社會發展到達轉捩點時，就有有力的宗教改革家挺身而出，而宗教的動機會成爲社會進步的有力因素之一。當信念再生時，古老的一些錯誤就被一一矯正。那些將上帝與仁愛的真義灌注於新而活潑的生活中的人們往往就是動亂時代社會更新的先驅者。華萊士看到，這些爲他們各該時代的問題苦鬥的人具有令希伯萊預言家們抬頭的那一種精神與力量。他設法使他們的理想與精神力量用之於當前各個問題。他覺得他這麼做正是他信奉着若干年代最真也最實際的見識。

在華萊士的思想中，人們不難發覺他不滿於實利思想的愚鈍見解，這種實利思想乃起源於生存競爭與適者生存的理论。他承認這種理論不無真理，但是他並不認為是全部真理。他堅持承認人還有合作、同情與希望的能力，不過它比較輕微而已。

我們對於人類尊嚴的估價漸趨低落，業已經歷了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哥伯尼（Copernicus）曾告訴我們，我們的世界並非宇宙的中心，而不過是較小恒星的一個衛星而已。達爾文告訴我們，我們並非比天使稍稍低級，而不過是較人猿稍稍高級而已。佛洛特告訴我們，我們只是我們無知的犧牲者，而不是自己命運的舵手與（並非存在的）靈魂的船主。愛因斯坦已使我們的衡量尺度演進為彈性工具，使我們的真理成爲「相對論」。希特勒曾經表現，一個狡猾而有策略的人能操縱別人，爲他所希望的目的效力。人類的尊嚴已經到了極難維持的時候。

不過，人類尊嚴的遭受明白的迫害發生在我們任令機構成爲人類剝削無控制的工具的時候。一面是名叫「利潤」這種無人性的東西高過於人的價值，在另一方面，那名叫「國家」的同一無人性的東西佔了優先。在這兩種情形之下，人都不成爲目的而只成了工具。而兩者都出諸於同一種對人生所作冷漠的估價。

華萊士顯然是對這種實利主義的一種反動。他爲人的精神的大權發言。他支持着一種基本的道德律，即把人們當作工具並爲他們以外的目的而利用的行爲是錯的，任何行爲的判斷標準該是它對於人民如何。

厄力夏會向婦女發問：「這事情對你有利嗎？對你丈夫有利嗎？對你孩子有利嗎？」華萊士把同樣的問題向國家質詢：人民的情景如何？由於他篤信上帝與仁愛的真義，他立意把財富，權力，政府，商業，農業，勞工以及所有文化制度都為豐富與改善男女老幼的經歷之用。他恨戰爭，會希望第二次大戰把阻礙永久和平的障礙掃除淨盡，他相信如果我們人類可能有個好世界，那麼大戰之後應該建立起來。

第九章 反種族偏見

導師卡佛爾

當華萊士還是個幼童時，卡佛爾(George Washington Carver)正在衣阿華的州立學院。他是華萊士父親的好友，由於小華萊士有好奇心與熱心，他對他極感興趣，他幾次採集植物標本的旅行，都帶小華萊士同行。最初使華萊士接觸到植物學以及植物施肥的神秘的也就是他。華萊士就因為經過了這番嚮導以後開始了栽培雜種玉蜀黍，以及以更有效的土壤與穀物經營應付國內國際需要的工作。

如果我們還能夠清晰地回憶當年那位黑人科學家與一個白種兒童一同出行，傾談耕種的方法，而時時並頭臉看同一個品種的景象，當不難了解，為什麼華萊士認為那種膚色與出身不同表示天賦優劣的觀念可笑。

卡佛爾生於父母充當奴役時，因而一向不知道確實年齡幾何。他開創了農產供作工業用的可能性的研究。他的名聲已見諸於我們國家的成就記錄上，因而即使是最盲目的迷信者也承認他思想的富於創造力與週全。

華萊士早年與卡佛爾的接觸，正好是他思考各種社會偏見的好的起點，因為他探討它們從此採取

着生物遺傳學與人類之友的兩種觀點。

華萊士在一九三八年所寫關於人種改良的文章，允稱當代關於這問題最有見地的著作之一。它開頭的一部分就詳述印第安穀物對於美國農業的貢獻，然後詳論遺傳學的基本原則，後者是他從植物繁殖的實驗中得來，在第二部分，他就開始解答如何將這些見識用以使人類有更好的繁殖的問題。

他提出的第一點是我們僅僅消除缺點並不能改進人種。我曾聽到一位有見識的人說過，希特勒所能傳襲的一個永久的思想就是以消滅有缺點者改良種族。華萊士立刻打破了這種神話。植物繁殖的實驗證明生物遺傳非常複雜，決不能僅僅靠消除表現整個種族的缺點最明顯的一些個體來改良。他們的所以有缺點是由於種族本身具有產生缺點的趨勢。我們懲罰那些最弱的人並不能令整個種族消除這種趨勢，因為這些人所有一般缺點和其餘人也只是程度上的差別而已。

事實上，植物成長並非純粹生物遺傳。沒有一種玉蜀黍能在全美一齊生得好的。除了去除雜草不算以外，至少成功的一半須依託於明瞭什麼泥土特別宜於某一種玉蜀黍，然後栽培與加肥都按適當的方法進行。這也就是說，收成的好壞與環境及栽培方法關係極大。

華萊士認為這一點可適用於人類的經驗。不過即使如此，這比擬也並不完全相當。穀物的栽培的問題比較簡單，它集中在達到一種明確的目標。任何人要引導人類進化，就得不僅在產生體格健全的人這一點上，而且要在改善人的思想與解放人的精神這些點上，檢討他的方法與目標。如果有人以為人種改良的問題可以用實用人類遺傳學來完全解決，那他一定是個淺薄的人。

我曾經有位朋友，他被聘考察全國各地的澤西牛，有一天他向我解釋他在下一個決斷以前所考慮的色澤與形體各點。不論在飼養上化多少時間與金錢，沒有一種牲畜是完善的。既然我們不能養一條完善的牛，那末我們對於讓一個獨裁者運用人類遺傳學去挽救人類該不能置信了。

比較明智的途徑應該是創造一種最有利於解放人的力量與發揮人的成就的環境。

「種族」的誇口

這裏很自然地帶給我們一個問題，即是否有一個種族天生比其他種族優越。也許我們得先問一問什麼是「種族」？「種族」一詞也許是我們文字中最過多使用與最多誤用的一個詞。我曾經聽到人們使用顯然有問題的名稱如「英格蘭種族」，「日耳曼種族」，「俄羅斯種族」，「法蘭西種族」等，使「種族」成了「民族」的同義字，這種文字的用法無法表達確實的思想或明晰的意見。另一些人談到猶太「種族」，愛爾蘭「種族」等，這又將文化傳統的依附與「種族」混雜起來。其次還有無處不有的人們談到「白種」「黑種」「黃種」「棕種」與「紅人種」，他們又把種族分別與最顯著的顏色等量齊觀。這種說話的不小心每每使人莫衷一是，並造成錯誤見解，使無良心的偏見的投機者從中取利。

按通常的用法，「種族」一詞是完全沒有意義，至多不過說明用的人的愚笨與卑鄙而已。

卑鄙的最顯著的例子莫如德國那些所謂「科學家」，他們將科學名詞用來作無恥欺騙的魔術，來污辱着自己的靈魂。

這些「科學家」倡導所謂「諾狄克種族」，這種人居住德國並散佈於一二鄰國。他們對於這種種族的描繪正是一種自大狂，罪惡心理與純粹的煽動三者奇妙的混合。這裏有一段出諸於官方的說法：

「智力的天賦並不相同。在真理認識與能力上的差別尤為顯著。大部分諾狄克人具有自知之明。他們沉默而謹慎，經常感到侈談有失體統。他們一旦下定決心就鍥而不捨。他們的精力不僅表現於作戰，也表現於技術以及科學研究。自然賦他們以領導的能力。」

也就是這個「種族」自己發現希特勒具有「天生的領導力」，他顯然在「真理認識」上高人一等，「沉默而謹慎」，不屑侈談，而具有「自知之明」。

這裏還有一段他們對於英法的「西方種族」的說法，其目的也無非在闡述納粹的「種族」論，他們的說法是，「西方種族與諾狄克人相比在心靈的質上就有巨大差別。西方種族的人……喋喋不休。他們比諾狄克人缺少耐心。他們的行為憑感覺而不憑理智。……他們極易激動，有時甚至於感情用事。西方種族即使極度興奮也缺乏創造力。這個種族所出傑出人才為數極少。」

這種納粹「科學家」會企圖將他們「諾狄克人」的一種思想吞沒人種學家的「亞利安」一詞。然後他們把他們要迫害的人稱為「非亞利安種」，而把所有他們希望栽培的一律稱謂「光榮的亞利安人」。他們的「科學」與事理思想或定義的修正風馬牛不相及。它不過是一種秘密會社的儀式，藉此以矇蔽人民，俾令加入神祕的會社裏去。這也許是一種延續「互助團」(Freemasonry，中古時創立的秘密團體，以互助為號召，散居世界各處以暗號相通。)的有趣方法，但是它決非治理世界之道。

在科學上說，一個「亞利安人」是操由印歐語根蛻化出來的語言的人民的一員。我們有許多人都亞利安人，包括猶太人，日耳曼人，英國人，法蘭西人，以及其他為這種文化傳統一部分的人在內。印度人則大部分是亞利安人。

換句話說，人類社會的研究者使用種族一詞旨在使若干世紀內興隆起來的人類廣泛的文化有所區分。它並沒有應用於區分遺傳因子的血源或人的能力。自由與負責的科學家都不會使用「種族」一詞來分辨他所比較的人羣的能力。只有那些納粹的科學騙子才大用「種族」，「諾狄克」與「亞利安人」等詞。

這一點說明對我們是十分重要的，因為在我們本國也有同樣的科學騙子，也因為這裏也有很多潛在偏見，足供這輩科學騙子火上添油，煽動社會危險活動。如果希特勒的「種族」毒害了我們的心靈，那末雖然我們已經在軍事上打倒了希特勒，我們依舊遭受着心理上悲慘的敗績。

華萊士一度提到一個從沒有進行過的試驗，其實只要想像一下也就可以澄清全部事情。假定我們領得十萬個剛生的貧家子，同時由富庶之家領來十萬個新生兒，給他們以同樣的食物，居屋，教育與文化機會，誰能說他們在平均上不具有智力上與精神上相同的特點？通常收養貧兒或私生子給與同樣的待遇，也就是小規模而不完全的試驗。被收養的這種兒童自然不會顯示比收養人家子弟有什麼較好或較壞的現象的。

我們還可以進一步探討。如果十萬個猶太嬰兒，十萬個印度嬰兒，十萬個黑人嬰兒，十萬個中國嬰兒與十萬個英國或德國嬰兒在同一情況之下扶養，在科學上，我們沒有理由認為他們的天才在平均上會

有什麼差別。因為這種試驗從沒有試驗過，我們不能認為絕對，但是根據我們可能完成的最好的觀察，那末我們倒很可能發現在一個羣體裏面的差異比各個羣體之間的差異更大。

到目前為止，在動植物的培養中迄無事態可以證明如下的思想，即每種機構的複雜特性與眼睛，皮膚或頭髮等表面上的特點有什麼關係。沒有一個人能從牛毛的顏色或口部有多長，斷定它能產多少牛奶，或它出產的牛油的成份有多少。同樣也沒有人能從一個人的頭髮，或它的缺少頭髮，從他眼睛的顏色，或從他鼻的長度與輪廓斷定一個人的思想多少，而其中有多少是有價值的。

如果一個獨裁者決心要產生一個人人碧眼黃髮，身高六呎的國家，那末給予時間與馴良的人民，他也許可能成功，可是他們中間是否會有些是智力薄弱的人，他就毫無把握。事實顯然，人的是否碧眼黃髮與智愚一無關係，要不然德國的碧眼黃髮者就不該受矮小的奧地利褐色皮膚者希特勒所欺騙，束縛與領導的了。

我們的工作並非在驅逐揚言操縱遺傳因子以求改進的科學騙子與神出鬼沒者。我們的工作是在創造一種社會，使我們個個人的潛力能得有機會為大眾福利而發展與有所貢獻。

充分就業就是公平就業

這意思也就是說對我們全體人民應有公平就業的辦法。

首先，我們應有良好的商業觀。按黑人的情形來說，我們會使他在經濟上永遠處於奴隸的地位。他

一向是僱用在後，而開除在先。我們會迫他居室不合衛生，房租奇貴，而棧價也過度高昂。我們爲他安排了生活境况，致令最易遭受疾病，社會問題，不穩家庭境况，暴行與犯罪等等的困難。我們使他的生活較我們其餘任何人艱困，而且還責備他對於我們強予的境况產生的自然反響。我們同時還半責備半憐惜地說，他的情形不配改善，令我們維持這種不公平的是他自己。

我們果真能擺脫精神麻木與僞善，也該承認這種情形在經濟上是不公平的。

這種情勢的結果是我們使十分之一的人民陷於貧困，因而不能爲我們的貨品供給適當的市場。我們一面這樣做，一面又實行種種糾正的措施與制度，爲社會增加了額外的費用，而事實是我們必須支持這些經濟上被壓制的公民。

因此，當我們談到公平就業辦法時，並非要求一個行善的政府袒助黑人或其他任何人。我們建議的是糾正我們社會結構上破費我們金錢的錯誤。有些人沉迷於「種族」的謬論，根本不了解平常的商業事實與數字，但是他們的偏見實在是衆人費錢的一種負擔。他們是在減削我們的國民購買力，而同時開創較高的公共開支。一旦黑人收入足以在正常市場內購貨，獲得適當的居室，以及免於由於擁擠與教育不足而引起的疾病與社會弊害的適當保障的話，我們全社會的境况一定更爲順適。

就業上的歧視其惡果不僅發生於現款交易上。因爲當我們把一部分人民排斥於正常的就業場合之外，也就是使這一方面的就業損失了新穎與創造的思想。猶太人，義大利人與希臘人中有才略者的比例與其他人群同。我們對他們抱了不利的偏見時，也就是妨害了他們的才智供獻與公衆。我們阻斷了世界

上最寶貴的一種補給——新思想的補給。

不錯，有不少猶太人與義大利人表現了才能，希望與雄圖因而成了博士，可是由於大學與自由職業方面實行限額制，使另一些人不能做他們真正要做的事情，被迫從事於並非合適的業務。誰能估計一下這種人才的浪費所造成的社會損失嗎？

凡是具有同樣障礙的每一個工商機關都發生着類似的人的浪費。

大多數保守集團，例如醫業與保險公司等，都熱烈談論「自由企業」的需要，而實際上他們就是妨礙各種人民自由參與他們這種行業的一派人，這種情形實在令人啼笑皆非。他們稱呼華萊士為商業門外漢，可是他們又要求容許他們這些行業加入鄉村俱樂部。

充分就業的計劃要求打破所有以「種族」與「膚色」為根據的歧視，以便所有人羣能平等參與支持國民購買力，而所有個人才智都能按他們最適宜的方法貢獻於大眾福利。

免於恐懼的自由

這問題還有另一方面。我們愈接近充分就業與經濟安全，就愈少人羣的偏見。人羣公然的仇視與社會、經濟等安全直接構成比例。

它的作用是這樣的：

人性的構成部分之一是仇視外人的心理，即排他心。我們對於「我們自己人」總比對別人熟悉。對

陌生人就摸不清楚了。我們照例對他們心存懷疑。我們的世界被分成「我們」以及其餘「非我們」兩部分，歷來有希臘人與野蠻人，猶太人與異教徒，美國人與劣等人的區別。這種情形遍載於我們全部歷史，由於它是我們構成的一部分，我們也任其存在。

不寧惟是，我們還認為「我們」比其他任何人良好，敏慧與開明。可是這裏也還有一個怪癖。我們總以為別人比我們有組織。按我們判斷，我們的人羣並不一致，而別人是始終聯合的，而且往往具有兇惡的目標。

舉例說，有大批天主教徒確信猶太人團結極密，幾乎有組織地推行着一種佔有我們的設施以及整個世界的計劃。許多猶太人則同樣確信所有天主教徒思想一致，談話一致，行動一致，像一個有機體一般地團結，他們只有一種意志，就是教會，他們只有一個目標，就是天主教統治全世界。有些基督徒抱天主教徒的思想，有些基督徒與猶太人一般見解，也有些人抱有兩種見解。任何了解猶太人或天主教人的人一定知道所有這種想法都是最無稽的幻想。任何了解人類的人也一定知道人並不因為它偶然降生於某一特殊的人羣，就具有特性與好戰性。

不過事實是一個人羣的成員照例具有懷疑與不信任另一人羣成員的趨勢。

在一個有組織的社會裏，只要沒有人怕懼時，這種趨勢不會抬頭。可是，一有了些微的恐懼，它就會燃起猜疑之錄。

當人們感到不安時，他們不會譴責自己。他們感覺一定有人暗殺着他們。他們找尋可予譴責的人。

通常他們把另一個人羣作為犧牲的替罪羊。

希特勒決沒有告訴德國人，他們的恥辱是咎由自取。他也決不倒一座幾乎不能超越的驕傲之牆。但是他煽惑德國人，他們是在凡爾賽時民主國家陰謀的犧牲者，而這種陰謀的首腦與陣營就是猶太人；他這樣做是輕而易舉的。

他只提出一種呼籲，形成為國家的政策，而這種呼籲不論是在美國或其他國家都已一再證明其有效。美國每當全國經濟不安時，有過如同「美國清教徒協會」一類的反天主教運動，三K黨一類的反少數民族運動，此外還有特別顯著的反猶太運動。

這種運動的所以出現是因為恐慌，——不安的另一個名詞——一定要以某物或某人作為譴責或怨恨的對象。它產生出妖魔鬼怪之類的奇談，爆發成羣衆暴行。補救之法只有一個，就是安全。

不錯，教育可以增進人羣之間的諒解，可是有禮貌的解釋決不足以阻止一個尋覓犧牲者的受驚的人。教育是對理性的一種呼籲，但是恐懼抑止了理性的作用。它對一個安定的局面能起增進的作用，可是決不能安定一個不安的局面。

我們從沒有設法完全消除排他心理，可是我們可以創造一種情勢，使排他心理不致公開爆發。要使反猶，反天主教，反黑人，以及其他這種「反」的活動悉歸控制，方法是安定我們的社會生活，使每一個人獲有工作，康健與自由的充分保障。

對於奸雄的權力我們無須畏懼，所怕的是我們創造了好雄得勢的條件。柯林斯神父號稱有一千六百

萬聽衆，但是我們撇開他言詞的迷人腔調，認識到聽衆是被經濟蕭條所送來，那麼對於他也就瞭解得更清楚了。他是在對一個驚恐中的國家說教。他的話所以有力量是因為我們創造了使它們發生力量的條件。郎呼伊(Huey Long)也計算得對我們當代自由制度具有最大的潛在威脅的人，他的得勢也由於同一類聽衆的信從。這次大戰之後，我們如果仍舊回復到經濟不安定的局面，那末這輩聽衆勢將由於懂得訓練與直接行動技術的幾百萬退伍軍人的支援而更加囂張。

因此六千萬個工作不僅爲使個人溫飽順適的方法，而且是保存我們自由社會的主要條件。它是担保美國國運延長的方法。

我們的榮譽之一乃是我們的差異。對於入境的人我們從不問問他的祖先如何，只求他能成爲我們自由社會一個忠誠的成員。在我們各處街道上，教堂尖塔與廟宇圓頂並肩而立。我們的語言裏融合着許多腔調。我們從各處土地前來的男女合力使一塊大陸歸於控制，我們開發沃土，變沙漠爲果園，令河流發水力，建大城市，我們從而改變了土地的面容，創立了一種新的社會；因爲每一個人把他在基督教會，天主教堂與猶太教會以及實驗室，圖書館中得來的真理帶來，而且各種思想的騷亂終於開創了新文化，它吸收了每一個，而並沒有控制一個，我們的差異並沒有形成我們之間的障礙，相反而相得益彰，我們因而擁有了自從文藝復興以來世界從未見過的哲學與宗教的交流合肥。

我們當前的工作是確保我們繼續擁有這樣一個國家，從而使我們的自由文化發榮滋長。我們必須注意到苗床。充分就業是我們栽培健全發育的一法。

第十章 反經濟孤立主義

公平交易不是搶掠

當華萊士於一九四五年一月廿五日蒞席參議院商業委員會時，曾向參議員們解釋他爲什麼脫離共和黨。這是因爲他認爲該黨奉行的國際貿易政策將使我們的進出口無法平衡。他說，這政策將使我們的經濟崩潰，使我們的工人失業。

我們要賣貨與別國，別國要買，都是事實。可是它們必須償付貨款。它們從那裏來的錢呢？辦法只有一個，它們得賣出它們的貨，而且必須售貨足供支付他們要向我們購買的東西。我們擁有他們所需要的東西。它們也擁有我們所需要的東西。如果我們能互通有無，也就可以互相做買賣了。

這事情說起來很簡單，可是我們並沒有這樣做也有過了好幾個時期。我們以爲我們可以一直向別的国家賣貨，而不向他們買貨。我們要求貨品全由我們向他們那面流，金錢全由他們向我們這面流。

其結果是他們用盡了他們的餘錢，化完了我們可予的信用借款，他們終於停止了向我們的購買。這也就是向外國市場輸出棉麥的農場喪失了主顧，供給國外製成品的工廠必須關門而解僱工人。通常我們銷售與別國的貨物約合產品十分之一，因此當別國停止購買時，我們十分之一的農田與工人就只有停工

了。推而論之，過去一百個買貨的美國人，只剩下九十個了。國內購買力減少十分之一，也就是說供給國內市場的農場與工廠又遭逢了跌價與失業增多的境况。當這種情況發生時，我們也就進入了一個失業與需求減少的新階段。螺旋綫逐漸下降，終至沉淪於經濟蕭條。

上面這番情形我說的很簡單，只提到了終必發生的情勢，並沒有陪襯以其他加速或阻滯其最後崩潰的因素，但是事實的本質我已經大體說到。我們不能向國外賣出我們的貨品，就不能維持美國的繁榮。同時除非其他國家有購買的財力，我們也就不能銷貨於國外。如果我們關稅壁壘高築，因而他們無法以貨物銷售給我們，我們實在是抵和我們貿易的顧主。這種不科學的關稅，不但不保護我們，而且是在使我們窮困。

華萊士在任商務部長後第一次記者招待會中，曾闡明他對於這問題的觀點。他說當前需要一個廣泛的教育運動，以便向人民解釋「不打算別國如何償付的辦法而推出大量輸出品」的思想「一定行不通。按他的說法這做法「正像你一隻手在把一個人推開，而另一隻手要把他拉攏來。」

華萊士抱持這種見解為時已歷二十年。他曾經這麼說「有些自稱的「現實主義者」在散播謠言以驚嚇美國人民，說有些「錯亂的理想主義者」在送掉我們的產品，其實他們有些人的政策已使我們在這二十年來拋棄了幾十萬萬元的物品。他們的高額關稅妨礙了以我們的過剩貨品去交換需要的貨品。結果我們以過剩貨品換得了價值非常可憐的債券。戰後幾年之內我們的過剩物品數量將空前巨大。我們果能以過剩貨品換取貨品，換取和平以及所謂落後民族生活水準的提高，那末我們不但人道而且也真正够精

明。我們這樣做法，收穫當遠比實行什麼冒充十足美國辦法的高關稅，強取豪奪，孤立主義的政策要大得多。」

華萊士又說：「當一個債權國一面提高了關稅，要別國償債，一面又拒絕它們以貨品償付，其結果是產生了一種苦惱，因而遲早引發了貿易戰以至於流血。」

華萊士會要求我們認識，我們建立和平的努力一面必須尊重保證，並維持我們邦交於合法，一面還必須進一步建立一種條件，使人類生活因而昌盛，世界的創傷得以療愈。我們要使病中的世界恢復健康不容局部地去看它，必須把它看成整個。戰爭與政治不安是病象，我們真正的病是在根本上。

我們所要處理的根本問題並非疆界以及主權技術性的定義，而是飢餓與活命可能性的問題。我們主要的任務是援救文化。我們診療它究竟失敗或是成功，其影響是共同的，國家無分貧富大小。如果我們的文化死亡，我們誰也活不了。誰也單獨救不了它。它需要我們全體一致行動，這決不是一種出於幻想的要求，因為我們要為我們自己利益打算，誰也沒有別的辦法。我們每一個人的健康與生存都是以否能建立與維持一個人人能活命與發展的世界秩序為條件。所以問題是如何自我保存。

希特勒與日本的打倒，病只治了一半。主要的手術該是割去那些具有毀滅我們文明社會危險的毒瘤。但是即使手術順利完畢，世界依然有病，在重新恢復健康以前，不能稱為完全勝利。和平時期的政策必須完成大戰中贏得的勝利。

這種政策的根本原則應該是我們設法使世界潛在的富源成為真正的財富與較高的生活水準。

七個步驟

華萊士曾經列舉任何完成這個任務所不容忽視的七個「基本事實」。它是如此基本，而合在一起又如此包羅萬象，我們在提出時必須儘可能予以明白的解釋。華萊士又一度提出了一些探討性的問題，這些問題在我們獲得開明的答案以前必須提出。

首先，我們必須承認獲取原料以及一種經濟規劃的需要，以免全世界原料生產者的收入遭逢類似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的激烈波動。

第二、我們必須規劃我們的國際經濟關係，庶幾為各國所能生產的各種貨物都有市場。

第三、關稅與其他進口障礙的再檢查與修正，俾令不致妨礙世界貿易的流通，因為世界貿易正是健全的世界經濟的血液循環。

第四、我們必須重訂使用黃金作為國家貨幣基準的辦法，以防止在國際競爭中發生貨幣操縱，並維持國際貿易平衡的方法。在一方面，黃金本位失之過嚴。在另一方面，毫無控制的貨幣會發生傾瀉似的通貨膨脹或猶同納粹所狂發的那種金錢。我們的問題是獲得真正寶貴的方法。

第五、我們需要一個信用借款的有效機構，以刺激國際貿易以及足令落後國家開發其資源提高其生活水準，因而積極參與世界商業的種種國內的發展。

第六、除了黃金本位以外，我們必須還有以貨物與服務穩定世界貨幣的辦法。這也就是說，金錢不

應僅令與一種商品——黃金關聯，而須與真正財富的全面平衡關聯。

第七、華萊士認為最重要的一項，即我們必須承認相互貿易時各該國購買力的重要性，因各國國內充分就業足以增大與其他國家的貿易。

這些步驟的好些因素已被布里敦森林世界銀行與世界貨幣基金所承認，但是這個方案還必須得到活躍的世界貿易的支持與貿易設計的補充。

此外唯一的條件是我們必須放遠我們的眼光，照顧到所有這些遠景。如果恐懼制止了我們的想像，我們將流於懈怠，而且由於二次大戰比前次大戰尤為凶險，大戰以後無所行動所引起的迷茫尤為嚴重。它將產生經濟崩潰，而經濟崩潰又產生它獨特的後嗣叛亂，革命，奸雄統治以及民主的停滯。我們如果能勇敢地行動，那末我們具有智識與機會，足以為史所未見的發展的新紀元規劃世界資源。我們思想的解放將產生人類經濟與社會的解放。

山姆大叔呢，夏洛克大叔呢？

我們不能因成爲經濟上的孤立主義者而繁榮，其情形正同我們不能因成爲政治的孤立主義者而安然獨存。

如果我們要贏取和平，那末上面這一點是我們應該記住的第一個原則。我們已經看到大戰爲希臘，義大利，南斯拉夫與法國遺留的種種騷亂的勢力。誰如果看不到在若干國家困苦中所存在的潛伏的世界

性騷動，他一定是個瞎子。當我們建議美國採行防止那種騷動的政策，並從而防止我們本國捲入於災禍，用意固非僅僅爲了美國直接的利益。

在經濟方面，它說明着兩點真理。華萊士曾說過：「我們決不容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和平迫使戰敗國使用貨幣管制，高關稅與雙方貿易協定等方法從事經濟戰。」華氏又說：「同時戰勝國家也不應從事經濟戰。」

工農當然要求他們在戰後世界中獲得工作與安全。如果和平真能擴展世界經濟，他們應該如願以償。美國爲協助建立這種和平必須制止所有內部企圖剝削其他人民的壓力，因爲這種榨取雖然能令我們一時得利，但是它使別的一些國家貧困，迫它們絕望，因而阻斷了我們對於貿易的關係，最後在我們國內也發生了貧困，不安與社會紛亂。

同時，有些團體反對任何國際經濟合作，其理由是提倡國際貿易的是令本國爲全世界當瘟生，捨完我們的一切，而自己一點也不剩。對於這輩人發生的壓力我們也必須加以制止。這些人會一度大事譏笑「幻想者」與「設計家」。由於他們太忙於作這種嘲笑，他們決無暇認清事實，即美國工人的吃飯這一種不悅目的事實。

當胡佛任總統時，國會通過了史摩特——霍萊 (Smoot-Hawley) 關稅法案，形成了我們歷史的最高點。當時有一大羣具有代表性的經濟家會送胡佛一份意見書，陳述這種關稅如何支解世界貿易而終必陷我人於經濟蕭條。這是一個經過科學考慮擬成的文件，係由若干經濟專家所起草與贊同。它要求胡佛勿

簽署這個法案。胡佛的商業顧問們輕視它，而胡佛本人拒不接受。他終於簽署了法案。其結果如何業已成爲歷史。事情終於不出經濟家們的料想，而我們陷於巨大的經濟蕭條中，工廠關門，銀行動搖，而最壞的是美國男女老幼食不飽，居無室。

今天反對所有旨在促進世界貿易交流政策的也就是當年勸令胡佛簽署那禍國殃民措施的人們。他們沒有記取任何教訓，也決不忘情於一切舊打算。他們至今沒有明瞭下述的明顯事實，即一個債主如果囤積借款，其結果除災禍外無他；如果他能在別處作聰明的投資，那就收益無窮。

這些人的所以如此頑固的內在原因是不難發見的。這些人考慮商業，其度量決不大於眼前的私利。他們決不關心經濟政策寬廣的意義。他們所永遠注意的是他們能掙多少，此外無他。他們自然永遠不會自問究竟他們所行的辦法是否能爲工人子弟的麵包增加一點果醬，他們衡斷任何決定的唯一標準是利潤可有幾成。如果他們是在國際間做買賣，那末他們既不問對本國是否有利，也不問對和平是否有貢獻，他們只問這一個國際買賣在他們個別公司究竟能得多少紅利。

我曾經出席過美國最大公司之一的一次股東年會，公司表示會與德國法賓公司瓜分世界市場，以便兩者共同控制物價並分配他們特殊的產品。有些小股東會提到這事情的愛國心與社會慣例問題。結果公司的職員回答說，他們所關心的就是賺錢而已。辯論中有一個股東最後結束的言論成了當天的定論，他說：「我們不是已經賺了錢嗎？其他還管它什麼？」

怎樣制服卡迭爾？

分屬幾國的若干公司聯合控制物價的一種協議就是所謂卡迭爾。這些公司頗具權勢，因為它們的財富足以使國內的競爭者遵命辦理，它們既聯合起來防止自己中間競爭，又防止國際間崛起的其他競爭者，它們的力量也就加倍增大。它們故意減少供應，以便增高物價。它們交換關於新發明的情報，以便利用專利法律保護它們的生產程序並反對省時省工的改革。它們既有相互的諒解，即在政治上互相保護，並儘力控制國際間的經濟關係。

這種卡迭爾因匱乏與政府的胆小而昌盛。它們反對對外貿易的每一擴展行動，因為對外貿易的擴張將影響到它們的政策與價值。它們反對任何國際間的強固聯合，因為它究竟比它們公司間的聯合更為有力。它們操縱國際市場猶同一些看不見的王國，而它們的動機永遠是金元，而決不會是人類福祉。

這些卡迭爾的故事正是我們當代最卑鄙與勢利的醜事。大戰期間美國公司會自行約束在南美不與德國公司競爭，因而我們既不能與南美各國做買賣，美國政府企圖更接近它們的努力終於頗受挫折。德國商務與德國宣傳却瀰漫於整個拉丁美洲。卡迭爾實在是納粹使若干國家供其蹂躪的主要武器。

但願我們任何人不忘記這一點經驗。由於卡迭爾是戰爭的媒介，戰爭關係我們每一個人，卡迭爾正是我們每一個人的事情。它們是按國際比例安排的集中的貪慾。

同時它們不僅是戰爭的煽動者，而且是我們日常生活平衡的擾亂者，因此我們每個人都受到它們的

影響。它們影響着農民，因為它們的存在就是製造與加工產品的價格增高，而這些產品是農民們需要購買的。它們影響着工人因為它們意味着較高的生活費用與較少的工作機會。它們影響着小商人，因為它們控制生產與市場，因而使他遭遇不公平的競爭。它們正是少數人犧牲多數人以獲利的大好工具。

華萊士曾建議一個四重性的方案，使卡迭爾歸於控制。

「一、凡有關美國公司或其補助機構與影響我們國家經濟政策的所有國際協定，必須呈報政府。但這麼做並不能免於根據反卡迭爾法律的起訴。

「二、國內的獨占必須消滅。如果健全的競爭能存在，卡迭爾也就不能組成。

「三、互惠貿易協定法案的修正案允准反卡迭爾的行動，應使它成爲我們國策的重要部分。

「四、中小企業應有獲得技術進步的機會，以維持有力的競爭。今天這些企業主無法從事研究，因為他們資金不足，不能建立並設置合適的實驗室。政府應一視同仁，爲大小企業舉辦研究。這政策將打破卡迭爾對於技術的獨佔，並供給公共衛生與軍事安全等試驗與發展的設備，因為公共衛生與軍事安全兩者往往不在私人實驗室研究範圍之內。」

這四項建議還需要從事經濟互助以擴展世界經濟的各國充分合作輔助，因為卡迭爾是在匱乏中興隆起來。原料，生產力，運輸設備與世界潛在市場的調查業已由我們的國務院負責擔任。同時衡量的標準與技術也已有長足發展。聯合國大會自應成立經濟機構，與過去國聯勞工局調查勞工狀況一樣去從事世界經濟的調查。我們應該根據這種調查的結果發展一種安全與穩健政策，以資平衡與發展世界貿易，

並以提高落後國家的生產力與生活水準爲目標。

我們一旦認清了這種國際政策能保障我們的繁榮與充分就業，自然不應趨起不前，相反應以世界最富與最高度工業國的地位，挺身領導。

第十一章 充分就業的象徵

華萊士的政敵們把他作爲戰後充分就業的象徵，殊爲不智。他的朋友們正求之而不得。華萊士雖竭力使他個人從屬於政策，可是依然成爲一個最引起爭論的人物，這一點正是他政治生涯中出於意料之外的一點。他自己固虛懷若谷，但公衆對他的想像遠高於他的自估。他的言論精闢而代表大衆，大衆如屬能幹，一定要說他所說的話。他們的心意與華萊士的思想正相一致，因此他發言並不是一個人的聲音，而是許多人的聲音。他是在爲平民說話。他顯然不僅是個個人，而是一種運動的象徵，這運動爲好些方面所不了解，而有些還感到恐懼。他們恐懼的不是他的失敗，而是他的成功。

這些情形足以說明華萊士周圍爲什麼每多風波。但是風波後面真正的問題很容易被蒙蔽。這問題不是共產主義。華萊士確像當代一般賢明的學者，研究過馬克斯的學說，並頗爲馬克斯對於社會結構的分析所影響，這情形也正同每一個深思的人一樣；但是他並不是一個馬克斯主義者。他曾密切研究俄羅斯卅年來的歷史，其用心之專也猶同蘇聯參與這一次決定性革命及其後來的社會試驗的每一要人，蘇聯這一次革命與試驗會改變了將近兩萬萬人口的生活情況。但是他並沒有被它弄得頭昏目眩，因而不能以產生革命的真實情勢以及革命所改善的情勢去估計這一次革命。

他從沒有把俄羅斯與美國混雜起來，也沒有把俄羅斯的社會類型與美國的社會類型混為一談。因此他雖然爲了列甯與史達林他們本國的成就而歸功於他們，他可從來不是列甯主義者或史達林主義者。我們某一張都市報紙曾說華萊士充分就業方案的思想導源於蘇維埃聯邦憲法第一一八條。這種對於他思想來源的說法完全是胡說。

他生長於農業地帶，那時大部分農人都把田產作了永久的抵押。每隔三五年，他們可能有一次歉收，銀行就割去了抵押品的取贖權。於是他們又得商押另一部分田地。他們的一生就是一場對重利盤剝無盡止的苦鬥，並始終抱有喪失胼足所積蓄的產業的恐懼。農民的所以掀起持續對美國東部金融勢力的暴動，其根源在此，過去像「人民黨」這類的運動，與布拉恩 (William Jennings Bryan) 與拉福萊特 (Robert LaFollete) 的政見，全都是表示着農民們的意向。我們已經知道華萊士自己的祖父就是抗議不利於農民的金融資本的發言人。

凡是熟悉華萊士少年時同鄉們普遍的不安以及引起他們繼續騷動的人，實在已不需要解釋爲什麼華萊士最關切於安全問題的理由了。他由小而大，苦思着爲什麼生活在美洲膏壤沃土的人民生活不能免於經濟的恐懼。他這種思想的刺激決非來自克里姆林的什麼文件，而得自他自己對他在衣阿華州熟識的人民的觀察。他認爲安全問題是一個美國問題，需用美國土產的方法就地解決。

當他由衣阿華州移入更廣大的政治生活範圍時，他又發現同樣的不安全也存在於工人方面。以前他爲生於沃土的農民不能免於窮困的恐懼而憂慮，此刻他又引起一種思想：爲什麼以我們這樣神奇的生產

力，那些工人也陷於不安全的困境。後來他心裏就時常縈繞着一種思想：美國之富應該足以供給全體國民以安全了，但是事實竟並不如此。

大戰時期，華萊士看到了美國國民總收入高達二千萬萬元一年。他看到農人與工人興盛起來。這一點事實被他和以前的思想聯結起來。事實顯示美國的財富與資源足以造成充分就業。他建議我們在平時像在戰時一樣運用，從而消除籠罩着我們工農們全家的那種恐懼的幽靈。

他提出了一個明顯的問題：我們能否在戰後供給人民以充分就業？羅斯福總統於一九四四年芝加哥那次競選演說中曾保證六千萬個工作，我們能否做到？華萊士認為我們是可以的。但首先讓我們看看這問題的背景。

俾佛里琪分析英國

對於充分就業問題作過最誠實與周到的思想的是一位英國人叫俾佛里琪爵士 (Sir William Beveridge)。由於一個俾佛里琪社會安全計劃的緣故，他的名字使我們大家都很熟悉，他這計劃根據他的第一本書「社會保險與盟國服務」(Social Insurance and Allied Service)。不過他的計劃也有一大部分基本思想已闡發於他最近的著作「自由社會的充分就業」(Full Employment In Free Society)。

這是一本關於英國的書，但是它對於我們是一個直接的忠告。俾佛里琪對於英國情勢研討得至為週詳，他的書實在是工業社會進化的一份診斷書。

英國是掌握工業革命機會的第一個國家。它利用它豐富的天然資源獲得史無前例的巨額世界貿易，並由此而建立一個大帝國，並成爲一百年來這個行星上最強大的國家。

它富過，資金累積甚巨，成爲領先的債權國家。它發達過，人民的生活水準會逐漸提高。它強大過，它的海軍宣揚着七海雄風，成爲國際權力天平上最後的一個法碼。在經濟上它起過控制的作用，它的借款與市場爲其他所有國家所力爭，而金鎊是所有其他貨幣賴以比值的標準。這時期英國的稱雄在歷史上只有舉世尊敬的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可資比擬。

但是那一個英國業已過去。它權力所寄的天然財富業已消耗殆盡。兩次大戰期間，英國有五分之一的工人失業，英倫各處都籠罩在慘霧之下，這二十年會被稱爲可怖的時期。它的歷史值得每一個工業強國參考借鏡。

俾佛里琪爲那一種歷史寫下發人深思的一章。他並沒有忽視英國會是一個前法西斯主義的國家，而且至今還有這種情形；使義大利與德國陷於法西斯的因素也都在英國出現。他旨在爲別的國家屢次流於極權主義的情勢給予非極權主義的答覆。

他的探討對我們美國十分重要，因爲我們也是一個前法西斯主義的國家，具有迫令其他人民遭受極權試驗的同一基本的不安與廣泛的經濟恐慌。

我們作家中間有些人會從他們語彙中找出一些陳腔爛語，例如「經濟與政治上具有自由空氣」，「物資豐富，社會福利與人類自由的保衛等理想可在彌爾敦，洛基與史密斯等先賢的言論中找到」，以示

對俾佛里琪的言論不屑注意，並告訴我們說，如果我們「背離我們自己偉大的過去」將是一個悲劇。但是我們中間有人還記得列隊求施粥，其印象較對希臘的阿勒奧巴古斯（Areopagitica 雅典的一個小丘，為古希臘審判廳所在地）的回憶尤為新鮮。我們的青年中間也還清楚記得他們在十二三年前以前會突然遭受飢餓而普遍發生糧荒。人們該不致忘記我們今天的青年是經濟蕭條的子弟。他們幾百萬人所遭逢的窮困均為歷代美國人所從未經歷過的。

當柯林斯神父與郎霍伊等成為美國最具潛勢力的人物時，我們會瀕臨法西斯危崖的邊緣歷時多年。如果我們再不能為將來作不同的安排，這種日子勢將重復到來。

社會力量應較民族界綫寬廣，較個人巨大。俾佛里琪所談的也就是這些。他為這些所作的釋義使他的書對英美同具意義。當他在分析他本國的時候，廣言之，實在也是在分析我們。

充分就業的用費

他開始為一九一四年以前失業的事實作了個無所掩飾的檢討。他以明晰的眼力去細細探查。然後他以一位經濟學家與有經驗的行政官的資格，為自由社會寫一個充分就業的計劃，旨在保持物價系統並保持個人擇業的自由。他並不企圖想像一個可以不顧人的本質的世界。他仍然按工資，物價，工業訓練，傳統制度的鼓勵等老事項處理問題。他並不鼓吹社會主義。他繞過了資本主義社會主義的辯論，倡立一種由社會補助與支援的經濟的方案，保留資本主義主要的特點，但妥為安排與經營，俾為自由社會供給

經濟安全。他的理由是：要使一個自由國家保持其自由，必須供給我們人民以美滿生活的物質要素，從而去除革命的動力——匱乏的恐懼，這是我們唯一有把握的途徑。

他對於充分就業下的定義非常簡單：「它的意義是永遠要事浮於人，而不是人浮於事。它的意義是工作的工資公道，其性質與分佈足令失業業者從容就職，合乎常理。因此它是說，失去工作與另謀工作中的空隙為時不長。永遠事浮於人的提議是說，勞動市場該始終是個販賣者的市場，而不是一個買者的市場。」

他這個定義值得注意的一點是它允許工人由一個工作轉到另一個工作，而他承認這過程中間難免有些空隙。俾佛里琪所料想中的是一個變動的勞動市場，充分就業並不是說每個工人每天都在工作，他已把就業變化的準備時間考慮在內。

它允許就業中有季節的變化，國外市場要求所引起的變化，以及他所謂「摩擦性的失業」，即工作變換。他根據研究英國的經驗，答出任何時期，即使是在他那計劃實行期間，也一定有百分之三的工人失業。至於兩次大戰期間，英國失業業者達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二十二。

在美國，百分之三的失業也就是說一百八十萬人失業，而過去二十年間失業者在八百至一千七百萬之間。我們美國比英國大，就業上季節性的變化也大，工資標準比較高，並具有一支更無休止而流動的勞動軍。因此有時候我們的失業百分比會高到百分之五。這些數字並不驚人，而且也不是說這些人就永遠失業。我們的社會保險辦法應該從容予以照顧。

現在我們來看一看，俾佛里琪究竟有什麼辦法實現充分就業？

他開頭有這樣的對照。他說，我們已經解決了生產的問題，但是我們還沒有解決消費的問題。我們可以儘力應付所有消費問題，我們可以儘力應付全世界人民所有合理需要，但是我們還沒有辦法以確保每個人得到他所有的需要。我們在供應上並無困難。只因爲我們的要求不足以使用我們全部供應的力量，我們不少工廠與人員並無工作。

因此，他致力於如何設法使我們增加要求，——就是說，怎樣才能使我們更多人購買更多他們所需要的東西。當冬天來時，我們的裁縫工人力能爲我們每個人縫製大衣，但是我們中間有些人買不起大衣，因此裁縫們並沒有充分使用他們的功夫。我們怎樣才能保證需要大衣的人都能買一件？俾佛里琪建議一個行動計劃，以確保每一個可能的購買者有錢購買東西。

他稱呼用以維持貨品需要的金錢爲「支出」，並且說只要我們使總支出維持得相當高，它足以形成並維持一種貨品的需要，使人人有工可做。概言之，他把支出分爲兩種：一、消費，即我們直接爲購買需用物品而化費的錢，二、工廠及機件方面的投資，即真正而積極地運用以生產更多物品從而擴展我們經濟的投資。

他建議我們於必要時使用公款，使總支出增高。他的辦法是使需要社會化。他並不建議使工業社會化。因此他建議的制度是既不完全私人性質，也非完全公共性質。它是一種「混合經濟」。

第十二章 華萊士與政治

反對華萊士的政客

美國充分就業雖有成功希望，但要達到目的途中仍有最大的危險——政治，這裏所謂政治是指人們通常所抱粗俗的觀念而言。

不幸的是，政治也正是華萊士最弱的一點。他不是一個狡猾而不易對付的操縱者。他對於權力的把戲不感興趣。他在選擇他的顧問時並不次次聰明，而他應付對手則相當拙劣。這一點即使是最敬愛他的人也充分承認。他們對他的敬愛雖然並不因此而減少，但是我們對他計劃成功可能性作客觀的估量就必須把這點考慮在內。他並不是一位高明的政客。

這就是說，他的左右需要堅強而可靠的人，他們要能補充他的不足。米洛·潘金斯任職「經濟作戰局」時曾做到這一點。

當華萊士的商務部長任命案發生政治衝突時，這一點就顯示得很清楚。它會引起行政與立法兩當局權力的爭鬥，並且發展到憲法的問題上。

塔虎特是目前衆所公認的參院反動派的領袖。他曾根據華萊士不能得到參議院信任的理由拒絕核准

華萊士。這就引起了一個行政部分的部長究竟是總統的助手呢還是立法機構的一個代理人的問題。按塔虎特的立場就自然得出任命閣員的應該是參院，而不該是總統的結論。這顯然是一種越權。

不錯，參議員塔虎特趨於極端的觀點帶有濃厚的黨派政治色彩，但是這不過強調了華萊士一案的政治爆炸性。既然塔虎特當時爲了反對核准華萊士任命案不惜採取不合憲的立場，我們可以預料，今後爲了反對他的方案一定會採取各種政治手段。華萊士在推行他的計劃以前，一定得準備應付參院兩黨保守派最狡猾的政治把戲。

衆院對於華萊士也有與參院同樣極端的反對。共和黨人提出『喬治法案』的修正案，旨在剝取總統調遣行政機構的權力；他們胆敢着手於令人憤慨的事情，即阻止華萊士當大權，在戰爭期間削弱總統的作戰權力。有一個共和黨議員情緒緊張，力言總統的權力非加以干涉不可，他的理由是，總統可能，而且也許就委任了白勞德（Earl Browder 其時美共領導人）爲進出口銀行行長。

可是，反對華萊士的政治掮客們弄巧成拙了。他們發現同樣反對華萊士的更狡猾的政客已驚惶不已，因爲全國各處對華萊士的支持愈趨增大。人民在說，既然國會兩黨所有的反動派如此一致地恨他，華萊士一定正是我們國家所需要的。當時衆院民主黨領袖終於籲請本黨議員採取一致立場，他舉的理由之一就是如果衆院黨人一本過去的態度繼續辱罵華萊士，他們勢必使華萊士成爲一九四八年民主黨競選大總統時非提名不可的唯一候選人。因此衆院通過了喬治法案，並無修正。

參議員們回想到當年傑克遜總統提名萬布倫（Van Buren）爲駐英大使的史實。當參院於大事詆毀

之後又拒予核准時，萬布倫倒反身價十倍。因此當付表決時，其時的一位智者代表密蘇里州的班賴參議員向另一位投反對票的路易斯安納的參議員轉過身來說：「你們打倒了一個大使，却同時推荐了一位總統。」於是那位議員說，「啊呀，你爲什麼不在我投票以前告訴我呢？」

這次那位比較聰明的政客在他們爲華萊士案投票時就通告了其餘同人。因此藉助於有人爲防止他被提名爲一九四八年的總統而投的贊成票，他被參院核准爲商務部長。參議員們所收到的信裏透露，一九四四年他沒有被芝加哥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提名爲副總統候選人已使他成爲極孚時譽的英雄，而他喪失商務部長任命的危險只有使他更成爲衆望所歸的人物。參衆議員們預見到如果他們再拒予核准，因而又給他掀起一陣宣揚的風浪，正好形成一種不可抗拒的華萊士高潮。他們既是政客，兩害相權取其輕。他們甯可讓他受牽制於商務部長的工作，在商務部他們還可以控制他到相當程度，而且他必須善理政務，這就比任他成爲無何拘束的政治義士，廣事議論，以鼓動他爲一九四八年競選的擁護者爲安。

這些內幕具有重要的政治意義，因爲華萊士既入商務部任事，他就遭逢着力圖使他失敗的國會多數議員的極力反對，因此他將再無機會獲得一九四八年獲得總統提名的希望。他襄助一位總統，與總統的關係自必棘手，而且總統因此一定應付得非常圓滑。這些情形綜合起來就形成了一個暗礁四伏的海面，只有那熟練的舵手才能安然渡過。

在這種政治局面之下，民主黨在芝加哥大會裏已表現得很清楚，它是受着那些根本不了解華萊士的動向與對他不表忠忱的人們在控制。事情發展得使杜魯門總統成爲黨的領袖而領袖們還展望着一九四八

年，因此他們決不忍受華萊士所予的難堪。華萊士如果不遭受他的黨部機構公然的反對，也一定要謹防暗算。他們以前認為他們在芝加哥黨代表大會裏已經把他攆開。他重新抬頭時倒反更強大了。因此他們在打算下次再有機會的話，一定要把他攆掉。

他在商務部本身也不無困難。部裏大部分政策決定者與華氏看法不同。有些還是瓊斯舊人，其中大部係由商務部的顧問委員會保荐或核准任用。顧問委員會是由一羣有權勢的商人組成，他們雖無名望，但是對於部的政策具有巨大發言權。這委員會於一九三三年由部長羅伯（Daniel Roper）委任，充作私人顧問團，但是以後經過不少年，換過許多部長，委員們終於認為自己是一個自行持續的政策委員會，部長只是他們的行政官而已。當霍浦金斯與瓊斯在任時，這委員會確實統治着商務部。

華萊士勢必與他們往來，但他決不願從屬於他們。他們充顧問有用處，他們究竟是由部長委任的，作最後決定與負責的自然應該是他自己。委員會的委員如約翰斯敦（Eric Johnson）等可能對華氏一部分計劃表同情，有些就對他取敵視態度。他對付這輩人必須耐心與毅力兼而有之，他犯不着爲了計劃與他這些三代遺老的顧問們公開爭吵。他第一步已經公開宣佈這個委員會存在，並宣佈各委員之名作爲他的所任命者，因此使部長與委員會的真正關係公開化，使大家留個印象。

最後，在華萊士任商長所面臨的問題表上，我們必須把他與內閣其他部長的關係放上。說起來他可以得到摩根、伊克斯、魏卡德與潘金斯的支援（譯者按：摩爲其時財長，伊爲內長，魏爲農業部長，潘爲勞工部長。）郵長華爾格可能予以反對。至於國務院在過去十二年內從未稱揚過華萊士，不過新國

務卿史退丁紐斯看法當有所不同。內閣其餘諸人當在積極支持與積極反對者之間，但是，除傾向於華氏觀點的司法部長畢德爾以外，其餘都對他有所忌視，特別是陸長史汀生與海長福勒斯特爾。他們兩人目光都注視於最近將來。

除了官方以外，華萊士還遭逢着新聞，廣播以及其他公共輿論方面的人。報紙與廣播本身就是大企業，得由登廣告的其他商業的支持。報紙對華萊士與他計劃的反對至少與一九四四年大選時對羅斯福的態度成比例，而且由於像「紐約時報」這樣的報紙，雖支持羅斯福，却反對華萊士，所以情形只有更壞。這也就是說，關於他的訪問以及演說在解釋與編輯上對他不公。廣播電台的新聞報告通常以通訊社為主要來源，因此在編輯態度上與報紙大致相仿，至於新聞評論廣播由於多由具有全國性市場的商家所包定，態度也多半比較保守。在報紙與廣播上他所能得到的支持將受諸於獨立的專欄作家與廣播新聞評論家如溫契爾（Walker Winchell），庇爾遜（Drew Pearson），林德萊（Ernest K. Lindley），湯姆遜（Dorothy Thompson）與史篤克（Thomas N. Stokes）等，得諸於較小的報紙與電台，因為從這些報紙與電台還可以聽到一點小商人的聲音。

人民的支持

把所有這些不利點加在一起的確形成一種強大的反對勢力。但是他在另一方面也還存有巨大的政治

資產。

最主要也最有方的一點是人民（包括兵士與平民）信念的成長，他們相信美國生產之巨能使每一個人有工作，並獲得安全。而且他們還堅決認為這是國家應該做到的事情。戰爭之後光是和平還不够，人人應有工作。我們所怕的一件事情是貧困，我們如將資源與我們的生產力作有效而正當的規劃，我們可以制服這種恐懼。

華萊士已成為這種思想的象徵。任何時候政府的任何部分不利於這種思想時，他可以登高一呼，號召人民支援。他可以由國會，報紙或其他機構直接向人民發出呼籲，人民因而發動羣衆示威，由此而確證他是為他們在發言。

這種羣衆支持是有組織的。因為工會也是其中一部分，同時華萊士將獲得勞工報紙的無可估價的協助，勞工報紙與普通大部分報紙不同，讀者不但讀它的新聞也讀它的言論。勞工之中有「產業職工大會的政治行動委員會」，充分就業的諾言如受華盛頓或別處任何集團的威脅，該組織將引起它的力量新的激動。各種工人對這個問題比對任何其他問題更為關切，如有必要，他們會迫使他們最倔強的領袖採取政治行動。

除勞工而外，還有許多獨立選民的組織。今天控制選舉的實在是獨立的選民。過去四度競選的任何分析證明：候選人或論點能得到獨立選民的支持的一定在全國得勝。這種獨立選民約等於全部選民百分之十，都在密士失必河以東各州，麥第松綫以北，以及太平洋沿岸各州。在美國政治上，下列這種情形影響非常重要，像麻薩諸塞這樣的州可能投票選一個民主黨的總統，一個共和黨的參議員，一個民主

黨的州長與一個共和黨的補缺州長；新澤西州雖然選民主黨的總統，却選出一個共和黨的參議員；或者俄亥俄州選一個民主黨的州長與一個共和黨的參議員，或者像密西根在一次總統大選中投共和黨候選人以七千票，而下一屆大選又以相差無幾的票數擁護了民主黨人。獨立的選民的確佔着舉足輕重的地位。

現在不少州份的這些獨立選民都已組織起來，並有全國性的組織。不過它們的組織比較散漫，除非有一個運動或人物能喚起他們，它們不會很積極於行動。所以如果有人危害到他們，他們可能挺身而出，支持華萊士與充分就業。華萊士在這些集團中具有非常的威望與號召力，而這些團體可能提供一些被人們尊敬的名人，作為他為全美人民創立一種更好生活的鬥爭的有號召影響的贊助人。

同時華萊士可以號召退伍軍人及其眷屬。這些人的腦海裏的一個問題就是「戰後怎麼辦？」華萊士已致力於使他們有事可做。我們中間也還有些人認為工作的權利這一項並不能成立。可是我們可作的一個解答是：任何人會為國效命，會拋離原來的正常職業，為國作戰，返里後應該得到一種工作的權利。退伍軍人認識這一點，他們的眷屬也認識這一點。因此如果某一政治或商業團體阻擾華萊士的努力十分嚴重，那末他們一定會毅然採取行動。

因此關於華萊士所遇政治局勢的分析可歸結如下：華萊士的政治力量在華盛頓以及財富與權勢的各個中心比較弱，但是他在全國與人民之間是強大的。

這一點也就規定了他的政治策略。他一面應該以最卓越的政治心意去料理對付國會，黨與政治機構

的這一項令人神經緊張的工作，同時一面應以他追隨者的有效組織作爲補充。能够號召選票的人能使所有政客不由自主。而華萊士所有決定性的政治權力是在各界人民中間，人民是信從他以及他的計劃的。

他只要有高明而勇毅的領導，再加以忠心而積極的地方組織，那末雖有種種政客加害，他一定能擁有政治上必要的力量。

第十三章 自由與安全

「請你幫我想一想」

華萊士相信民主制度可以同時供給政治自由與經濟安全。他相信我們在憲法體制與生活方式中可以爲我們工人保證穩定的工作與收入。

他並不是一種擺架子的人，因此他開始演說或討論時，並不自視甚高，或自認爲華盛頓與林肯事業的再造者。他知道他的聽衆都是美國忠心的公民，同時他們瞭解他也是忠心的公民。

這種做法是反常的。參議員，衆議員，各式各樣的政客，甚至於報館記者通常爲了得到公衆支援，一定在每一次演說中大作效忠的宣誓，因此有人居然不作任何宣誓，他們也就非常眷戀。當他們離開會場時不禁喃喃不平，說演說人有點反叛。

他們聆聽華萊士發言，他以收成，信用貸款與收入等材料談實際的問題。他在有幾次演說中甚至抽出一部分時間來談一些他心裏想起而沒有得到解答的問題。我會經聽到他向聽衆提出問題要他們回家考慮，幫他想一想，並寫信告訴他以所得的結論。我當時看到講壇上和他在的那些那些職業政客臉上都露出大惑不解的表情。貴爲美國副總統在這裏向老百姓求教，而不是給他們以訓諭。常人總以爲由華盛頓

來的任何人竟然說「我不知道，我請你幫我想一想。」那這個人一定出了什麼問題。因此他們中間有些認爲他是個愚人，而另一些人確信這是推翻美國生活的可怕陰謀的一部分。

他並不是個預言者，並沒有迷惑聽衆的花言巧語，並不能把既不能啓示也無所鼓動的老生長談說得娓娓動聽。他並非現代的惠勃斯特 (Daniel Webster) 或布拉恩。他是我們同時代的同胞之一，我們都關懷着同一個發人深思的問題：「我們怎樣規劃美國的事務，才能保存我們的自由權，才能調整我們的財富與工業，把它們的利益傳佈給我們所有的人民？」

有些人也許會反對，說我們這國家現在需要的不是問題而是解答。但是我們不能提出適當的問題，也斷乎找不到適當的解答。一個真正智者的證明，也許是最高的證明，就是提出探討性問題的能力，因爲一旦一個問題能明確地提出，我們也就可以確信已走上了解答的途徑。當伽里略看到有枝燭臺的影子在教堂地板上轉動時，他就問起它爲什麼作圓圈形轉動？當他得到解答時，我們的宇宙也就有了。一個新的解釋，並且有了許多附帶的發明。

質疑是獲得新知的途徑。華萊士在問爲什麼在一個能爲人人供給必需品與少數奢侈品的國家裏，人民大眾還是遭逢着經濟不安全。他已開始獲得答案，他此刻正設法使我們人人一致努力，以便獲得一個完全的解答。

至於那些從未考慮過這一問題的人至今仍沉迷於以前的那種觀念，即自由與安全是勢不兩立的。他們說，安全與自由不可能兼而有之，我們要安全就不能同時有自由。

他們第一個聲勢汹汹的理由是我們從未兼而有之。他們傲然說，我們有的是一個具有自由企業的自由國家。自由競爭鼓勵具有出衆天才的人獲得大成功，而我們的生產達到空前未有的高度。他們認爲「匱乏的恐懼」是使人人工作的精神刺激。他們承認有些人在鬥爭中倒下去，可是他們指斥這些人是弱者，並宣稱甯可在我們經濟制度上有人的消耗，而不願犧牲自由。他們所謂「犧牲自由」是指政府制止無情的競爭與獨佔者對市場與金錢的不公平的操縱。他們所謂美國式的生活是商業上無政府，政府衰儘是商業勢力。他們要求什麼人也不干涉他們使別人生活不安全的權利，因爲他們認爲不安全正是自由美國人的遺產的一部分。他們的論據還說，我們從來不會有過安全，因此安全是非美國的，政府如插身進來保障安全，那就自然限制了自由。

如果強制他們這樣做的話，他們一定指爲法西斯主義，納粹主義或共產主義。他們會說，納粹主義就導源於人民安全的要求，你看他們的自由的遭遇如何？於是他們的辯論是因爲墨索里尼與希特勒都沒有以安全作爲維持自由的方法，他們自然也不能這麼做。我們擺開這兩個惡徒歷根兒沒有找什麼解決的方法不說，這種看法對於我們的創造力未免是一種輕視。自然我們無須承認我們本國不能產生較德義那些精神病的領袖更高明的智者。但是即使這些人真是天才，他們的經驗也不足以限制我們的經驗，因爲不論在內政上，精神上，物質上與國際上，他們所遭逢的經驗與我們所面對的大不相同。納粹法西斯不但決不是我們所需要的辦法，而且也不是我們行爲的標準。

可是，我們那些經濟安全的反對者多半又驚恐萬狀地將經濟安全的意見比諸共產主義。事實上，參

議員塔虎特與「紐約前鋒論壇報」都公然說過華萊士的充分就業思想得自蘇聯憲法。他們的看法似乎是共產主義可以確保充分就業，我們必須放棄民主政治也可以做到的希望，而共產主義既然公然與我們對立，我們寧願繼續不安全，決不願在共產主義這方向踏出一步。其實亨利·華萊士充分就業的思想並不得自別處，就得自美國，他與這些批評者之間的差別就是他不同意諱言共產主義為人民謀利實在比我們這種制度為人民的地方得多。

他相信在保障自由的憲法之下，私人企業，農業，勞工與政府合作，可以規劃我們的資源與財富，令六千萬工人得到永久的職業。

有人認為共產主義成為我們的威脅，這點實在毫無理由。民主政治在本質上該比任何一種專政更具有魄力與彈力。不錯，共產主義是對我們的一種挑戰，而且不論我們在思想上是多麼忌憚，我們必須應付的事實是史達林主義為馬克斯與列寧之後共產主義進化的第三階段，它在再造俄羅斯人民與使蘇聯崛起而為世界巨強之一兩事上，頗有成就。

我們對共產主義應視為生活方式之一，固無須對它的競爭心存恐懼。俄羅斯的制度已為俄羅斯人帶來了許多有利的事情，這就是共產主義在他們生活上的實證。他們要求俄羅斯的土地為他們的土地，而不致於被少數家族任意擡出境外。他們要求尊嚴，汽車與種種便利。他們熱衷於獲得曳引機，水堤與光亮的機器。這些我們都有。但是他們各民族一律平等，所有工人獲有永久的就業，這兩樣都是我們所沒有的。我們在領教過別一個國家與別一個社會制度之後，也許會相形見絀，退縮不前，但是我們在我們

自己的制度下，實在也可以擁有現在人家有而我們沒有的一切。

亨利·華萊士已開始告訴我們如何做到我們也能擁有它們。如果他成功，他決不會令我們成爲共產主義者，他會爲我們證明，民主不但可以保證經濟安全而且也給我們以自由。

我們在研討德義的情形時已說起過一次，此刻我們要再提一下，就是我們的情形與俄羅斯的情形也不相同。俄羅斯人犧牲了我們所寶貴的某些事物獲得了走向經濟安全之路，這決不能證明我們保存這些事物就無法做到經濟安全。蘇聯的事例是我們成功的一個比擬而不是我們失敗的論據。蘇聯這比擬正好幫助我們指出解決就業問題專屬必需。

工人與退伍士兵對於充分就業同深關切。如果那些金融與工業的老闆們胆敢阻礙實現這件事情，他們勢必迫使退伍軍人與工人聯合起來，爲創立工作而鬥爭。

人人有工做這個建議對於要工作的人決不陌生。它產生於我們美國人生活之中，產生於我們美國人民需要與恐懼之中。

我們能不犧牲自由而達到目的嗎？我們是否必須犧牲我們的基本自由以獲得「不虞匱乏的自由」與「免於恐懼的自由」？

我們怕自己嗎？

在這裏成問題的妖魔是政府的權力。那些認爲自由受安全威脅的人們說：「除非政府在我們生活方

面增加它的權力，我們決不能有安全。它須有權調整所有現存的商業。它必須運用信用貸款控制新企業的開辦。它將均分勞工與市場，調整農業，規劃工資與工時。每一個人將把他的商業，他的進益，公私開支仔細呈報。每一塊金元，每一個男女都必須被調度了。」按這種說法，這種權力的擴張意味着政府本身成爲一條大鱷魚，將吞沒所有個人的獨立性。

除此以外，這種見解還說，政府勢將擁有一大批公務人員以推行這種調度。這些公務員的工作就靠着維持這個掌權的政府。一個總統有了這麼些手段，他就可以無限期掌權，我們的制度也就喪失了民主的性質。

反對的見解是這麼說：安全就是政府統制，政府統制就是損失個人自由與民主制度的消亡。

對於這種反對的意見我們只消指出，政府權力即使有這樣的增長，它還在人民手上。這些人民就是美國人民，由於美國人民具有民主的經驗，這是很重要的一點考慮。在政治上我們並不像德國人那樣不成熟，也不像俄羅斯人剛從貴族政治中解放出來。我們是自由政府發展的一部分，我們的自由政府使我們從簡單的農業經濟，以及居民不過一千二百萬的十三州比較軟弱的聯邦政府變成爲複雜的工業社會與一個具有一萬三千五百萬人口與四十八州的強有力的中央政府。

我們經歷過許多危機，當我們的政治與財政機構發生根本的變革時會引起許多末日將臨的預測。我們曾經歷過一場幾乎使我們國家一分爲二的內戰。根本說來，我們這國家在立國一百六十五年以來，基本結構的變革較諸其他國家在同期內爲少。我們所以能做到這一點是因爲我們非常機動，因而我們人民

的投票就使我們的法律與政府能跟隨着社會變化。

我還記得當年辯論所得稅的情形。它曾被指為未經沖淡的社會主義與我國自由的末日。當年佔坐今天華萊士的政敵們的座位的參議員會以幾乎類似的言詞辱罵所得稅。如果參議院的牆壁有耳朵的話，那末它的沒有嘴巴真是憾事，因為只要它去背背歷次新建議提出時一再聽到的老調，也就可以省却參議員們許多力氣。

我們終於度過了一再被預言的災難，同時在過程中間我們學會了民主的巧妙。這也就是我們可以應付目前的配備。我們也許須有比以前更強有力的政府，但是我們知道怎樣去控制它。

至於某一個政權將永久把持的說法，我願意指出上次的大選。羅斯福當政已歷時十二年。如所公認，他是我們歷來最有成就的政治人物。他對於黨的機構具有充分控制，他部下的公務人員數以百萬計。除此以外，他是我們所參與的最大一次對外戰爭時期的總統，在通常大選中，大戰一定是個巨大的優勢。但是他的得勝只多得三百五十萬票。這一個接近的比數足以推翻下述看法，即總統所掌巨大的聯邦權力將保證他繼續當權。

關於這問題還有另一方面，我們說到政府並非單指總統個人。我們政府的權力分佈於聯邦政府的立法，司法，行政三部門以及四十八個州份。

國會控制着錢袋帶，因此它可以決定某一機關或某一批機關工作的期限。它有權調查所有各部會，因此可以制止權力的拙劣使用。

即使是對歷史並無研究的人也一定知道國會是時常採取反對政策的方針的。它們之間權力的分散與國會對總統權力繼續的遏制，實在是防止我們政府機構遠離人民控制的有效因素。

當華萊士任商務部長的權限問題在國會討論時會引起辯論，這一點本無積極的意義，但是確實是國會可以確定與限制政府某一人員的職權的事例，而且因此提供了一個保證——即使我們必須建立若干確保就業的機構，它們的控制也並不限於政府那一個部門。這種遏制與平衡有時是惱人的，但是它足以防止權力集中於任何個人或集團之手。它們在我們憲法上已有明文規定，它們使我們選民始終是我們制度的最高主人翁。

本書未便從長討論我們憲法的保證。它們分別存在於法院核准立法與行政法案的權力，定期選舉的建立，地方政府處理地方性事務的權限，以及權利法案等。我所要指出的一點是我們這個複雜而規劃妥善的政府制度供給着我們需要的保障，足以防止給我們以安全而剝奪我們自由的措施。

亨利·華萊士是建議着在我們現有政府的範圍內按排，授權並經營的經濟安全計劃。他並不迫我們取安全而捨自由，或取自由而捨安全。他是提供着一個兼有安全與自由的計劃。

第十四章 兩個世界

人第一還是金元第一？

我們大家都已公認這個行星已是威爾基所謂「天下一家」。三十年中間兩次世界大戰已顯示地球上沒有一處是與別處隔離的。十二年以前北平盧溝橋邊的一下鎗聲會喧擾到我們窗邊，並領走了我們爐邊的子弟。空間距離業已超越，整個世界已形成一個地域。美國的轟炸機到印度與中國為時不消三天。我們因為知道了這一點，所以策劃了一個國際組織。

可是在我們一個世界裏面，有巨大的社會力量運用着，——有些該為大戰担負一部分責任，有些受着大戰的影響而加速着運動，有些是大戰所產生的。它們迫使每一個人去重新檢查他們社會的結構。所有社會，經濟與政治思想都在變。在美國的我們感覺着社會變革的力量，它使我們對未來的看法截然分成兩派思想。這些思想派別分歧極甚，在世界這前提問題上也就一個發言人說一種世界，另一個人談另一種世界。在我們美國就有互相抨擊的兩個世界。

雙方都信奉自由制度，主張有兩個或兩個以上的黨派，採行秘密投票，並維持私人企業。但是他們對於目的的見解分歧。這種分歧可以歸納於一個問題——人第一還是金元第一？

對這問題有所抉擇的不是筆者。也不是華萊士，而是林肯。在林肯就任總統不久以前，他說過他對人與金元兩者都支持，但是在發生衝突時，他先支持人然後再問金元。他認為人的權利較諸財富的權利尤為寶貴。這問題在他的時期以下述一種形式出現，即關於奴隸問題的鬥爭。到我們現在，又換了一個形式。但是它始終是自由社會需予處理的永遠一再出現的問題，特別是當它由一個階段發展到另一個階段的時候。我們決不能躲避它。我們要不站在這一邊，就得站在那一邊。而這種歸屬也就是我們今天國內明顯的政治分裂。

我們要選擇的是：究竟是每一個人享受民主政治呢，還是少數人享受特別機會與特權？我們有豐富的資源，是否資源該集中在少數人手裏，由他們不顧別人只為自己去利用呢，還是善予經營，為我們全體人民供給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機會？

我們的財富究竟是按個人幻想去處置的私人特權呢，還是社會革新以保證人人經濟安全為開始的一種工具？我們政府的存在究竟主要是為維護財產呢還是為促進大眾福利？按憲法上大眾福利的條文，政府能如何為社會目的去釐定私人企業？

從「聯邦主義者」時代一直到現在，這些問題一向是在辯論中，最高法院歷來為全國性法律所作幾個決定就是以這些問題為背景。三十年代與四十年代最高法院法官荷爾姆斯與布蘭狄斯之間著名的意見衝突就起源於法院同人對於這些問題的分歧。目前最高法院的新精神形成了如下的事實，即目前的法官中大多數比他們的前任對大眾福利更為關心。

當年羅斯福與老最高法院（我們必須記得，那個自己倒行逆施的法院是羅斯福委派新法官以前的法院）之間的鬥爭也就是令今天國內輿論分裂的兩種基本異議的憲法上的爭鬥。後來自由主義的主張在法院內佔了優勢。

可是在一九四五年中，政府的行政與立法部門之間還存有更大的鬥爭。它也存在政黨與行政各部門內。我們的黨派由於歷史與其他的理由，並不與我們最深刻的政治分歧的現實配合。我們法典上大部分社會立法應歸功於民主黨，但這點與其說是政黨路線的結果，無寧說是威爾遜與羅斯福有力的領導的結果。國會內若干最激烈的反動份子就揭着民主黨的招牌，「新共和」雜誌會稱他們為「穿着內戰時期南方聯邦同盟派制服的共和黨人」。共和黨主要是代表大企業與保守主義的黨，但是國會內也有些最開明的議員屬於共和黨的陣營。自由主義者與保守主義者如果有個截然的黨派劃分，我們大家一定更為愉快；但是由於我們各黨派各級機構的力量在州與地方委員會，而這些機構對於全國性的政策並不反映嚴格的黨性分歧，因此黨派開明與保守勢力的澄清目前還沒有希望。

自由主義者與保守派

我們對於開明與保守的了解如何？分辨的辦法極多。

我們的社會像自然一樣，始終有兩種決定力量在運用——惰性與運動，或者換句話說，靜止與變化。社會上有一種人深切關心於事物的價值，而另一些人同樣深切地關心着事物的罪害與矛盾。前一派

人拒絕變化，後一派人歡迎變化。前一派人在性質上保守，他們「習於現有的弊病，而不願傾向另一批自己所不熟悉的事物」。後一派人先天地開明，永遠爲遠景所鼓舞，他們會「擎起武器奔向困難之海，與困難搏鬥，從而消滅它。」

這種氣質上的變異可由於經濟與社會利益的變異而加強。於是有些人要事物不變，以便保留特權與安樂。另一些人在變革中得到經濟與社會的利益。前者自然傾向保守主義，而後者採取了自由主義。

一般說，保守派回顧過去，他眷戀商業沒有干涉，沒有集體談判的煩悶，沒有左一堆政府公文，右一大批所得稅的時代。他對於過去這種好日子生着懷念病，而且積怨成怒，遷怒於所有使這好日子離開的個人與黨派。當年一塊錢值一塊錢。你做工或投資賺到的錢就是你的。你用不着對錢有一番理論，人們因爲你有錢讚揚你，決不像現在那樣因爲你有錢就懷疑你。你知道你在社會中站立的位置。你在需用工人時僱用，當工作遲緩時你就開除。你在你自己的業務機關內是主人，你用不着担心官員會把鼻子湊在你帳冊上是否會發脾氣。

極端的保守派也就是反動份子，企圖掃除所有十幾年來的社會立法，回復前羅斯福時代商業的弊法。這些人的代言人就是胡佛，他在一九四四年共和黨代表大會席上發表過這種觀點。

比較溫和的保守派現在已接受社會立法的原则，但是要求加以節制。他們的思想是不得已時才對改變中的需要與輿論讓步，僅此而已。而且還不是這麼個說法。他們的說法是社會立法應予有效推行，那就是說，由他們去推行。這也就是卅年來英國保守派最先採取的路綫。英國保守派以後掌握了政權，

他們就減少社會福利，減至足以防止公憤爆發的程度。以後英國的困境終於改變了這種情形，可是我們的保守派現在採取了廿年以前英國保守派的立場。他們可能接受已經完成的變革，但堅持着反對更多變革的方針。這也就是杜威州長這種人的立場，他正是保守陣營裏的中堅。

保守派回顧過去，自由主義者瞻望將來。他相信我們現在的制度爲我們一部分同胞製造着不必要的困苦與損害，並且認爲只要認真思考，我們有辦法規劃財富，使人人獲得安全而無須喪失自由。他對於人的理性有信心，對人民有信心，對於控制下的變革有信心。他充分了解文化的成就，但是他把它們看成對新努力的刺激，而不作爲停滯的藉口。他說：「如果我們能做到如此程度，我們沒有理由解釋爲什麼不能做得更好。」

變革的極端的創導者就是過激派，他們要把過去一股腦兒拋掉，開創一個全新的秩序。他們說過去的根本是錯誤的。因此他們要根除我們的制度，另外創造新的。白勞德是近似這種觀點的顯要的發言人。他主張的變革也就是革命了。

自由主義者並非革命者。他們預見由今天的制度蛻化的明天的制度。他們不願建議毀壞現有的一切重新開頭的那種社會浪費。他們願意收拾一部分好的，然後在這些好的事物周圍建立一個他們想望中的人類社會。他們要求糾正現社會的有限價值，而代之以普遍的價值。他們在爲供給全體人民以福利的社會而工作。亨利·華萊士就是這一羣人的代言人與領袖。

美國的保守思想與美國的自由思想都是土生土長的。它們都代表着生根於我們歷史的傳統。它們

的衝突可追溯到華盛頓的內閣中傑斐遜與漢彌爾敦的意見相左。它們現在又再現於一場決定性的鬥爭之中。它們雙方都無意於推翻憲法，也無意推翻私人企業，法律，宗教或政治之類的基本制度。兩者的差別是保守派認為這些制度的首要責任是保存財產的權利，而自由主義者認為這些制度首要的責任是保持人類的權利。

那一個居先呢，財產價值呢還是人的價值？這就是爭論中的問題。如果我們認為財產第一，那是一種世界。如果我們認為人類第一，那就產生另一種世界。這就是爭奪明天主權的兩種世界。

華萊士委身於倡導人的價值的世界。他是為平民當代言人的非常人。他的政治鬥爭的故事就是現代最深刻社會發展的性質與意義的啓蒙性註釋。

作者小傳

本書作者佛蘭克·金敦 (Frank Kingdom) 是一九四七年冬初成立的美國第三黨的主席，這個黨名為「進步公民黨」，由以前的「進步公民會」所派生，而進步公民會也就是一九四四年崛起的「公民政治行動委員會」的承繼者。它是美國目前自由主義的進步份子最強大的一個政團。從一九四四年以來金敦一直是這些組織的領導人之一，而今正式成爲第三黨的領袖，他的地位與影響更加重要了。

從公民政治行動委員會到公民進步黨，這一脈相傳的政團一向以華萊士爲方向，他們支持着華萊士這些年來爲爭取平民福利，民主與和平，反對法西斯，反獨佔資本，反對戰爭的鬥爭。它的成員大都是文化，藝術，科學界的進步份子，羅斯福的長子詹姆士與次子伊利奧特都是它的幹員。它得有許多羅斯福的舊人如摩根韜，伊克斯等的贊助。華萊士本人雖然由於還沒有脫離民主黨，並沒有正式加入這個新黨，但是它的活動他一向積極參加，他已是它精神上的領導者；而佛蘭克·金敦是華氏的同志，密友與合作者。

金敦這幾年來的職業是無線電評論家，經常以他進步的觀點評述時事，影響着他幾百萬聽衆，他本人已被稱爲目前美國最顯著的開明政治評論家。

金敦原籍英國，於一八九四年生於倫敦，父母全是虔誠的教士，兄弟共十三人，金敦最幼。少年時他在英國受教育，在神學薰陶下對宗教極爲虔誠，曾立志當一個牧師。一九一二年他離英赴美，十八歲就充任了緬因州泡得蘭地方美以美教堂的牧師。公餘之暇，進波士頓大學旁聽。一九一八年他正式成爲美國公民，兩年後他得文學士學位，繼續進哈佛大學攻讀哲學與宗教。

一九二七年他移居新澤西，仍任牧師，因積極參與文化活動，不久就成爲該州文化界的傑出人物。一九三四年他就任新澤西州達那大學校長，兩年後達那與其他四大學合併，改爲紐華克大學，金敦任首任校長，一面仍參與社會活動，任「紐華克福利聯合會」會長。

一九四〇年金敦辭大學校長，改任「公民教育服務社」(Citizenship Educational Service) 教育部長。該社旨在「推行民主教育於各社會福利，民政與勞工組織。」其時金敦已東移紐約，成爲全國文化中心活躍人物。他不僅參與宗教，救濟，社會福利的活動，也參加了國際政治外交方面的活動。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美國成立了一個反孤立主義的「援助盟國保衛美國委員會」，金敦被任爲紐約分會主席。他並且兼任「緊急拯救委員會」主席，「難民教育委員會」執委。這時期他的演說與著述立刻使他譽滿全國。他在孤立主義囂張聲中，主張美國參戰，他說，「我完全相信民主如果躲在壕塹後面採取防守態度，世界也就無法保持民主。」

一九四三年，他正式開始廣播生涯，他主張盟國團結，譴責反勞工法案，反對種族與宗教偏見，人頭稅，以及任何企圖妨害廣播中言論與批評自由的行爲，因而他自由主義政治評論家的名聲大噪。

一九四四年，美國選年，反動派擁杜威與羅斯福對抗，競爭劇烈空前。金敦與進步份子一致積極支持羅斯福，他及時完成了一本名著「那位白宮主人」(That Man in White House)。他明白指出如果共和黨總統登場，那是因為「我們的孤立派，超愛國份子，我們的反動派，我們的工賊，我們的反猶主義者，我們土生的法西斯份子捧他上去的。」他並不認為羅斯福是少不了的人，可是他認為在當時，沒有人比他更為適當了。這本書是一九四四年的最暢銷書之一。

大選時，金敦為支持羅斯福連任的「全國公民政治行動委員會」活躍的一員。同年十二月，電台舉行「空中村會」，辯論盟國對被解放的歐洲的政策，他力言聯合國的部隊不應用以支持為被解放人民所不需要的政府；同年年底，紐約舉行一次羣衆示威遊行，要求美國與佛朗哥西班牙斷絕關係，金敦榮任大會主席。

羅斯福於一九四五年四月間去世後，金敦確認華萊士是美國自由主義者的領導者，因而他寫成本書「偉人華萊士」，對華氏的為人與思想作周詳的評述與估量。

一九四六年九月華萊士因不滿杜魯門施政，憤而去職，於是與金敦等領導的公民政治行動會密切合作，推行爭取和平的運動。一九四七年春，該會與文化、藝術，自由職業者協會合併改稱為「進步公民會」，實力更見雄厚，羅斯福的長子詹姆士與次子伊利奧特等均參加在內。一九四七年十月間，公民會人士又為加強鬥爭，組成為第三黨，即「進步公民黨」。

據一九四七年十一月所得消息，該黨可能參加一九四八年的競選。該黨的政治綱領包括維護勞工權

利，取消專利，煤礦，鐵路，電氣事業公營，實現種族平等，推行工業衛生與住屋計劃等，特別注重人民福利。

這個黨的領導機構是主席團，金致為第一主席，前加利福尼亞州檢察長及全國律師公會主席甘尼士 (Robert W. Kenny) 為第二主席，此外還有副主席十六人，都是文化藝術與自由職業界著名進步人士。

譯後記

華萊士於一九四六年九月脫離杜魯門政府以後，即以「新共和」主編人的地位，時時撰文，對世界重要問題發表意見，並周游國內各地，西歐與巴勒斯坦，發表演說；力斥仇蘇與煽動戰爭的論調，倡導和平，民主與充分就業，極受各方注意。他的的確確已是美國進步的自由主義者的發言人與領袖。關於華氏的生平，國內書報不少片斷介紹，但都不够詳盡。在本書出版以前，國內還沒有一本這位當代政要的傳記。

一九四七年夏，譯者託友人在美國購寄華萊士的傳記，劉良模兄推荐金敦的「偉人華萊士」，經譯者與其他華氏傳記如『華萊士一門三傑』(Wallaces of Iowa)與『亨利·華萊士傳』(Henry Wallace—An Informal Biography)等比較一過，確信此書極有價值，於是決定動筆譯出，以饜關心華萊士的讀者。

這本書對華氏的爲人，經歷，處境，政治影響，經濟思想等評述得十分透澈，它雖然出版在一九四五年華氏任商務部長期間，但是它所有各項基本敘述，都足以幫助今天讀者對華氏的了解。

原書共十六章，譯者因感其中「六千萬個工作與私人企業」「六千萬個工作與美國特殊問題」兩章對六千萬個工作問題分析過多，因而略去。

這本「偉人華萊士」對於華萊士的經濟思想與各時期經濟情勢分析極詳，惜譯者對經濟疏於學習，因此譯文中恐難免錯誤，尙盼讀者指正。

小 魚 十一月十二日

美國 內幕

Inside U. S. A.

約翰·根室原著

小魚

王章麟合譯

潘際垌

辛克萊路易士說：「這書是美國事實最豐富的寶庫。」

前紐約市長賴迦第亞(已故)說：「此書乃千古不朽之作，生動迷人而且有益。」

前美國國務卿威爾斯說：「我國立國以來對於我國最聰明而深入的分析。」

紐約先鋒論壇報說「這書是研究美國從所未有的傑作。」
基督教科學箴言報說：「不僅是好，而且是壓倒優勢的好。它不是一本書，而是一本百科全書。」

三 人 出 版 社 印 行

• 售 代 店 書 大 各 國 全 •

士萊華人偉
An
Uncommon Man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原著者

佛蘭克·金敦
(Frank Kingdom)

譯者

小魚

發行者

三人出版社

總經售

利羣書報發行所
上海河南路三二八號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十一月初版

